

K250.3  
30  
2:2

K250.3  
1  
2:2

# 文化史料

丛刊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A876536

K250.3  
30  
2:2

K250.3  
1  
2:2

# 文化史料

丛刊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A876536

## 目 录

- 柳亚子及其革命诗文 ..... 陆丹林 (1)
- 谈南社 ..... 黄姜生 (12)
- 邹韬奋的早年生活 ..... 沈粹缜 (17)
- 延安新秧歌舞运动产生的前前后后 ..... 李焕之 (34)
- 艺坛生活漫忆 ..... 王人美 (40)
- 我的舞台生活 (一) ..... 袁世海 (65)
- 赵丹在新疆监狱中 ..... 方未艾 (97)
- 回忆我的伯父胡也频 ..... 胡少璋 (111)
- 我和《流民图》 ..... 蒋兆和 (120)
- 商务印书馆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 朱蔚伯 (139)
- 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 ..... 黄警顽 (154)
- 回忆解放前的天津《益世报》 ..... 《益世报》专题小组 (163)
-

## 柳亚子及其革命诗文

陆丹林

柳亚子，原名慰高，他的字、号很多。他读了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否定君主专制，就以亚洲的卢梭自命，提倡天赋人权，改名人权，号亚庐。后来与高天梅唱和诗词极多，天梅嫌他庐字笔划多难写，而写作亚子。子，是男子美称，他就用亚子做别字了。过了不久，他因为崇拜南宋词人辛弃疾，又改名弃疾，辛字幼安，他取别号安如，辛号稼轩，他有时写稿也用稼轩，或与辛弃疾有关的青兕做笔名。蒋介石叛变，搞什么“清党”，他亡命日本，用唐隐之假名。抗日战争，他蛰居上海，用活埋庵主做笔名。而在大革命时期到他的晚年，对外名号合一，是用柳亚子。

他于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五月廿八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他的高祖树芳，曾祖兆薰，祖父应墀，父亲念曾，都是“以文章道德，望重一乡”。他的家世，在封建社会，中可说是书香门第。

柳亚子自小聪明，好学不倦，十二岁即能写五七言诗和写几千字的史论。他的父亲在戊戌政变时，即赞成康有为、梁启超们的政见，而痛骂西太后的顽固保守。他的思想，受了家长的影响很大。十五岁，写有万言书准备寄给清帝载湉，后来因事没有发出。第二年，循俗应考县试为生员，结识了陈去病(后来是发起南社的三人中之一)、金天翮(即《孽海花》原始作者金一)。十七岁，由

陈、金二人的介绍，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做会员，并到上海在爱国学社读书。中国教育会是章炳麟、蔡元培、黄中央等所发起，表面上是用编订学堂教科书做掩饰，实际是联系同志，提倡民族主义的革命集团。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会所特设的，设社的目的是支持南洋工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禁止学生谈论时政而罢课的斗争，它还收容南京陆师学生罢课到沪的学生。当时在社肄业的有章士钊、林力山、穆藕初、胡敦复、俞子夷、曹梁厦等人。教员有章炳麟、蔡元培、蒋智由、蒋维乔、吴敬恒等。不久，爱国学社解散，《苏报》案起，他才返家，转学金天翻在同里所办的自治学社。二十岁（一九〇六年），他再到上海，入理化速成科习化学，想学制造炸弹，因病没有学成。他在这个时期，先后和高天梅、黄晦闻、邓秋枚、马君武、宁调之、诸贞壮、苏曼殊、刘师培、陈陶遗等人认识。在高天梅所办的健行公学教国文时，由高天梅（江苏同盟会立盟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又由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成为双料的革命党员。这一年，曾与陈陶遗、高天梅赴吴淞口的邮船上，晋谒孙中山，商谈革命的进行。这是他第一次会见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总理。他参加了同盟会之后，对于反清工作，积极地活动，与高天梅、田桐等主办《复报》鼓吹革命。以后陆续参加了《天铎》、《民声》、《太平洋》等报，一贯拥护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抨击统治者的黑暗势力，唤起民众，与军阀、官僚、地主们作斗争。

南社是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在中国革命史、文学史上，都占有辉煌的一页。他与陈去病、高天梅是最早的发起人，于一九〇九年冬间（清宣统元年），在苏州虎丘山张国维祠举行成立大会。社友十七人，来自苏、浙、皖、闽、粤、晋各省，其中除了黄宾虹、胡粟长、蔡哲夫三人之外，其他都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

在苏巡抚清吏满人瑞澄统治下的苏州有这样一个团体出现，而且陈陶遗、高天梅又是江苏同盟会的立盟人，景耀月是山西同盟会的立盟人，不是很简单的事。因为南社的命名，是与北庭对峙，隐然抗拒清王朝，意义是非常鲜明的。南社成立后，一再发展，最多达到一千一百多人。成员多是知识分子，遍布全国，朝鲜的文学家也有加入的。与它同时代的文学团体中，成员之多，可算是首屈一指。它是遥接明末张溥等所集合的应社、复社的。社务延续了十年，绝大部分的事工，是由社主任柳亚子领导，综持一切，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团体中具有相当成就的一个。尤其在反清讨袁两役中，社友们参加实际运动，致力最多。南社创立的动机，事后高天梅曾有追述，如云：“当胡虏猖獗时，不佞与友人柳亚子、陈去病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因以文字革命为旗帜，而意识不在文字间也。盖柳、陈二子深知往时人士入同盟会者，以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工具。”（摘录高天梅《周烈士实丹集》序）

这就很清楚地说明南社是同盟会的外围，是联系各省市的知识分子的反清的文学集团。

南社历年所编印出版的《南社丛刻》、《南社诗集》、《南社词集》、《南社纪略》等，以及某些社友的遗集，尤其是革命中殉难的社友的遗著，十之九的工作，是由柳亚子所編集、修订、印行。社里的经常费、印刷费等，除了极少数的社友照章缴纳之外，绝大部分的开支，都是由他个人掏腰包，这是社友们众所周知的事。他在南社群众中，初以梁山泊上小旋风柴进自命，后来又以及时雨宋江自况，在复社是自比吴扶九、孙孟朴，这些都可以反映他的思想的一面。

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众望所归，当选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南社成员在新政府各方面担任高级首长的有：黄

兴、宋教仁、马君武、景耀月、吕志伊、居正、于右任、姚雨平、林之夏、柏文蔚、汪精卫、李根源、陈陶遗、范光启、马叙伦、沈钧儒、陈其美等数十人，柳亚子与冯自由、易大岸、任鸿隽、雷铁崖等是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这是他生平在中央政府最高机关工作的第一次，也是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政府工作的第一次。

在武昌起义前，社友只有二百余人，民国成立以后六七年间，也就是他致力南社社务最积极最努力的期间，社友达到一千一百八十余人。《南社丛刻》每年平均出版两集。这些都和他专心致志热忱工作分不开。

五四运动前夕，南社发生内讧，柳亚子又辞去了社主任职，内伤外感，至一九一七年它陷于半身不遂的瘫痪状态，到了一九二三年，便完全瓦解了。

柳亚子接受新思想较快，他的思想，跟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为了迎接新潮，继续为文化运动而努力，他和几位文友（大部分是南社的旧友），利用南社原有的基础，另行组织团体，新南社就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了。社长柳亚子发表宣言，提倡新文学，鼓吹社会革命。成员虽然只有二百余人，但思想方面，一般都是比较先进的，如：廖仲恺、杨杏佛、朱季恂、经亨颐、陈望道、邵力子、高尔柏、高尔松、刘大白等。从它的《新南社社刊》第一期的文章，如《最近的新俄罗斯》，《留别俄罗斯同志们的一封信》、《中国的乱源》、《中国诗歌实质上变化的关键》、《社会不平鸣》、《诗人拜伦百年祭》、《哲学概论》等可以知道，它和时代潮流的呼应，比之南社时期的刊物，又跨进了一步。

一九三五年冬间，他为了南社、新南社过去历史上的光荣，并为了促进大家对未来的努力，特发起南社纪念会。南社、新南社的

社友，为当然会员，要将最近的通讯处报告本会，对南社、新南社表同情的非社友可加入为志愿会员，但要有当然会员二人以上的介绍。结果，入会会员达三百九十多人。这个纪念会的会长是柳亚子，名誉会长是蔡元培。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时，我是二十一人中之一，关于会务我也做了一些工作。会成立后，举行过一次规模宏大的雅集，参加的有一百五十多人，是从未有过的盛会。到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一切都受了影响，会务才停顿下来。

柳亚子是诗人，同时也是革命战士。“诗言志”他生平的著作，为革命服务的诗词文，占了多数。他的作品一向是反封建，反黑暗，歌颂光明的。他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革命者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者，靠拢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在评价柳亚子的诗时曾说，“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趣”。因此要叙述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以以“诗为证”。

孙中山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柳亚子住在苏州的黎里故乡，闻着佳音，高兴极了，写了《五月五日纪事》诗一首：

十年三乱究何成？喜见南天壁垒更。  
率土自应尊国父，斯人不出奈苍生。  
白宫北美推华盛，赤帜西俄拥列宁。  
我亦雄心犹健在，梦中无路请长缨。

孙中山看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即改组了国民党，中国革命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柳亚子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有一夜，他梦见了孙中山，即写诗志喜，诗云：

廿年两度感追从，梦里还来叩白宫。  
矍铄丰姿犹昔日，温恭言笑仰高风。



驰驱戎马翁诚瘁，偃卧丘园我犹慵。

绝胜尼山孔老子，吾衰仍得见周公。

他参加党的新组织后，返到吴江，任国民党吴江县党部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努力从事地下工作，从此就再度从事革命的活动。第二年，他参加举行孙中山追悼大会，撰有挽联，联文是：“薄华盛顿而不为，何况明祖；于马克思为后进，庶几列宁。”他自说是极得体的挽语。

秋间，他游北京，专程到西山碧云寺，恭谒孙中山灵柩。南归后，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委会的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地下工作机构是在上海），同事的有朱季恂，侯绍裘、张秋石、张曙时等同志。后来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朱、侯、张等先后殉难。

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开会，柳亚子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仍负责江苏党务。夏间，他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这个时期，他和毛泽东同志定交，毛主席“赠柳亚子先生”诗：“饮茶粤海未能忘”，就是指此时期的相晤。他返江苏，即被军阀孙传芳指名通缉，避居上海，为亡友苏曼殊编纂遗集。北伐期间，武汉中央政治会议选任他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昌行营也派他为江苏省政务委员兼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他因事都没有就职。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帮匪、流氓等渣滓叛变革命，到处大量的屠杀革命志士。柳亚子是反蒋的，自然受到牵连，他的绝命词的诗跋说：“五月八日夜半，余为宵人构陷，缒骑入室，匿复壁中，口占绝命词二十八字，瞑目待尽。”后竟得脱。

“每诵吴祭酒故人慷慨之句，不知吾涕之何从也，”就是记述此事的。他为逃避蒋帮鹰犬的陷害，挈妇（夫人郑佩宜）将雏（女儿无非、无垢），改名“唐隐之”，亡命日本，居留了十个月左右，才返国，从此定居上海。

一九二八年夏间，中山陵正在筑造中，他到南京，曾去瞻仰，写诗志感，七绝两首是：

沧海龙归雾气昏，尚留灵爽奠中原。  
扪心欲诉年时事，孽子孤臣泪暗吞。  
承平歌颂吾何与，地老天荒证此情。  
不奏通天台下表，岂关才谢沈初明？

七律是：

白虎金精剑气开，招邀俊侣又重来。  
旷观马列三千界，掩迹华拿第一才。  
六代江山供屏障，三民义理岂沉霾？  
蒼蒿肃穆神灵在，敢为兰成赋大哀？

第二年，孙中山奉安大典，他因病没有前去参加会葬，次陈去病韵写诗志哀，诗云：

奉椽南归四载迟，八音遏密寄哀思。  
固应灵爽凭天上，可奈疮痍尚海湄。  
邓禹军门怀旧谊，羊公岷首恸新碑。  
不须更向昭陵哭，往事低徊涕染颐。

他在上年瞻仰中山陵后回到沪市，即请诸贞壮、陈树人分绘，《秣陵悲秋图》，是纪念与他从事革命惨遭蒋党借口“清党”而被毁尸灭迹的张秋石（应春，女同志），并表示哀愤的。他请了些文友题咏，我也遵嘱写了四句（不是诗）给他：

君是秣陵悲秋客，我亦顶湖感日徒。  
秋石惨亡伊情死，青天碧海泪同枯。

一九三一年，他因何香凝的介绍，始谒孙夫人宋庆龄于上海莫利爱路（今名香山路）孙公馆。

一九三四年，他奉母费太夫人和眷属重游北方，曾到北京碧云寺谒孙中山衣冠冢，写诗六章，中有：“三民衣钵何人继？空遗头衔国父尊。”放眼国事，无限感慨。第二年，他漫游马尼拉，归国时，顺到广州一行，恰值孙中山三月十二日忌辰，写七律一首云：

飞杨无路哭昭陵，朝市仓皇几废兴。

入梦红桑都变海，填胸赤血早凝冰。

天门拆翼怜陶侃（余自谓也），豚犬生儿羨景升（指北京近事）。

侧目愁胡浑不管，年来辛苦郅都鹰。

其后担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领导编印了好几种有关上海史事资料的书刊，并举办过上海市文献展览会，我也是该会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抗战初期，日寇陷沪，上海租界成了孤岛，他社门谢客，编撰南明史稿。我当时旅居香港，主编《大风》十日刊，一九三八年春出版周年纪念，我请他题诗，他写了七绝一首寄我，诗云：

羞说陶潜似卧龙，蛰居人海不英雄，

讨倭何日收全绩，重向中原唱大风。

署笔名为“活埋菴主”，顾名思义，可以知道他当时内心的苦闷和对倭寇的愤慨。不久，也有人请他题孙中山遗墨，他写了七绝两首，把华盛顿、列宁与孙中山相提并论，诗云：

北美白宫同佐治，东欧赤帜并蓝宁。

齐州圣哲原天纵，椰雨椰风护墨馨。

神功圣德威灵远，孽子孤臣涕泪清。

应睹收京车骑盛，凯歌铙唱上钟山。

请他题诗的是南洋华侨，故诗中有椰雨椰风四字。

柳亚子蜚居孤岛，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没有一点自由，于一九四〇年的十二月，带了家眷脱离了敌伪恶势力压迫下的上海，寄居九龙。蒋帮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当时广大人民对蒋政权的滔天罪行，无不万分愤慨。柳亚子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抗议，他主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认真地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中国才能够不至灭亡。并指斥蒋党为小朝廷，而坚决拥护中共所提出的团结抗战的号召。因此遭受到蒋党的嫉视，把他的中央监察委员开除。我当日曾去访他谈谈，他把原信的底稿给我看，跟着说：忠言逆耳，他们是准备做亡国奴，还有什么可说！独可愤慨的这批汉奸，如此搞下去，真是亡国无日的了。个人的中监不中监，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我可以断言，不必等待十年二十年，只有三几年的短少期间，便可以知道谁是谁非，谁是忠于国家民族，谁是向敌人屈膝的了。哈，哈，哈！旅港的文化界人士发起人权运动，主要的唤起群众营救被蒋介石所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和无数惨遭拘捕虐杀的政治运动人士，他和我也参加了这个运动。

他住在九龙时，适值孙中山诞生七十六周年纪念，写有一诗：

鼎湖龙去哭声啼，凄绝中山陌上花。  
原庙衣冠愁对贼，遗黎丰沛苦茹荼。  
惠陵已惜禅（叶平）非备，天策休夸国是家。  
七十六年青史在，好凭灵爽护中华。

日寇侵略香港，他脱险内渡，旅居桂林时，也写过几首感念孙中山的诗篇，今录“五月五日为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二十三周年纪念，是日为国际革命大师马克思先生圣诞，值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别德聂科夫、秘书郭烈夫两同志自渝来桂，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茶会欢迎，敬献二首。”其第二首云：

羊城纪念廿三春，至圣蒿生岳降辰。  
南北东西心自印，古今中外感还频。  
飞扬大国能传统，负荷宗邦愧析薪。  
握手真成悲喜集，应拚一石醉漓湍。

解放战争，他旅居香港，他团结国民党的进步分子，联系一切反蒋的人士，组织策划致力革命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他应毛主席电召北上，抵北京后，不久，恭谒孙先生之灵堂有感，写七律两首，诗云：

主义三民我诂志，新民共产接青黄。  
百年名世洪天国（谓中山先生），一代牢愁感孝章（自谓）。  
杜默王县羸痛哭，鲁阳夸父费评量。  
终于联共成虚愿，一掬明陵泪满江。  
南都叛变最难忘，青史无灵尽化黄。  
武力黄张原狗盗，文妖吴李竟弹章。  
绕朝不用吾终憾，苕叔难凭碧化量。  
曲突迁薪今已矣，一夫不杀血成江。

抚今追昔，敌我分明，这是五月五日所作的，是日为马克思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余欲敬上尊号名曰“卡尔圣诞”，而令耶稣避席者是也。适逢毛主席有赐宴之举，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不可无诗，敬呈一律云：

卡尔中山两未忘，斯毛并世战玄黄。  
生才西德推贤圣，革命中华赖表章。  
粤海咸京堪比例，蒋凶托逆漫评量。  
腾欢今日新天地，澎湃潮流沸海江。

其他对于孙中山的感叹吟咏还有好几首，恕不赘录，但其存歿

口号五首的第一首（作于一九二九年）是把孙中山、毛润之（毛主席）并提的，在文友中争相传诵，特为录出，诗云：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当时是蒋介石疯狂“剿赤”，而他把孙先生、毛主席与列宁相比，可以见到他的政治思想，眼光如炬的了。

柳亚子对于孙中山的思想言行，在以上所录的诗中，他的朝斯夕斯，身体力行充分表现。他在一九三六年，给蒋慎吾的信中，评述陈去病、高天梅和他自己的政治思想，他所暴露自己的思想是：“时代是进化的，尤其是孙先生指示我们，达到民生主义的社会，才是至善至美的社会。把西洋的术语和孙先生的遗训融会贯通起来，就是民生主义了。不了解民生主义的人，不配称三民主义者。我，三十年来的论调，始终是一致的。我的心灵总是向着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路上走，……”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孙中山是这样子说的。柳亚子的这番话，为了应付当时的环境，他只好这样子的说，这说明他是忠于孙中山主义的。女青年作家陈斯馨编印《初步集》托我代请他写序，他在序文中说：“关于思想方面，我还不大清楚以前的过程。我是恪守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的，我以为他的主义与方略，是不可磨灭的真理。想起来，斯馨的作品，总不会对于这些微言大义会有抵触的地方吧！万一因认识不够而象一般不学无术者之所为，我也希望她痛自删削的。当然，我知道她本质是个好人，想起来不会有这些的。”这一段话，也可以证明，他是忠于孙中山遗教的。

从以上这些诗文来看，柳亚子可以说得上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的了。

## 谈 南 社

黄 姜 生

清季仁人志士，组织团体，以种族主义、革命文学鼓吹排满复汉，惟南社声华最盛，应求最广，历史亦最悠久，为国人所共知。一九四〇年，柳君亚子尝撰《南社纪略》志其梗概（上海国华书局出版），泾县胡寄尘复撰《南社始末》登载上海《越风》半月刊。报章杂志亦屡载南社轶事，片鳞寸爪，语焉弗详。亚子主持社事十余年，以局中人述当日事，自较亲切详备，惟立场纯重个人，不无门户之见，措词有时过当，序言中亚子已自言之；其间琐细节目，无关宏旨，亦未能稍从省略。然幸赖此编，犹可考见南社本末，为功诚非浅鲜。

南社停辍已四十年，云散风流，都成陈迹。社友存在者无几，大都衰病侵寻，不复重提往

事。愚与亚子贫贱交亲，又忝为社中人，身经目击，历历在胸。虽老病无能为役，犹思补缀旧闻，存其真相，冀备治史料者之要删，藉以慰亡友于地下。凡亚子所已言者，概不赘述；义主谨严，无取冗复。故人有知，庶几相余。

南社成立于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己酉），酝酿于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发起者陈巢南（去病）、高天梅（旭）、柳亚子（原名弃疾，后以字行）。一九〇九年十一月成立之始，假苏州虎丘明苏松巡抚东阳张公国维祠堂举行第一次雅集，至者陈巢南、柳亚子、陈陶遗、黄滨虹、诸贞壮、景太昭等十七人，其中隶中国同盟会者十四人。即席通过社约若

千条，开宗明义，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入社先决条件。陈巢南撰《南社启》以代宣言，传诵于时，为当时极有关系文字，《南社纪略》缺焉未载，兹追录如下。

“盖闻隆中促膝，犹传梁父之吟；庀下赁舂，未忘五噫之句。投清流于白马，诗品终存；极迁谪于哀牢，雄文独健。自古羁人贬宦，寡妇逋臣，才子狂生，遗民逸士，当其遭逢撼轲，侘傺穷途，志屈难申，身存若殁。莫不寄托豪素，抒写心情，对香草以含愁，怀佳人其未远。凄馨哀艳，纷纶兰蕙之篇；悱恻缠绵，曲尽温馨之致。入么弦而欲绝，弹不成腔；未终卷而悲来，涕先沾臆。凡若此者，其故何哉？亦谓谊存忠厚，不离江湖魏阙之思；意切忧伤，遂多匪风下泉之什。词虽嫌其过激，心欲往而仍还。湘水沈吟，比三闾之自溺；江南愁叹，等贾傅而烦冤。此不得已者一也。抑或揽髻丘之

葛，重慨式微；采首山之薇，将归曷适？竹石俱碎，凄凄朱鸟之味；陵阙何依，黯黯冬青之树。吊故家于乔木，华屋山丘；寻浩劫于残灰，铜驼荆棘。此不得已者又其一也。而且乘车戴笠，交重金兰；异苔同岭，谊托肺腑。携手作河梁之别，苏李情殷；聚星应奎斗之芒，荀陈契合。或月明千里，引两地之相思；或邻笛山阳，怅九京之永逝。此不得已者又其一也。要诸因缘，都成感慨；偶逢好事，遂尔风流。南社之作，得无类欤。然而语长心重，本非无疾以呻吟；兴往情来，毕竟伤时而涕泣。寥寥车辙，不同几复当年；落落襟怀，差比河汾诸老。辨足音于空谷，一二蹙然；追逃社于前盟，数人而已。每相逢其恸哭，或独往而独还。时从詹尹卜居，辄向祝宗祈死。黄冠野服，惊为方外之人；踏地蹋天，为抱无穷之恨。倘逢忌讳，必疑当代之怪民；幸托清时，便尔疏狂以玩世。不详



文字，敢希壬申文选之伦；终古河山，用依次尾国玮之集。大夫君子，倘无罪焉；幼妇外孙，且自赏也。”

文用骈体，隶事繁富，虽未昌言革命，而字里行间，固已跃然流露。盖其时文网甚密，虑清吏罗织，故巽其辞、隐其语，以俟读者之领会。因时立言，合于忧患不得已之旨，非徒词采之为美也。

一九〇九年冬，社刊第一集出版；翌年夏，第二集出版；至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辛亥）六月，社刊已出至第四集。上海各报，均有介绍批评。入社者增至一百数十人，闻风慕义，千里如一室焉。

徐锡麟狙杀皖抚恩铭，浙吏遽兴党狱。秋瑾被害，一棺浅厝，莫敢申诉。亚子撰《鉴湖女侠秋君墓碑》，详纪其事，表彰惨烈，海内竟相传录。石门徐忏慧女士心焉伤之，躬冒危疑，与桐城吴芝瑛同入山阴，迁葬遗骨

于西湖，复与陈巢南等营建秋社，筑风雨亭，设像展祀，俾留永念。于时东都党锢之英，西台恸哭之彦，钦其义举，相与赋诗凭吊，篇章传播，益为革命增加力量。忏慧亦南社中人也。辛亥秋，上海光复，入社者增至二百余人，黄克强、宋钝初、陈英士同时加盟，尤为世所注目。社友周实丹起义淮南，为山阳令姚荣泽所害。荣泽走匿南通张氏，亚子与旅沪社友奔走呼号，为死者复仇；陈英土方任沪军都督，电张引渡元凶，谓如有人庇匿荣泽，沪军惟力是视。义旗所指，首在南通，因得提付南京特别法庭审判，虽大仇未报，而义声震动，是非得以大白。此在南社历史上皆值得大书而特书者。

袁世凯窃国称帝，多所诛僇。南社诸子，义不帝秦，逃名遁迹，不受威屈利诱；而号召起义、声罪致讨者，尤不一而足。被名捕杀害及暗杀者，如宁太一、范鸿仙、姚勇忱、杨性恂、

仇冥鸿等，而英士则其尤著者，盖几乎聚南社之良而尽歼之。青磷碧血，蔚为国光；求仁得仁，无所于怨。此则提倡气节之效也。

社友著录社籍者，截至一九二三年冬，凡一千二百余人，全国之广，无远弗届；苏浙最多，居百分之二十；次则湘粤，又次则皖、闽、赣、蜀、桂、晋等省，约略相等，云、贵、陕、甘较少。其间有畸人二：一为苏曼殊，身世行谊，世所熟知，所为诗文杂著及书画篆刻，早已流传人口，侵本不止一种。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正风出版社印行《曼殊大师纪念集》，柳无忌编订，最为完备，坊刻传播颇多，读其书者可知其人，兹有赘述。其一为李息霜。本籍天津，字叔同，初名岸，改名凡；丧母后改名哀，字哀公；既又易名息，字息霜，亦称息翁。试验断食后，改名欣，字俶同，复改名婴，别署黄昏老人。后披剃于杭州大慈山，释名演音，号弘一大师，操

行极卓，不轻为人作佛事；精研经典，艰苦力行，以是不为俗僧所喜，寄居西湖玉泉禅院。工诗文篆刻，书仿北魏，有重名。又好音乐、新剧，尝加入上海春柳社。主讲杭州师范最久。曼殊逃释归儒，息霜弃儒入释，同负盛誉，亦同有独特之行，皆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人。并时尚有长沙开福寺僧海印，广州六榕寺僧铁禅，亦注社籍，并工诗词，惟皆属正规和尚，无畸行可称。女社友以旌德吕碧城（吕氏三才女之一）、石门徐忏慧、湘乡张默君、衡山唐群英为最有闻；次则石门徐小淑，宁乡陈定元、金山何亚希，亦同负诗名。又有朝鲜人申桂，字脱观，大韩革命党人，痛亡国之惨，弃家来华，寄居辽阳，奔走复国甚力，曾任大韩临时总统，事秘弗详。一九一六年来客上海，加入社籍，愚园雅集，屡与笔谈，慷慨英爽，见于眉目，知其为义侠人也。

南社丛刊年出二三集，无定

期，每集约百余叶。编选校录，皆亚子主之，致力最勤亦最久。每叶皆朱丝阑，端楷逐句圆规，晨抄暝写，无少间断，平生精力消耗于此中者不少，晚婴脑疾，半基于是。重谈南社，益令人惜死于无穷。关于社刊内容，分文、诗、词三类，大抵以甄综文献、激发性情为其骨干，而以史事、考据、掌故为其条理，于忧深虑远之旨，未尝不三致意焉。近代民族人物及革命轶事，所载尤多，几于触处皆是。衡其性质，

既与清末《国粹学报》不同，亦与诸革命刊物稍异，分别观之，庶得知其旨趣。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亚子来自香港，税驾粗定，于翌年六月约集旅京旧社友举行南社雅集于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至者邵力子等十余人，而来宾特多，中共北京市长叶君剑英亦惠临参加，茶话摄影，尽欢而散。迄今回忆，倏已十年。亚子墓有宿草，永隔人天。追述往事，疏浅无当，亦聊备搜采史料者之参证云尔。

# 邹韬奋的早年生活

沈粹缜

## 一、婚事

说起我和韬奋的这个婚事，得先说说我的“家世。”我的祖父是苏州的一个穷秀才，生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的父亲名叫沈右衡，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没有受多少教育，从小就在一个古董铺当学徒，他的专业是鉴别古玩的真伪。他生了五个子女，我是他的长女，我还有一个长兄和二弟，一个妹妹。

我生于一九〇一年。在苏州，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在私塾读了四年书。那时虽然还是清朝统治时代，但是社会风气，尤其在江南一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女孩子也能和男孩子一起读书了。十岁这一年，大姑母把我带到了北京。我的大姑母名叫沈鹤一，她是一位老姑娘，终身没有结婚。从这时起一直到我独立工作生活为止，大姑母一直把我带在她身边，因此我也可以说是由大姑



一九四〇年冬韬奋(右一)离开重庆前夕与其夫人沈粹缜(左二)女儿嘉骝(右三)次子嘉骥(左一)长子嘉骅(左三)合影

母抚养成长的。大姑母和二姑母都是专攻刺绣的（刺绣是一种工艺美术，现在的学校已经不再设有这样专门的学科），当时她们俩同在一个刺绣学校工作。我在北京继续读了三年小学之后，大姑母把我转到刺绣学校又学习了三年。那时虽然已经在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形式上已经建立起来多年，然而各派军阀互相争夺，战乱频仍，为了逃避战祸，我又随同姑母举家南迁，回到了苏州。几个月后，我的母亲不幸突然患伤寒症病故。这时，张寿招聘我的两位姑母到南通公办女红传习所（刺绣学校），我父亲及全家人也一起搬到了南通。我在这个女红传习所又学习了三年，毕业以后，留在该校担任了两年助教。一九二一年，由杨卫玉先生<sup>①</sup>担任校长的苏州女子职业学校到南通来招聘一位美术科主任，我应聘去了，这时我还是一个二十一岁<sup>②</sup>的女孩子。这次去苏州，我当然不会知道以后的命运会把我带到和韬奋的结合。

五十多年以前的二十年代，一个女孩子过了二十岁以后，亲属中间和周围一些怀有好心肠的人总不免会关心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向你“说媒”。我当然也不可避免，曾经有好几起向我介绍“对象”，亲属中甚至有主张我应当嫁一个殷实的“做生意”的人（即商人）。经过五四运动，虽然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有过猛烈的冲击，但是女孩子对自己的婚姻毕竟不象现在这样可以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意愿，甚至在家庭中加以讨论。不过，我心中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也许因为我是出身于所谓“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这种熏陶，觉得读书人清高，商人庸俗，宁愿清贫，不愿身染

---

<sup>①</sup>杨卫玉先生是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负责人之一，解放后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sup>②</sup>均按中国人的习惯去计算，实际年龄不足二十岁。

铜臭。因此，我是抱定宗旨不嫁给商人的。

一九二五年，杨卫玉先生对于韬奋丧偶以后心情沉郁，生活无人照顾的景况极为同情，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把我介绍给韬奋的。不过，杨先生向我提起此事并大略介绍了韬奋的情况后，我默许地表示了同意。我出身于封建家庭，然而对于封建家庭中侍奉翁姑的一套繁文缛节，我十分憎恶。我的默许，除了因为韬奋是一个文人，身上没有铜臭外，还因为和他组织小家庭，可以完全摆脱封建礼节的束缚。这种精神枷锁，在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习惯中，一般是不容易彻底免除的。

韬奋和我第一次见面，不，应当说是韬奋第一次见到我，大概是经杨卫玉先生精心安排的，我事前毫无所知。有一次，我们正好到上海去参观，而韬奋有事到昆山去，利用在火车站这短促的可能相遇的机会，让韬奋先见见我。这大概就是至今还未能完全免除的被称为“相亲”的一种举措，现在想起来当然十分可笑。此后不久，杨卫玉先生陪同韬奋到我工作的苏州女子职业学校和我第一次正式见面。见面的地点在学校的会议室，这时正是蝶飞莺啭、落英缤纷的江南暮春时节。

韬奋的感情是热烈的、专注的，对爱情也是如此，正象他后来对他毕生从事的革命文化事业一样。在第一次和我见面以后，他经常给我写信，后来几乎每周要给我写一两封信。他在爱情方面，不仅热情洋溢，而且也能体贴人，还很风趣。有一次，他用苏州方言给我写信，起初，信屈聱牙的看不懂，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文字，后来读懂了，不禁使我哑然失笑。一九二五年七月，韬奋和我在苏州留园订了婚。订婚，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有几个亲人在一起照了一个相，但是也还未能完全免俗，按照当时的习俗，交换了订婚戒

指。

订婚以后，我们之间过往更密了。他每个星期必定来苏州看我，早车来，晚车走。以后，甚至周六晚上就来，借宿在旅馆，星期天可以和我盘桓一个整天。苏州园林多，能够提供游息的场所也多，这大约半年左右的恋爱生活，在韬奋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在这种纯属私人的生活中，也同样反映出来了他的专注不二。

结婚的日子选定在一九二六年元旦。因为参加婚礼的韬奋的同学、同事比较多，借用了当时上海永安公司（现在的中百十店）楼上的大东酒家。韬奋为这次婚礼还给我买了一只镶嵌珠宝的手镯和一枝珠花，置办了一套家俱<sup>①</sup>。这花去了他一大笔钱，还借了债。手镯和珠花，在婚后不久当我知道韬奋为举办婚事欠了债时，就给我变卖了用来还了债，而债务也依靠我们撙节用度，在他每月薪水中节约一部分，很快陆续还清了，因为韬奋和我都不愿在债务的负担中去过心情不舒畅的日子。我在这里所以叙述这些生活中的琐细，不过是想真实地记录下来韬奋在走上革命道路以前，他象所有一切普通人一样，还不能摆脱当时旧的习俗和传统的某种程度的影响。我相信，今天的读者在了解了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不至于苛求于当时的韬奋，也不至于误解我是为了宣扬它。我当然更相信，在相距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的青年一代，在从事新的长征的征途中，完全有可能自觉地摆脱一切旧的习俗和传统的影响。

婚后，原来计划在苏州安家，为此，已经租下了房子，并且一切都已布置好了。但是经过再三合计，为韬奋着想，即使每周在上海苏州间往返奔走一次，也要化费他一天甚至一天以上的的时间，而

---

<sup>①</sup>这套家俱，总算保存下来了，现在陈列在上海韬奋纪念馆。

时间对他来说，比什么都珍贵，因此，最后毅然放弃原来在苏州安家的计划，辞去我在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每月六十元薪水（在当时来说，是待遇不算菲薄的职务），退掉已经租下的房子，改在上海安家。命运既然把我和韬奋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和韬奋也就共着同一个命运了。

## 二、家庭生活

也就是结婚那一年，一九二六年下半年，韬奋接办《生活》周刊，担任主编。他多年来梦寐以求想成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愿望初步实现了，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路子，按照他自己设计的方案来办一个刊物，而不必听命于第三者的意旨了。

早期的《生活》周刊，正象大家所知道的，几乎是韬奋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脚戏。“编剧”是他，“导演”是他，扮演各种“角色”的还是他；他用各种笔名写各种专栏文章，甚至连跑印刷所，校对都由他一个人包办，他对这个刊物真可说象一个母亲对婴儿那样倾注了全部感情、心血和精力。

政治态度，思想倾向和他在社会上，在人民群众中间起着什么样的影响和影响的大小，永远是评价一个人、一个刊物的价值尺度。我不想在这里评价早期的《生活》周刊和韬奋，因为已经有人这样做了，而且作得很精当。我想指出的是：当时的韬奋纵然还没有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没有能从资产阶级营垒中杀出来，但是他的这种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也就是讲求实际，不说空话，不图虚名的事业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韬奋对待工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勤奋，不浪费一点时间。



他的许多著译，都是利用晚间有限的时间完成的。不论著述或者翻译，每晚总要写二、三千字，几乎成了他的习惯。

在日常生活上，韬奋没有任何嗜好，不喝酒，也不吸烟。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是什么原因，曾经有过那么一次，听从某些朋友的劝说，学着抽烟，但是学了一阵，结果连手指怎么拿烟卷都没有学象样，当然更不必说学会抽烟了。要说他有什么嗜好，唯一的嗜好是读书。

他生活很有规律，爱好整洁。他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他却是一位说话风趣、喜欢逗人、和蔼可亲的人。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每天晚饭之后他总要逗着孩子玩一阵才走进他的工作室。孩子长大一些了，对孩子的教育也很注意，比如平时吃饭，盛饭、添饭，他都要孩子们自己动手，不让滋长优越感。除了一日三餐，我不让孩子吃零食，也不赞同给孩子们零用钱，我主张对孩子应当严一些，可是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主张给孩子们一些零用钱，可以让他们随时买一些学习中需要的东西，说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对孩子的学习他尤其注意。有一次，晚上回来，当他知道二儿嘉骥因为古文背不出来被老师责打而啼哭时，他不但不责怪孩子，反而认为这是老师的不对，连晚饭都没顾上吃，立刻到学校给老师提意见去了。在是非问题上他就是这样搁不住。星期天，他喜欢看看电影，但有些电影，就不带孩子们一起去，他是有选择的。对家庭也十分细心和体贴，晚上如果在外面有什么活动，不能回来吃晚饭，他总要打一个电话回来，免得家里等他和不放心。

如果说韬奋的笔杆子还有些能力，尤其在他后期和晚年，他曾经拿起笔杆子这唯一的武器向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作过坚持不懈的

斗争，因而给我们留下了不少著述，那末，在料理日常生活方面，他却表现得很差，甚至可说相当“低能”，或者象茅盾所说的有些“天真”。和韬奋相处过，熟悉韬奋的朋友，都会感觉到在这方面他天真得有点可笑。二十年代一直到三十年代初，市面上买东西，通用的还是铜板，可是韬奋不会数铜板<sup>①</sup>。一般数铜板都是一五一十、五个五个地数，他只会一个一个地数。他也不会乘电车，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该乘什么车，因此只好预先把乘人力车所需的钱给他一一包好，免得他临时仓皇。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我错了，在婚后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我对他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而感到不放心，把悉心为他料理一切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样也就愈发增长了他的依赖程度。人是需要在实际生活中锻炼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占香港，韬奋先我被迫流亡到东江纵队，经过那样艰苦生活的磨炼，他不但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帮助我到山溪中为孩子们洗衣服和做其他各种杂事，在这方面，他好象突然变得能干多了。

每月，韬奋领来薪水总是全数交给我。他把家事全部托付给我，并且给了我充分的信赖。而我，也以创设家庭的幸福生活，使他能把全副精力去从事他的工作，没有后顾之忧，看作是自己的天职。我出生在清朝的末年，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中成长。我的青少年时代跨越了两个时代。我所受的教育，混杂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它们不可能不在我身上打下烙印和留下痕迹，我除了在家庭生活方面，尽我所能使韬奋感到愉快、幸福、美满以外，对韬奋工作的内容和意义我并不太关心，我也没有想过要去作深入一步的了解。对这种单调的生活，偶尔我也感到寂寞、无

---

①：三十年代以前，通用的货币除银元、钞票外，辅币有银角和铜元（俗称铜板）。

聊。我曾经向韬奋提出过想去读英文，因为我对它还有点爱好。他却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如果将来一起出国，需要用到英文的话，我给你当翻译。他还对我说过，你就在家里把孩子带好吧。他并不认为我应当有一个职业或应当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婚后的第二年是一九二七年，这一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刻。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都是在上海这个舞台上演出的。接着国共分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燃起的革命火焰，开始了历史的新的篇章。蒋介石以他可耻的背叛，在革命者的鲜血和尸骨上建立起他的法西斯王朝。然而所有这些，在当时的韬奋身上，似乎很难找到什么反响。

那时曾经来过我们家里的韬奋的朋友，无不交口称誉韬奋的家庭充满了和煦、温暖和幸福。时隔四、五十年以后的现在，我当然懂得在这褒词之中也还含有其他更深一层的意思。不过，韬奋当时也许还以此引为自豪的哩！确实，那时的家庭，对韬奋来说，就好象一个美丽而平静的港湾，他安静地泊在那里，仍然按照他自己的路子，专注地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自己心爱的感到兴趣的工作——编辑他的《生活》周刊，一直要到他自己摸索着前进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才把他从原来狭隘的圈子中震惊过来；敌人的刺刀和铁蹄把他爱国主义的热情大大激发了起来。而从此以后，他驶出这个和煦平静的港湾，迎着风暴，一往直前，再也没有回头。

### 三、韬奋的幼年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由自己决定，但是走什么样的道路，却

完全可以由自己选择，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十分典型地体现在韬奋身上。

韬奋不仅出生在已经敲响了丧钟的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代，而且生长在一个败落衰亡中的官宦世家。结婚以后，韬奋和我过的可说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小家庭生活，除了每月对他寓居在北京的父亲给以一定的经济上资助外，和他父亲的家庭极少联系往来。韬奋平时也很少谈及他出身的家庭和他的过去。但是，正象鲁迅先生所说，谁没有童年？谁的童年没有穿过开裆裤，拖过鼻涕？因此，是用不着有任何忌讳的。相反，今天我在这里叙说韬奋的家庭和他的幼年时代，正足以使我们更具体、更深刻地认识象韬奋这样一个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受过资产阶级的严格教育，诚实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摆脱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传统的羁绊，怎样逐步克服资产阶级教育对他的影响并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终于成为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战士。

韬奋的祖籍是江西余江，也就是毛主席读到《人民日报》上报道这个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因而激发了他的诗思，“浮想联翩”、“欣然命笔”作了《送瘟神》这首脍炙人口的七律的那个地方。然而韬奋出生却是在福建长乐县<sup>①</sup>，那是韬奋的祖父在清朝末期在这个县任知县的任上。韬奋和他江西原籍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他一生中，只到余江老家去过一次，那是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韬奋十三岁。这一年，韬奋的祖父邹舒宇在老家余江病逝，韬奋的生母查氏也是这一年在福州去世，韬奋随他父亲扶柩回到了老家。

---

<sup>①</sup>关于韬奋的出生地，另一说是福建永安。说韬奋出生在长乐，是根据韬奋的叔叔邹国珂先生的回忆。

余江老家对韬奋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以后韬奋的著述中我们也没有发现这方面有关的痕迹。

说韬奋的家庭出身是“官宦世家”，也许有点过分，韬奋的祖父最高的官职确实曾做到延平府的知府，然而传说他幼年时曾由他母亲带着他一起讨过饭，他的三个弟弟也都是农民，都在家乡务农。韬奋的父亲长期在福州候补，想捕捉一个机会，谋个一官半职，可是，等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才在辛亥革命前夕，弄到了一个浦城盐大使的官职<sup>①</sup>，这种官职属于佐杂一类，根本不列等级，是最起码的小官，可是，就是这样的小官，也只做了半年，因为爆发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到北京，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税务局中又继续做了几年科长。

封建时代的官场，不论大小官员，都得讲究一个官派。这种腐败的风气，在韬奋出身的那个家庭也不可能不有所反映，其中之一是置妾。比如，韬奋的祖父有一妻二妾；韬奋的父亲虽然经济上经常处在穷困之中，在福州候补时潦倒要领取“仓米”（用现代话来说，即领取救济粮）来维持生计，但是一妻之外，也还置了二妾。因为这个缘故，韬奋的父辈和韬奋的这一辈，兄弟姊妹都很多<sup>②</sup>。韬奋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他的那个旧家庭时常常称之为大家族，就是指此。当然，在今天的新社会中，再也不会产生子女这样众多的大家庭，也不会存在象《红楼梦》中的探春因为是庶出<sup>③</sup>而不认

---

①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盐场场长。

②韬奋的父辈兄弟姊妹共有二十二个之多，韬奋自己这一辈，兄弟姊妹也有十四、五人之多。

③按封建礼教，妻所生子女称为“嫡生”，妾所生子女称为“庶生”，在封建社会中，对庶生子女常常有所歧视。

自己的生母为母亲的那种奇特的不合情理的乖戾现象。

不过，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崭新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离开它所脱胎而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时间上毕竟距离并不遥远，还不到三十年，它必不可免地要残存下来许多旧的痕迹。我们从韬奋原来的名字邹恩润这三个字上就可以找到这种痕迹。韬奋和我都从来没有追溯过他的家族的祖先，更没有穷根究底地去考据过他的家族的谱系，但是，韬奋的父辈的名字以及由韬奋的父亲命名的韬奋这一辈和韬奋的子女的名字，确实是按照邹家祖先在家谱中早就定下来的“国恩嘉庆”这四个字的次序来区别辈分，维系这个民族的谱系的。封建制度在我国既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维系封建氏族的谱系解放以后自然也就中断，并且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消亡。

为祖父奔丧和护送他母亲的灵柩回祖籍江西余江，韬奋在老家只停留了短暂的时间。之后，又随他父亲仍回到福州。这时，他父亲延聘了一位老师在家里办起了家塾，韬奋和他的弟妹，还有他的一位比他小两岁的小叔叔，一起在这个家塾中继续接受封建时代传统的启蒙教育，读的无非是孟子见梁惠王这一类在封建社会中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当然也免不了冬烘先生的戒尺的惩罚。

有一天，家塾里的老师要韬奋的二弟恩泳背书，当时恩泳才九岁，他嘴里一股劲唔唔的发出哭声，眼睛里却露出惊恐的神情注视着地上。顺着他的目光低头一看，原来地上爬着一条五、六寸长的蜈蚣。韬奋在旁，毫不犹豫地脱下脚上的鞋子，使劲拍打，几下就打死了。这时老师对韬奋说，你到厨房里去削一根两头尖的竹签。一头插入蜈蚣的头部，一头插入尾部，把它绷开晾干，可以做药。韬奋如法炮制，把打死的蜈蚣绷开晾好。到这天半夜里，不好了，韬奋的

头部肿得象巴斗一样大，还发着高烧，和他一起同睡的小叔叔被他的呼痛声惊醒，立刻叫来了韬奋的爸爸，可是，这时正是半夜，无法请医生，只得先把家里常备的梅花点舌丹敷了，天明，请来医生，证实是中蜈蚣的毒了。经过半个月的医治才好。事后，他的小叔叔劝他，以后不要再打了，可是韬奋却不以为然，还说：“再大，也要打，打死了，把它拿到厨房里烧成灰，决不能让它再去害第二个人”，这样的小事，在韬奋也许早已完全遗忘了，在他看来，不过做了一件平常的每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样做的事。不过，这件事对于现在还健在的八十多岁高龄的小叔叔却留下了长久的深刻的记忆，至今说来还是那样亲切。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韬奋和他的小叔叔被送到福州工业学校去就读。这个学校设置预科和本科，预科三年，本科二年，本科分设电机和土木工程两科。学校设在离城十里的南台，韬奋和他的小叔叔同住一间宿舍。

在他小叔叔的记忆里，幼年时代的韬奋是一个长得漂亮，爱好整洁的少年，能写一手好字，功课经常名列第一。小叔叔的记性比韬奋好，功课则不如他。有时，小叔叔有什么题目做不出，去问韬奋，他总是严肃地对他的的小叔叔说：“叔叔，你要用心念书，你应当自己去好好想想，不要以为我会告诉你，”毫不因为他是叔叔而徇情。而他的小叔叔却常常要摆出做叔叔的架子，直呼韬奋的小名：“书书<sup>①</sup>你看我做对了没有？”如果做对了，两个人会高兴得拥抱起来。

韬奋虽然经常考第一名，但并不倨傲，他常常鼓励他的小叔

---

<sup>①</sup>韬奋的乳名荫书。

叔,对他说:“叔叔,你应当赶过这个第二名。”他的小叔叔对此是不服气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第二名是靠夹带得到的,这算什么真本事,又有什么光彩。韬奋又进一步说服,对他说:“我总没带夹带吧,你应当把我也打下去。”

韬奋和他的小叔叔住在学校里,每周回家一次。那时福州城里代步的交通工具有一种叫野轿的,这种轿,名虽为轿,实际上和四川流行的滑竿相类似。两根竹竿,中间用绳索绑起一只藤椅,不过多了一个顶,四周围以布幔,前面多一个布帘而已。从城里到学校,坐这种野轿,两个孩子坐一起,也不过两个毫子。星期六下午,学校没有课,不读书,从学校回家,韬奋和他的小叔叔经常是慢慢地步行回去,星期天回学校,家里照顾他们俩年岁还小,经常给一点钱,让他们坐这种野轿回校。但他们俩却常常宁愿走回去,把省下来的钱去吃一碗馄饨或包子之类的点心,因为平时他们没有条件作这种非分的享受,而福州的馄饨却是十分美味的。有时,也到离学校有里把路的茶亭中喝一杯茶,吃一点点心,作一番可心的休息。

韬奋对弟妹十分友爱,为人热诚真挚,正直不苟,不徇私情,对后进总是竭诚鼓励奖掖,这些品格,在幼年时代的韬奋身上,不是也可以看到它明晰的影子么?

辛亥革命以后,韬奋的小叔叔回到江西余江老家,转到南昌继续读书,韬奋则到上海进了南洋公学。生活把这两个幼年时代在一起共同生活过的少年伴侣送上了不同的道路。

#### 四、最初的足迹

时隔半个多世纪,现在来回顾二十年代中叶我和韬奋刚结婚以



后那几年，应当坦率自承，我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妇女。我生在清朝末年，长在民国初年，我没有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也没有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洗礼，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在我身上固然影响不深，妇女独立的意识也不强。我对我的婚姻是满意的，因为韬奋是一个有知识的正派人，身上也没有我所厌恶的那种铜臭；经济生活虽然算不上富足，但也并不拮据；他信赖我，把经济权和家事全部托付给我。我感到美满和幸福，我觉得做好我丈夫的贤内助，操持好家事，抚养好孩子，使他在家庭中生活得更加舒适，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到工作上而无后顾之忧，是我的天职。我们的家庭是温馨的，外面的风暴吹不到窗户里面来。而韬奋对于这样的家庭生活，显然也是感到愉快而满意的。

韬奋虽然是苦读书出身<sup>①</sup>。他所受的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教育，可是他又生为中国人，并且正处在中华民族和广大工农人民大众苦难的时代，所有这些，对于他的思想演变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影响。

中国的知识分子，即使在封建社会里，也可以分成两类。多数人把读书中举当作登龙术、敲门砖，一旦头戴乌纱帽，除了感激皇恩浩荡，为专制王朝的皇帝老子效忠外，免不了也要为自己效劳一番。“一任清知府，三千雪花银”被认为是正当之举，不这样，又怎能显亲耀祖，衣锦荣归；“任凭东风力，送我上青云”，找个依附，作为升官的阶梯，这是当然之途。《红楼梦》中薛宝钗劝说贾宝玉要留心的所谓仕途经济，就是如此，这还是被视为读书人的正

---

<sup>①</sup>韬奋读书，几乎完全靠自己，靠他投稿、做家庭教师以及借债，才勉强大学毕业，可参阅《经历》。

途的。至于那些丧尽廉耻，专靠胁肩谄笑。甘愿舐痔吮痛的丑类，又何时何处无之？不过也有一些穷苦读书人，因为家庭出身或平时生活接近下层，就是做了官，还能下察民情疾苦，敢于谏诤，敢于为民请命的，也有一些看不惯人世间的种种污浊不平，愤世嫉俗，因而遁世隐名，或竟入了空门的。

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现代的知识分子，情况也大体差不多。要么依附于统治阶级，奔走于权贵之门，做了统治者的鹰犬、帮凶或帮闲，要么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当然也有对统治者尚存幻想，然而并非前者、或者虽有爱国爱民之心，暂时还不愿，不敢站到统治者的对立面，但是演变的结果，最后仍脱离不了上面说的两种归宿。

现在且让我们接着韬奋的足迹。看看他走过来的轨迹。韬奋自己说过，他去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交通大学的前身）读书，是因为他的父亲想把他造就成为工程师，可是韬奋志不在此，他的志趣是想当一名记者，因此，勉强在电机系读了两年之后，还是决心转到了圣约翰大学。大学毕业，在社会上已经工作了几年，仍然千方百计地想做一个记者。最后，接办《生活》周刊，算是实现了他的心愿，并且一直到死，成了他的终身职业。

我们知道，鲁迅和郭沫若早年都曾到日本学过医，可是最后又都改了行，从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业绩。读过鲁迅的《药》和《父亲的死》的，都会知道鲁迅在青年时代有慨于庸医杀人<sup>①</sup>，才立志学习新的医学科学。以后发现做一个

---

<sup>①</sup>鲁迅并不是一般的反对中医，而是反对迷信愚昧和不科学，尤其反对庸医。读者自当正确理解。

医生，充其量只能救个别的病人，远不如从事新文艺和新文化运动，能使千百万人民群众震聋发聩，从蒙昧无知的落后状态中醒悟过来。又毅然放弃了医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新文化运动。郭沫若的情况与此类似。

韬奋究竟为什么不愿做一个工程师而立志想当一名记者，据韬奋自述，是有位叫作远生（即黄远庸）的记者在《时报》上写的《北京通讯》使他“着了迷”，使他“佩服得很”，“常常羡慕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理由是：“第一他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探访新闻的能力好，写得好，都是属于技术性质的，因为这样两个理由居然对韬奋发生了这样巨大的魅力，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不过，韬奋还是向我们透露了他想当一个新闻记者的真实原因的信息，因为接下去他说：我当时对于他的为人怎样完全不知道，但是在文字上认识了他，好象他就是我的一个极好的朋友。后来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着重点是我加的——沈注）而冒险南下，我已在中学里，对于他的安危，简直时刻担心着，甚至有好几夜为着这件事睡不着。他离开上海赴美国，途中还写了好几篇短小精悍、充满着朝气的通讯登在《申报》上，是我生平最倾倒的佳作。我正切盼着他能继续写下去，不料他到旧金山的时候竟被暗杀，真使我悒郁不欢，好象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读了这段文字。我们知道，真正使韬奋倾倒的是远生的为人，是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因此在他冒险南下的时候，就为他的安危耽心，在他终于被暗杀以后，韬奋好象死了一个好朋友那样悒郁不欢。

值得注意的是，韬奋认为“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还是“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韬奋离开小学是在一九

一二年，正是辛亥革命的翌年，其时韬奋十八岁。从一九一二年心里就决定当新闻记者，到一九二六年接办《生活》周刊做成新闻记者，中间经过了十四年。为了实现他在十八岁时在心里决定了的做成一个新闻记者的宿愿，我们看到，在这十四年中，他曾有过两次重大的决定，一次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九一九年从南洋公学转入圣约翰大学，从工科改读文科；另一次是在已经工作以后，宁愿拼弃待遇比较优厚的其他一切工作，去接办每月月薪只有六十元的《生活》周刊，而且还得一个人唱独脚戏。韬奋自己虽然用极为平淡的语辞叙述了这段经历，但我们还是可以体察到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作的努力。他后来终于从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的战士。决不是偶然的，我们从他早年的活动和思想中，不难找到这种线索。

（陈敏之整理）

## 延安新秧歌舞运动产生的前前后后

李焕之

陕北民间有秧歌舞和秧歌调，这是抗战初期到延安去的人都知道的。可是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普遍地重视，也没有人去提倡它，只是偶然在什么庆祝活动的群众场合上出现一下，那时还只是旧式的传统秧歌，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没有多大改变。可是过了五年，即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工作者好象得到了一把金钥匙，一下子把民间艺术的宝藏打开了。原来被认为是“粗俗”的旧秧歌，顿时焕然一新，从延安城东门外的桥儿沟扭起来，一直把全延安城都扭得红火热闹，一直扭遍全陕甘宁边区，从抗日战争扭到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全中国都扭遍了。

就在一九四三年的春节，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和新的作法，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新秧歌运动。记得一九四三年初，春节即将来临的一个晚上，在鲁迅文艺学院的大院里，锣鼓敲打起来了，人们蜂踊而来，大家都要来共享新秧歌彩排的欢乐。当秧歌舞跳起来的时候，一种感奋之情涌上心头，我看到了音乐系的同学们，一年前，他们只能穿起整齐的演出服，列队在舞台上严肃地唱混声合唱；而现在呢，也都化妆成各种不同的角色，一个个红光满面，喜笑盈盈地跳着、唱着。我好象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使人感动的歌声，他们唱的是：“一九四三年，

正是那好春天，秧歌旱船闹得欢；打起一阵锣鼓来呀，越唱越唱不完。”这是用陕北民歌《张生戏莺莺》、《小郎回家》和《绣荷包》三首调子配上新词的歌曲。这些都是很普遍的民歌，在陕北居住的人，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但今天它们填上了新词，从我们新秧歌队员的口中唱出来，竟然是这么动听，这是什么原故呢？这是因为：大家看到文艺工作上出现了新的气象，并且亲身参与了这个极有意义的创造工作，怎能不感奋起来而纵情歌唱呢！

本来在一九四三年的元旦，为了庆祝新年，开展拥军、拥政爱民活动，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鲁艺的四个系——文、音、美、剧——的同志们自觉地发动起来，当时为了搞秧歌就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向老乡们学习。譬如“伞头”、“打场子”以及各种秧歌舞的队形等。但元旦这一次的秧歌队中，还有不少旧秧歌中滑稽的东西，比如男的打扮成丑老婆子，脸上画白，耳朵戴辣椒，手里拿着棒槌等。后来到了春节，新秧歌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更多的人参加到秧歌队里来，而且真正显示出崭新的阵容，大秧歌队以镰刀、斧头领头，人物形象全是工、农、兵、机关干部、学生、少年儿童等，丑化的人物形象消失了。新秧歌的表演形式是在原有的民间形式上换上了新的内容，譬如“推小车”、“跑旱船”、“打花鼓”、“赶毛驴”、“小场子”等，但只要把它们用来歌唱新人新事，就自然推动了艺术形式的发展。在一九四三年的元旦到春节的秧歌活动中，鲁艺秧歌队创作了《拥军花鼓》（二人花鼓）、《七枝花》（四人打花鼓）、《军盐》（赶毛驴）、《旱船》、《推小车》、《刘二起家》（快板剧）和著名的小秧歌剧《兄妹开荒》等等。

陕北秧歌经过这样改革，这种民间艺术也就大大地提高了一

步，不仅专业文艺工作者给予了秧歌以新的思想、新的感情，革新了原有的艺术表现，同时也推动群众的秧歌队都纷纷进行改革。当时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都成立了秧歌队，四乡的群众也都热烈地搞起来了，把许多优秀的民间传统形式挖掘出来，赋予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血液，因而使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从这一次搞起了新秧歌之后，不仅每年的元旦、春节都要闹秧歌，就是其它节日如红五月、十月革命节（即十一月七日）以及其它重大的国际、国内政治活动，只要一号召，秧歌队的大旗就打起来，走向街头、广场，真是热闹非凡。每一次秧歌活动都要出现一批新鲜的节目，一九四三年底鲁艺秧歌队从绥德、米脂一带巡回演出归来，就带回来《减租会》、《周子山》等新秧歌剧，《减租会》是用陕北道情的音乐编写的，宣传党中央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剧在群众中发挥很大的宣传作用，其中的主要唱段就是著名的《翻身道情》。一九四四年春节，鲁艺秧歌队到南泥湾的驻军三五九旅去劳军，又增添了新的节目，如八个姑娘《挑花蓝》，她们走着轻盈的舞步、闪动着花挑子、唱起了悠扬悦耳的歌声：“花兰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这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歌曲《南泥湾》。过了不久，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于是“胜利腰鼓”就敲打起来了。“腰鼓”这种民间形式是很有英雄气概的，一九四三年底鲁艺秧歌队到绥、米时就从民间学了回来，但腰鼓舞的舞步、动作的技术性较强，学一两次是不行的，后来又反复地向老乡学习，而在《胜利腰鼓》中，从音乐到编舞都获得很大的发展，《红军大反攻》是它的主题歌，是写得比较成功的，这雄伟明朗的歌声唱道：“正月里，刮春风，延河岸上草青青，打起

一阵鼓，跳起一阵舞，咳，咳！红军大反攻。……”这曲调的民间音调特色很浓，听了使人既振奋又亲切。

边区的群众非常喜爱新秧歌，欢迎这种新式的秧歌队。当鲁艺秧歌队一出去演出，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人山人海的，那种情景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延安城的北门外有个“文化沟”，那是在一个山沟里，沟宽有二百米左右，两面是山坡，鲁艺秧歌队在文化沟演出时，山坡上全坐满站满了人群，尽管没有什么扩音喇叭，但山沟本身就是很好的扩音设备，整整演出过程，观众们都是这样的全神贯注在观看、欣赏，时而发自内心的欢笑，鼓掌。秧歌队常常是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每天都要连续演出好几场，不少老乡怀揣着干粮从几十里地以外跑来看我们的新秧歌，我们演一路，老乡们就跟一路，屡看不厌。群众亲切地称呼我们：“鲁艺家的秧歌队来了！”

在整个新秧歌活动中，我都是作为一名乐手参加到行列里，有时击锣敲鼓，有时吹笛，有时又拉起了手风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很有兴趣地担任。如果说这是文艺工作的一种方式，倒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比起舞台生活来使你感到在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群众大大地靠近了，甚至在许多场合里，一种和群众同欢乐、共呼吸的感情油然而生。

一九四四年的五月里，我们这支小小的乐队——由小提琴、板胡、二胡、笛子、三弦、手风琴和打击乐所组成的十一、二个人的小乐队，被派到志丹县去参加新建志丹陵墓的落成及公祭大典。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除了经过许多没到过的乡村城镇，走了不少路程，观光了沿途的陕北老乡的生活景象外，最可贵的是我们这支小乐队不是作为到群众中去开展文化娱乐生活的工具，而是作为直接参与边区人民重大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一次严肃的政治生



活，在接灵、祭灵的行列中，我拉着手风琴，也有时吹着竹笛，或而行进在山路上，或而伫立在灵堂旁边和院落里。我们首次演奏着革命人民的《葬礼进行曲》——这就是我们现在追悼会上所奏用的《哀乐》，这支乐曲原是陕北民间的唢呐曲，经过我们的选用、演奏，赋予了这支乐曲以深厚的悼念之情，它有着中国人民特有的音律和音调。除了我们这支小乐队外，不少民间的吹鼓乐手也都云集这里，所以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时机。我们常常和民间吹手在一起，细心地聆听他们演奏各种民间传统乐曲，虽然当时没有把他们的吹奏详细记录下来，但经常用心地听和观察艺人吹奏的神情，比偶然记录一次乐谱的感受要深得多。这一次祭灵活动好象与本文回忆延安新秧歌运动毫无联系似的，其实这正是“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的组成部分。

一九四五年初的春节，我是在乡下和群众一齐渡过的。我们由六人组成的下乡小组被分配到陇东分区（甘肃省东部）去组织群众闹新“社火”。到达分区以后又都分散活动，我一人到了陇东南部的镇原县，这个地方“曲子戏”（即俗称“郿邬”）非常盛行。这里的春节是不跳秧歌的，而是闹“社火”；其实社火的内容同陕北闹秧歌有很多是共同的，如高台、踩高跷、跑旱船、竹马等形式。也有各种小场子，但“曲子戏”是这里的老百姓最喜欢听的。这一年的春节和在延安过春节又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应该说感受和体验更其丰富了。如果说延安的新秧歌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鲜的生活体验，那么，下乡同群众一道欢渡春节，一同排演，一同闹“社火”是更其新鲜的生活体验。我不仅学到许许多多的民间音乐，如陇东曲子戏、秦腔和陇东道情等，而且是真正体验到和群众同欢乐共呼吸的感情。特别从春节到元宵节这些日子里，常常在夜晚参加群众的

社火活动，我作为社火队中的普通一员，有时提灯，有时打起火把，脚下踩着刚下过雪的小路，走在一望无际的陇东高原上，从这个塬走到另一个塬，从这个乡走到另一个乡。队列浩浩荡荡，锣鼓声在塬上夜空中回响。乡乡都有社火队，高原上四处都沸腾着人声的喧嚷，火光与灯光闪烁，歌声与乐声交融，真是一幅热气腾腾的节日夜晚的动人景象。

回想起在延安渡过的新秧歌运动的三个年头，尤其是每年的春节，总是感到很有意义。这个传统的节日成了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在最大的范围内见面的时候。春节好比是边区人民大团结的节日，而秧歌队则成了党政军民学各界的友谊之手，通过它相互关怀问候，交流革命的情谊，鼓舞革命的斗志；同时又是相互观摩、取经学习的桥梁。桥儿沟乡的秧歌队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到鲁艺院内拜年来了，看了老乡们的新秧歌，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民间艺术的特色。你听那“老伞头”领唱的秧歌调，那纯朴动听的曲调，唱出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亲密无间的情谊。

以上的一些回忆，尽管光阴消逝了，但记忆总是十分新鲜，永远不会磨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着手写一部大型的管弦乐组曲，取名《春节组曲》，共有四个乐章：（一）序曲——大秧歌；（二）情歌；（三）盘歌；（四）灯会。这就是我用音乐的艺术形象，记录下我在延安新秧歌运动中的种种感受与体验。

# 艺坛生活漫忆

王人美

## 家庭和童年

一九一四年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原籍是湖南省浏阳县。我共有兄妹十一人，我排行老十，下面还有一个继母生的弟弟。王人美是我后来到中华歌舞团时改的艺名，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王庶熙，从“庶绩咸熙”一词引来，意思是我将来诸事成功，前途美好。

我父亲叫王正枢，号立庵。他是当时湖南有名的数学教员，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不但数学好，还喜爱古文、书法，对医道也懂得一些。父亲为人刚直，思想开明进步。他对祖国的贫穷落后和劳苦大众的饥寒交迫充满忧虑，对于军阀割据、烽烟四起的战乱局面十分不满。他幻想着用发展工业的办法来搞



王人美 近影

“实业救国”复兴中华。因此，他自己省吃俭用，东借西凑，送我大哥王人旋到德国留学。大哥在留学期间结识了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他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以后转到苏联学习，不料被王明清党时开除出党。据说是他给当时一位俄国女教师的俄文教学方法提了意见，遇到校方斥责，他一气之下不学俄文了，王明等人把他转到一个工厂去劳动，清党时就以他不学俄文为理由把他除名了。一九三〇年他从苏联回国，在南宁居住。一九六四年病故。

大哥留学以后，我父亲再没有力量供其他子女上学深造了，我的几个哥哥姐姐只得相继进入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在师范读书时，我的几个哥哥和毛泽东同志是同学，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后来相继参加了革命。

我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毛泽东同志是他的学生。父亲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器重，常在我们面前夸奖他，说他勤奋、刻苦、有才华、有胆识，是个很不寻常的人。那时，毛泽东同志专修文史，对数学不感兴趣，考试成绩不很好，有时甚至交白卷，但我父亲总是给他记六十分。因为当时校方规定：国语、数学、英语三门中有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升级。后来，学校发现了毛泽东同志参加革命活动，几次要开除他。为此，我父亲曾和杨昌济、袁吉六先生先后出面向校方做过保。有一年暑假，父亲把毛泽东同志接到我们家中度假，我那时年龄很小，现在只记得毛泽东同志那时个子高高的、总爱穿件灰布长袍，走起路来步子很大，很矫健。毛泽东同志经常和我几个哥哥在一起谈论问题，有时谈得很高兴，声音很大。我虽不懂他们谈些什么，但觉得他们都很了不起。

一九五六年庆祝中国电影协会成立时，毛主席接见我们代表并合影，在合影前，主席特意把我叫过去，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

中的情景。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毛主席到上海，又特地让人找我去他那里，不巧我到外地出差，毛主席接见了我的二嫂。

建国以来，毛主席对我们全家，对我都一直很关心。一九七三年四月，我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突然获得了“解放”，允许我回到北京去治病。后来才听说也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

我的母亲姓陈，名字就记不得了。她性情温和、贤慧，一生操持家务。她虽不识字，但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我们子女的学习抓得很紧。记得我刚四岁时，就由哥哥姐姐教我识字，背古文。每当我们一起学习时，母亲就安详地坐在一旁做活计，对我们进行“监督”。在我五岁那年，有一天，她的高血压病突然发作，当时她正坐在椅子上，就这样坐着与世长辞了。

我母亲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无人照料，在我父亲的朋友的劝说帮助下，又娶了我的继母曹忆娥。她来我家后生了一个弟弟名叫王季能。在我父亲去世后，她带着弟弟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是个思想进步的妇女，在一个党的联络站当户主。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革命同志都在那里开过会。后来，这个联络站遭到敌人的破坏，继母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为躲避敌人搜捕，带着弟弟东躲西藏，四处漂泊，有时甚至住在人家的猪圈里过夜，生活十分艰苦。奔逃中继母在精神恍惚中落水而死。弟弟王季能被一个表哥收养，后来打听到我大哥在南宁，便把弟弟送到大哥那里，此后就由我大哥把他抚养成人。现在他在新疆搞建筑工作。

我六岁时，父亲把我送到师范附小念书，当时，我大姐王雪华、二姐王明夏都在那里教书，这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期。我每天背着书包上学，一边走一边踢着路边的石子玩，有时一块石子一直踢到学校门口才罢休。由于在家里打了一些基础，在学校

学习时,并不觉吃力。那时学校开恳亲会,有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孩子张式愚上台表演,她随着歌声的拍节,忽快忽慢,步子轻盈地跳来跳去,我感到既新奇又羡慕,心里十分喜爱,以后还每每想到她歌舞的姿态。进了第一女师,老师教我们唱《国际歌》、《满江红》、《苏武牧羊》、《木兰从军》等。我十分喜爱,学得也很认真。放学回家我就把刚学会的歌教给弟弟。这就算是我对歌舞艺术最早的接触吧!

在这一段读书生活中,我印象较深的是经常上街游行。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每个人都拿着一面纸糊的小旗子,有红的、绿的、黄的,喊着“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列强”等口号,在闹市上走过,挺神气,很多人站在路旁观看,我们更喊得起劲。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种子。

### 到上海学歌舞

一九二六年我十二岁时,考入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就在这年的秋天,旧历八月十三日,我父亲病故了,他是旧历八月十九日的生日,差六天就是六十寿辰,竟没能活到那一天。他患有糖尿病,那年初秋乘凉时被黄蜂蜇了一下,以后化脓成疾,总不能封口,又缺乏良药,加上劳累过度,就这样离世长眠了。父亲去世后,二哥王人路从上海回来奔丧。因为王人路会画画,在家时也曾教过我三哥王人艺,加上耳濡目染,王人艺也居然能画上几笔,他俩一起画了父亲的遗像。

二哥走后,三哥觉得自己会画像,便写了个专画人像的广告牌子,挂在大门口。过了几天,果然有一个中年人敲门前来画像。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家,他问我:“这里画人像吗?”这是我第一次单

独接待外人，心里很紧张，但我还是满有勇气地说：“画呀，但画像的人出门了。你把像片留下来，过几天再来取就行了。”他正在掏像片时，恰好我三哥从外面蹦蹦跳跳地跑进来了，我赶快说：“画像的人回来了。”那人回头朝我三哥上下打量了一番，看我三哥才十三、四岁，个子不高，还是个孩子，摇摇头，收起像片走了。我冲着三哥埋怨说：“看你，我好不容易给你说好的生意被你自己冲跑了。”后来，我们提起这件事还觉得挺好笑。

后来，二哥和大姐、二姐继续供我读书。当时，二哥王人路、大姐、二姐、三姐都在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总政治部参加北伐革命工作。记得是第二年暑假，他们把我和三哥王人艺接到武汉度假。谁知道刚过了不几天，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开始搜捕和屠杀革命党和进步人士，我们兄妹都匆忙地先后离开了武汉，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竟互无音信。我和三哥王人艺跟着二哥来到了上海。

二哥在参加北伐军以前，曾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当过一段编辑，黎锦晖那时是这个部的部长，他们在一起创办过《小朋友》周刊。黎锦晖在上面连载自己编写的儿童歌舞，二哥给他配画，两人相处得很好。我还记得二哥曾把他们编辑出版的第四期《小朋友》周刊寄给我，周刊的封面上用我王庶熙的名义写了“小朋友”三个字，放在三个小圆圈里，字写得歪歪斜斜，象是小孩刚学写字时写的一样，很有趣味。我喜欢得不得了。一九二六年，因为二哥王人路和潘汉年等几个青年编辑参加了中华书局的工潮活动，黎锦晖被指控是他们的后台，不久，他们便都相继离开了中华书局。

黎锦晖离开中华书局后，一九二七年二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大革命失败后，

这所学校也就解散了。一九二七年冬，黎锦晖又重整旗鼓，办起了“美美女校”，仍是培养歌舞人才，当时我们正无处投奔，于是二哥王人路便带着我和三哥投奔了黎锦晖的“美美女校”。

我们兄妹三人进了“美美女校”以后，二哥搞布景和服装设计，三哥喜欢音乐，进了乐队学弹拨曼陀林这种乐器，我就学习歌舞。美美学校一共有十来个女孩子，有几个是大一些的。是我们的“小先生”。记得有黎明晖、薛玲仙、徐来、章锦文等。其中黎明晖是黎锦晖的女儿，她不仅是歌舞表演的台柱子，而且是名闻上海的电影明星。她从十二岁就活跃在银幕上，曾先后在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拍摄的《小厂主》、《透明的上海》、《探亲家》等影片中担任主角，演技很好，蜚声影界。她性格开朗、倔犟。北伐失败后，上海的封建势力卷土重来，一时女孩子们都得留长发，穿长袜，否则就会招来攻击、责难。而黎明晖却偏偏留着齐耳的短发，赤脚跳舞。这些举动，当然不符合封建女子的规范，把一帮封建遗老遗少气得不得了，招来不少咒骂、斥责，但她全然不理睬；当然这种举动，也获得大批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的支持和赞扬，并广为传播，名声大振。据说，有的观众给她写信，不写她的名字，只在信封上画上一个短发的姑娘头像，她居然能收到。

“美美女校”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三、四个月的光景，但这一段生活，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学习中因为没有专职教员便采取老生教新生的办法，称为小先生制。我因从小喜欢唱歌跳舞，赛跑打球，所以学习的兴趣很高，进步也较快。黎锦晖发现我学得快，嗓子亮，又能识谱，对我很欣赏，他认为我对音乐有特殊的天赋。记得他编写了歌曲后，常常先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他弹琴，让我试唱，唱几遍，我就记住了。有时他也根据我唱的效果对歌曲



进行修改，歌曲定稿后，就让我来教别的孩子。

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是学习和排练了一些童话歌舞和儿童歌舞。记得有《三蝴蝶》、《葡萄仙子》、《春天的快乐》、《小小画家》、《月明之夜》、《可怜的秋香》、《麻雀与小孩》等剧目。这些剧目的曲调、歌词都很通俗、上口，易于掌握，内容也都是比较健康，较有教育意义的。如《三蝴蝶》的剧情是描写了三只蝴蝶在恶劣的天气中，不畏困难，团结友爱，共同向困难做斗争的故事。教育孩子们树立不怕困难团结斗争的精神。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排练，一方面在歌舞艺术上为我打下了一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剧目的排练，也受到一些良好的道德品质的教育。同时，也提高了我的文学水平。我因只上到初中一年级便中途停学，知识面不广，这些剧目的歌词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是很好的教材。这里，我认为黎锦晖早期编写的儿童歌舞剧，不论在陶冶儿童心灵上，还是在促进民族歌舞的发展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而有人抓住他后来写的一些爱情歌曲，便给他扣上“黄色歌曲鼻祖”的帽子，这是很片面、很不公正的。

### 随中华歌舞团下南洋演出

一九二八年春，黎锦晖为了摆脱军阀的压力并筹集经费，同时也为了提高演出技艺和宣传国语（南洋一带的帝国主义不愿华侨推行国语），决定把“美美女校”改为中华歌舞团，准备到南洋各地去巡回演出，这样又赶排了一些新节目。这时钱萋萋来到了歌舞团。当时我们正在排练《春天的快乐》，这个节目中，前面有一段介绍剧情的引子，需要有一个国语发音好的人朗诵。她从小生长在北京，国语说得很好，让她试诵，果然嗓音嘹亮，口齿清楚，语调

表情也不错，大家都很高兴。后来，她作为黎锦晖的养女，改名黎莉莉，以后曾主演过电影《火山情血》、《小玩艺》、《到自然去》、《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等影片，成为三十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后来，她的弟弟钱江也来到上海投身歌舞团，现在已成为著名的电影导演了。

五月，中华歌舞团乘一艘海轮离沪出访。临行前，田汉、郑振铎先生特地来看望大家，他们鼓励我们说：“这个史无前例的活动很好，希望你们为国争光。”这样，我随歌舞团第一次飘洋过海，开始了我的艺术生涯。

第一次登上出海的轮船，我感到很新鲜，记得那条船很大，船上吃的也是西餐，船员都说英语。船驶到大海，我更感到惊奇，那辽阔的海面一望无边，海风习习，海浪翻涌，群群海鸥在海面上上下下自由飞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壮丽景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这次巡回演出，先后到了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前后历时八个月。演出受到各地华侨的热烈欢迎，经常应观众要求加演几场。这次演出中，我们这些新学生主要是在一些剧目中当配角，但也受到很大的锻炼。有一次演出《小小画家》时，担任主角的黎明晖突然嗓子不好了，唱不出来；由于黎锦晖写的曲子都由我试唱过，所以便让我在后台配音，这样，她在台前表演，我在后台唱，两人演双簧似的，居然效果很不错。

这次演出，我们每个团员都有场费，这是我第一次领到了自己劳动换来的工资。当时很激动，把钱捧在手里，左看右看，也舍不得花。我在南洋巡回演出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收获，就是搜集了许多各地的小玩艺，有各国的不同形状的银币、木制的小船、编织

的工艺品、明信片等。我特别喜欢收藏这些小物件，真可谓满载而归了。这些东西，我曾精心珍藏几十年，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时，大部分失散，至今仅有一小部分保存下来，成为我很珍贵的纪念品。

一九二九年，我们从南洋回到上海，因为当时盛行用英文唱《外国歌曲一〇一首》。黎锦晖的弟弟黎明出资把我送到南洋高商附属英语专修学校上学，这所学校是两个华侨办的。刚去不久，在一次欢迎董事长的联欢会上，让我们出节目，那时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临时组织了几个同学边教边排歌舞剧《小小画家》，居然演得效果很好，全校轰动，校长十分满意。从此就让我兼了中文唱歌教员，不但不收我的学费，每月还给十元钱工薪。后来经我联系介绍，黎莉莉也进了这个学校学习。我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学习很吃力，抱着一本英语原文的《青鸟》读本，只能像鹦鹉学舌似的死记硬背。那时，我唯一的乐趣是放学回家后，一边弹那架租来的钢琴，一边放声高唱心爱的儿童歌曲。每次我唱歌时，都招来很多里弄里的听众。

### 在“明月歌剧社”的日子里

一九二九年冬天，黎锦晖回到上海，又组织了“明月歌剧社”，我和黎莉莉都回到这个团里。

一九三〇年初，明月歌剧社来到北平，又吸收了一些新团员。这时，我已经变成了老学生，除自己练习排演外，还教新学员。四月份，清华大学举行联欢会，我们参加演出。我和黎莉莉第一次担任主角。演出《三蝴蝶》、《小小画家》等舞剧，在《三蝴蝶》中，我演红蝶，黎莉莉演白蝶；在《小小画家》中，我演小画家，

女友是黎莉莉。我们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演出。以后又在北  
京一个很大的戏院公演，都颇受欢迎。我除在歌舞剧中担任角色外，  
还有一些独唱节目。后来又天津演出，也很轰动。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演出，全是黎锦晖安排角色，他创作  
剧本时，也考虑到我们每个人的特长，所以安排得也较合适，从我  
自己思想上，也没有争演主角不愿当配角的念头，别的人也是这样，  
所以很少发生为争演主角闹意见或闹情绪的事。我从小过惯了  
集体生活，虽然有了点名声，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总感到是集  
体的功劳，无论谁演出受到欢迎，自己也觉得光彩，始终将自己和  
集体看成一体。现在看来这一点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后来，我们到了沈阳、大连、哈尔滨演出，在哈尔滨上了一个  
流氓老板的当，当时签定了演出十天的合同，但演出时，是一张票  
看一天，舞台不能空着，我们只好重复演，场场相接，我们疲于奔  
命，声嘶力竭，饭也顾不上吃，劳累不堪。才知上了老板的当，也  
没办法，只好演了十天，结果不但没收入，还欠了老板的债。在旧  
社会当演员“闯江湖”，真有说不尽的辛酸经历啊！

一九三一年，我国的电影事业有了发展。联华影业公司的经  
理罗明佑为搜罗人才，把我们都吸收到公司，让改名为联华歌舞  
班，开始，我只是随着参加拍摄几部歌舞短片，后来，才拍摄了  
故事片《野玫瑰》、《渔光曲》等影片，从此，我也就踏上了影  
坛。

### 为孙瑜同志说几句话

在谈到我的影坛生活之前，我想首先谈谈孙瑜同志，因为他不  
仅是我国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而且是个才华出众的编导，是我们



1934年王人美(中)与导演孙瑜(右一)  
蔡楚生(左一)在一起

电影界的“伯乐”啊！

孙瑜同志是清华大学的文科毕业生，后来他去美国专修戏剧电影，一九二七年回国。他从编导第一部故事片《潇湘雨》（长城公司出品）开始，直至五十年代，总共编导了二十多部影片。其中《大路》、《小玩艺》、《天明》、《野玫瑰》、《野草闲花》、《乘风破浪》等片思想内容是比较进步的，艺术手法也是新颖的，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他毕生从事电影创作，有着许多宝贵的经验，他很善于发现、培养和使用青年演员。大家知道，作为电影导演，选择演员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当然，挑选有经验的演员，工作起来就比较省力，成功的希望也大。而挑选初出茅庐的演员，不但导演的担子要加重，而且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孙瑜从发展电影事业的需要出发，努力发现、培养新演员，把很多青年引上了影坛。

就说金焰吧，三十年代之所以被观众誉为“电影皇帝”，并不是一踏进影坛就是“明星”。除了金焰自己的努力外，是与孙瑜的

帮助分不开的。一九二七年，金焰正十七岁，他参加了明星电影公司的工作。两年后，他才在故事片《热血男儿》中扮演了一个小铁匠，是一个次要的角色。后来金焰离开电影界加入了南国剧社。

一九二九年，孙瑜从长城公司转入明星电影公司，准备拍摄一部描写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并穿插有爱情故事的古装片《风流剑客》，说也巧得很，他从一位剧务的手里偶然看到了金焰扮演小铁匠的剧照，非常接近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于是，他立即把金焰请来面谈。那时的金焰刚满十九岁，举止端庄，健康活泼，见人还带着几分腼腆，一看就是个新型学生的模样。要知道在当时的我国银幕或舞台上，所能看到的都是些头戴瓜皮帽，动作扭扭捏捏的所谓风流小生。而金焰则不同，从他的即兴表演来看，动作干净利落，善于做戏，又能掌握分寸。就因为这个才深深吸引了孙瑜，他认为金焰的出现，可以刷新暮气沉沉的中国银幕和舞台。于是，他就让金焰担任了《风流剑客》中的主角。

以后，孙瑜和金焰长期合作，先后排了《野草闲花》、《野玫瑰》、《大路》、《到自然去》和《长空万里》等五部影片。回想起来，孙瑜当时能起用一个无籍之名的“小卒”。真可谓独具慧眼有胆有识了。

对于其他有才华的青年演员，孙瑜也是同样关心的。他很早开始就坚持一个做法：每编导一部新片，都要起用一、二个新人。例如，人们熟悉的我国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初上银幕就是在孙瑜导演的《野玫瑰》中扮演了一个街头画家的角色；四十年代的著名演员，如今已担任导演的刘琼，也是在孙瑜编导的《大路》中扮演了一个筑路工人后才开始他的银幕生涯的；老一辈的黎莉莉、陈燕燕、吴茵、白璐，后一代的王蓓、李纬，也都是在孙瑜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

一九三二年，孙瑜着手编导《火山情血》，影片描写了青年农民反封建的斗争。由于黎莉莉的形态给人以青春焕发的感觉，孙瑜就把她从歌舞班里选拔出来当主角，并在拍戏时不断给予指点。以后，又让她在《天明》、《小玩艺》和《体育皇后》等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使她有不断实践的机会，得以提高。

孙瑜发现李纬的经过，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九三八年，孙瑜把家眷送到四川重庆老家，自己只身去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三厅从事电影工作。他写了个反映流浪儿童生活的电影剧本《少年先锋》。有一次，他在入川的客轮上，碰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从气质、形象来看，都十分接近影片中角色的要求。攀谈之中，知道他叫李纬，是孤身出来谋生的。孙瑜想让他参加拍摄电影。后来《少年先锋》未能拍成，但孙瑜没有忘记李纬。一九四一年，孙瑜编导影片《长空万里》，终于使李纬获得了上银幕的机会。自此，李纬也就一直活跃在银幕上了。

在精心培养新演员的同时，孙瑜对于和他合作的老演员，也是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不同需要，给予指导和提高。对戏路宽、演技好的阮玲玉，孙瑜在同她合作的《故都春梦》（朱石麟编剧、孙瑜导演），《野草闲花》和《小玩艺》等片中，尽可能为她设计戏的细节，使她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丰富，感情上更有层次，从而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这里附带说说阮玲玉。阮玲玉在我国电影早期表演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她先后主演过二十多部影片，创造了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一系列妇女形象，从牺牲于封建礼教的寡妇、弱女，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姑娘，一直到与劳动人民结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妇女，她表演得都比较成功。特别是后期的阮玲玉，由于

受到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思想影响和教育，对生活有了深刻的体察，对人物性格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她那一贯真挚、朴素的表演风格更增加了内心生活的深度，使人物的命运打动着观众的心弦，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舆论的热情称许。但是这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正当她的艺术才华臻于成熟之时，竟被旧社会“吞食”了。

她是在一九三五年“三八”节的早晨，因为忍受不了旧社会对她的污蔑和迫害，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的遗言，服毒自杀的，仅以二十五岁的年华结束了她的一生。她死的那天，成千成万崇拜她的人们争着前来向她的遗体告别。阮玲玉的死，震动了整个上海，是旧社会迫害善良妇女和有成就的女演员的血淋淋的例证。

我觉得，当年我们这些人能进入电影界，成为有一定影响的演员，都是和孙瑜的工作分不开的。同时，在反复的艺术实践中，在良师益友的帮助下，一代新人也终于脱颖而出了。

解放后，电影《武训传》遭到全国规模的批判，孙瑜从中受到了教育。后来，他想着拍摄《宋景诗》，但就是不让他参加。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说我捧武训，那我象捧武训那样来捧宋景诗行不行呢？”这也可以看出他渴望改正错误，愿意多为人民拍些好影片的愿望。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对孙瑜同志只看一部《武训传》，就不看看他大半辈子为我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反而让他长期默默无闻呢？现在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了，近两年他才被正式选为影协的常务理事。他还打算把自己已经译成英文的“李白诗”整理出版。想想看，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可敬可爱呀！

### **我的第一部故事片《野玫瑰》**

《野玫瑰》是我进入影坛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从我的成长来



看，也是在孙瑜的帮助下才取得成功的。记得还在联华歌舞班的时候，孙瑜编导工作之余，一得空便来看我们的排练和演出。他还带着歌舞班去南京演，当时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关系都是密切的，比如谁过生日，便一起去凑个热闹。有时也一起去春游，或参加晚会，谁都可以即兴表演自己拿手的节目，所以，互相都很了解。而且，那时导演常常是自己写剧本，并按照演员的性格来写角色。孙瑜看我性格开朗，胆子又大，就在《野玫瑰》里写了个调皮的农村姑娘——野玫瑰。

《野玫瑰》写的是富家少爷爱上了穷苦姑娘的故事。在我看来，孙瑜在这部影片里暴露了旧社会的贫富悬殊，对上层社会生活表示了某些厌倦和憎恶，对劳动人民的乐观开朗和忠于友情表示了同情和赞美。

孙瑜让我扮演的野玫瑰，是个平时玩刀弄枪，经常领着一帮“野”孩子“练兵”、“打仗”，准备保家卫国的贫家姑娘。当时银幕上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明朗，而充满青春活力的民间女子形象，所以使观众耳目一新。

当年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并没有剧本，导演只是在口头上说说戏，也就是大概说个故事吧，以后到现场拍摄时再给指点指点。当然，导演手里还是有本子的，比如简单的剧情和一些室内外景的设置等。要拍成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导演心中自然是有数的。《野玫瑰》是个无声片，我当时还不懂得角色体验，人物分析，不过，野玫瑰这个角色接近我的性格特点，我容易理解她的感情，演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再加上我平素胆子大，不害怕摄影棚里的那些灯光，镜头，更没有成名成家的杂念。所以我也就象平常那样说着、笑着、玩着，拿木盆在水里划来划去，从窗口里跳进跳出。谁知道

影片公演以后，我就成了所谓的“明星”，还得了个绰号“野玫瑰”。

《野玫瑰》刚拍完，接着我又拍了《都会的早晨》、《春潮》等。这里我谈谈对蔡楚生的印象。

蔡楚生原在明星公司跟郑正秋学习导演，一九三一年，他加入“联华”二厂，正式担任编导。次年，完成了他最早的三部影片《南国之夜》、《粉红色的梦》和《共赴国难》。一九三二年他所编导的《都会的早晨》，标志了他的艺术思想的重大转变。这部影片是蔡楚生的成名作，也是他接受党的领导和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下拍摄出来的一部优秀影片。蔡楚生由一个商店学徒而成为一个出色的电影编导，这中间经历过复杂的路途。他刻苦勤学，对电影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使他掌握了卓越的编导技巧。

### 《渔光曲》的诞生

记得一九三二年秋天，也正是我生日那天，因为头天拍夜戏，当天上午回家后即刻就睡熟了，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也早放到脑后了。可我大姐王雪华没忘，特地给我送来一件礼物，她一连叫我几次都没叫醒，便留下东西走了。等我醒来时，发现桌上有一把剪刀，一张条子，大意是说在我生日这天，送我一把剪刀，是希望我象剪刀那样锋利、果断。也许，这就是我大姐从客观上对我性格的看法吧。

一九三三年，明月社由于内部矛盾而解散。我也就离开了明月社，个人与联华二厂正式签订了一年的合同，规定拍四部电影。

同年年底，《渔光曲》就开拍了。导演和我们说过戏后，不久都去了宁波。在石浦渔港呆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次去一是拍些外景，二是熟悉渔民的生活。记得我们当时租用的好象是艘捕鱼船。



《渔光曲》剧照

右为王人美（饰小猫）左为韩兰根（饰小猴）

吨位不大，稍有风浪就翻腾得厉害。担任影片摄影的是周克，他因身体不好，出海后简直起不了床，因此拍不了什么镜头。我呢，正赶年青，加上我从小就好运动，在学校时还玩过荡桥，所以比较快的就适应了海上生活。一些水手常对我们说：“越吐越要吃，这才有东西可吐，不然只有吐苦水，吐几次就把身体吐垮了！”我牢记他们的话，每顿饭都不少吃，结果还真顶得住。

回到渔港后，由于周克只拍了几个现场的镜头，因此只好用一些室内景、布景、道具等来补戏补镜头。

那是我第一次深入生活，导演经常带我们到渔民家中唠唠家常话，一到夜晚，我们就在油灯下和渔民们聊天。几个月的渔港生活，使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在风雨里行船，在浪涛里捕鱼。这时，我

跟着一位渔家姑娘学习摇单橹船。学摇橹可费劲了，在她的指点下，我右手扶橹，左手抓绳，一下一下地摇着，一天又一天地学着，为了拍电影，胳膊练肿了我也没停下。这样坚持下来，那船总算听我的话了。同时我也体会到了水上人家的辛劳和苦难，更痛恨那些欺压渔民的富豪，同情那些与风浪作伴的渔民。我对《渔光曲》中的渔家兄妹也就有了深厚的感情。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尽力把戏拍好。由于编导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影片拍得差不多了。

一九三三年年底，我和金焰准备结婚了。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我二哥王人路就是反对得很厉害的一个。我结婚后，他在《时报》上发表文章骂了我。于是，以后我和二哥的来往就不多了。

想说一说的的是，那时我和金焰举行的婚礼倒是很朴素。因为正赶上一九三四年的阳历年，联华影片公司开了一个联欢晚会。晚会是通宵的，那天夜里我和金焰都穿着兰布褂，钮扣上挂了个红绒牌，凌晨一点钟，由孙瑜当众宣布一下我俩结婚就完了。结婚后，我们的生活也很简单，我不做饭，也不操持什么家务，因为我十三岁出来后，一直都过的是集体生活，我们吃饭就在房东家包伙。

由于《渔光曲》的拍摄周期过长，到了一九三四年，我的合同到期，其它三部电影没拍成，《渔光曲》也没最后完成。因为《渔光曲》是无声片，可是蔡楚生坚持最后那段唱要有声音。联华公司本身解决不了录音问题，就拖了好几个月。后来还是司徒慧敏带着他们自制的录音机来帮我们，才解决了困难。我当时因为怀孕，脸和脚都有点肿。联华公司也没有再和我续订合同，但我还是拍了最后那段唱的镜头。记得当时戏拍到尾声，我如泣似诉地唱起《渔光曲》的时候，那海洋上的恶浪，学橹时的辛劳，渔民们的痛苦，一

齐涌到眼前，我的眼泪忍不住簌簌地流下来。

蔡楚生完成了《渔光曲》这部影片，六月十四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映出。当时正是上海六十年来少有的高达摄氏三十八度的酷暑，但影片竟能连映了八十四天之久，成为当时国产片在上海放映时间最长的一部。

直到今天，《渔光曲》这部影片生动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动听的音乐以及各种人物，在我脑子里记忆犹新。影片一开始，是东海的早晨，太阳从苍翠的东山渐渐升起，朝霞映照着动荡的波浪，渔民们在海上捕鱼，传来了《渔光曲》的主题歌。在歌声里，影片展开了一个渔民家庭的悲惨故事：暴风雨夺去了穷苦渔民徐福的生命，他的妻子徐妈不得不抛开刚生下的一对孪生子女，到有钱的船主何家去做奶妈。十年后，徐妈苦心抚养的何家少爷子英和自己的女儿小猫、儿子小猴都长大了。小猫聪明活泼，小猴因从小多病，又没奶吃，变成了一个痴憨的孩子。他们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常在一块儿玩耍。又过了八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了，小猫和小猴租了何家的船，在海上捕鱼为生；子英遵从父命出国去攻习渔业。临行时，他特地来和小猫、小猴告别，并表示将来回国后一定要改良渔业。就在子英出国后的两年里，由于军阀内战，盗匪横行，东海渔民的生活更加陷于困境，小猫家的草棚破屋被洗劫一空，操劳过度的徐妈双目失明。接着又由于何家同外国人合资创办渔业公司，用轮船在东海捕鱼，使小猫、小猴他们的生计遭到更严重的打击，他们不得不押掉自己的破屋，扶着老母到上海投奔舅舅。他们的舅舅也是个穷苦人，靠在马路边卖唱度日，小猫和小猴因为找不到工作，也只好跟着舅舅去卖唱，并因而遇到了何子英。这时何子英已经学成归国，进了父亲的渔业公司。三人相见，子英得知小

猫和小猴的境遇后，资助了他们一百元钱。但这笔钱反使小猫、小猴因被诬抢劫而遭逮捕。及至他们出狱返家，家里早被一场火灾烧掉了，妈妈和舅舅也都葬身火窟，小猫和小猴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子英找到了他们，要带他们到自己家里去。不巧子英的家庭也起了变故，他父亲的姨太太跟着姘夫携卷巨款逃走，父亲也因渔业公司的破产和报纸揭发了他的丑史而自杀了。子英这时才深深地感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是不可能完成他那改良中国渔业的计划的，便跟小猫、小猴一同到渔船上去工作。最后，小猴因捕鱼受伤而死，影片在凄怨的《渔光曲》的歌声中结束。

这部影片的剧情和人物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大概是使我拍摄时既认真又用心的缘故吧。另外，从音乐上来讲，影片的主题歌《渔光曲》是我最喜爱的曲目之一。这首歌是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是任光创作的，也是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歌曲之一。那凄婉的曲调描写了当时渔民的沉重劳动和被剥削的贫困生活，传达出了他们心底的悲愤，很好地渲染了影片的主题，歌词中唱到：

……轻撒网，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天已明，力已尽，  
眼望着渔村路万重，  
腰已酸，手已肿，  
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这首歌在影片中被运用了好几次，在不同的情景下有着不同的

效果，很有打动人心的魅力，随着影片的上映，这首歌也很快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成为当时传遍全国、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之一。《渔光曲》上映后，我收到大量的来信，好多人都要照片、要签名留念，有的还要交朋友，其中有多数为青年学生。记得那两年，我为这首歌灌了唱片得到不少收入，按半年结一次帐来算，每次都要拿到四百元以上的版税，由此可见当时《渔光曲》流行的盛况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渔光曲》参加了苏联电影工作者俱乐部为纪念苏联电影国有化十五周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在这个有三十一一个国家的代表和影片参加的电影节上，《渔光曲》获得了“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后来公司曾转给我一幅奖状的照片。

《渔光曲》的拍摄完成后，我参加了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的演出，同台的有袁牧之、金焰、王莹等，演出的收入全部捐献给抗日部队，这也是我们对抗日运动的一点心意吧！

### 我的体育活动和文艺爱好

《渔光曲》上映之后，我先后拍摄了电通公司的《风云儿女》、联华一厂的《小天使》、新华公司的《壮志凌云》、《长恨歌》、《离恨天》等片，金焰一直是与联华公司定了长期合同，也拍些电影。我们的收入可以说是不不少的，生活也是安定的。为了保持青春活力，我们相约搞一些向上的文体活动，那时我们组织了男女两个篮球队，自任男女队长，球队经常参加业余锦标赛。为了练球，我们在住的院子里辟了半个篮球场，还买了不少其他运动器具。我们还时常到市郊或往返苏州去打猎，什么野鸡、野兔、斑鸠等经常打

到一些。

这个时期，我也曾经找过专人教我唱歌。金焰这时对学习建筑学很有兴趣，我为辅助他学习建筑学还专门学了英文。另外，我也尽可能看些小说，《世界文库》尽管很贵，还是购买了一套，外国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都是我常看的。同时，我们还爱看美国电影，如卓别林主演的影片和其他文艺片看了不少。应该说，这些都对我提高表演技巧很有益处，但是总的来说，系统的学习时间还是太少了。

## 八 年 离 乱

一九三八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入上海，好几个电影公司的老板都跑了。这时，田汉写出了《芦沟桥之战》，陈白塵写出了《芦沟桥》的话剧，我们这些演员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在短时间内，自己组织起来排戏，很快就演出了这两个话剧。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不当亡国奴。所以，我们都是自愿参加演出，在军队、工厂和社会上演出。为了抗日，常常是不收演出费。有时顾不及吃饭，甚至自己掏车马费，但大家还是干得挺起劲，演出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我们也得到了人民的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演员和观众是心连心的。这些抗日救亡活动，也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他们想拉我们下水，为他们效劳。

他们通过张善铤和反动文人刘呐鸥，要金焰和我给他们拍电影。金焰先是推说自己是朝鲜人，要他带头不合适。后来日本人以宴请为名进一步威逼金焰，我记得很清楚，当晚金焰回来心情很不好，我们连夜商量：认为不能给侵略者拍电影，决定三天之内就离开上海。为了走时不被他们发现，我们是借用两个朋友的名义去买船



票。走的那一天，我们作为送客到码头，待船要开时，我们就赶快上船，离开为敌人占领的上海前往香港。

到了香港无亲无友，怎么办呢？于是马上与重庆的孙瑜联系，那时他正准备拍《长空万里》，这是第一部写爱国的飞行员抗日的国产片。于是我们从香港直飞昆明外景地参加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前后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同时也解决了生活问题。

我还记得，当我们去昆明之前，在香港遇到蒋君超、白璐，他们住在贫民窟，我们也和他们住在一起。那时他们的生活很苦。后来，等我们拍完《长空万里》回到香港，他们找了几个朋友，搞了个影片公司，要我参加拍片，由于发生珍珠港事件，日本人侵占香港，电影也就没拍成。我和金焰又从香港逃到桂林。在桂林的几个月，我们曾经住在一位朋友家里。他家是制作注射药品。我看到的就是在有药粉的瓶内注入蒸馏水，然后瓶口在火上一烧烤，玻璃溶化，就封上口了。看上去操作还简单，我就帮忙干起这个工作了。那位朋友家里有三个孩子，常跟我在一起，都亲热地叫我“王娘娘”，我也因此得这一俗称。

当时，蔡楚生、司徒慧敏都在桂林，我常去看望他们。他们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生活很困难。司徒慧敏的爱人制作小孩穿的服装，我也跟着学做衣服。

一九四二年，金焰到重庆找工作，第二年他到成都参加了话剧演出，我也到成都看他们的演出。这个时候有个早年的朋友名叫王晋生，要在昆明组织个“大鹏剧社”，邀我回昆明去，同时也邀请陶金、章曼萍。金焰也去了昆明，但没有参加剧社，只是帮帮忙，后来他跟别人合伙做生意了。

在昆明，演出的第一个戏是《孔雀胆》，我扮演阿盖公主。由

于这是写云南的戏，再加上我们这些演员都还有点名气，所以观众十分踊跃，甚至从大理赶来观看。可是在演完第二个戏《天国春秋》没多久，剧社就解散了，我又没有工作，就闲住在蒋君超夫妇开的旧货商店的二楼。那时在美军总部物资供应处昆明基地工作的几个华侨，常来店里买东西，通过他们的介绍，我考上了美军总部物资供应处的英文打字员，并且被分配在六十六部人事室。真没想到，早先没事时学的英文打字，现在却成了糊口的本事。我在这里整整当了八个月的打字员。日本人一投降，美军总部的昆明基地就把我解雇了。

我回到上海，大姐通过一个亲戚，给我在行政院救济总署又找了个英文打字员的工作，这样生活暂时有了着落。

### 抗日胜利后，重上影坛

我刚干了三个月的英文打字员，从前联华公司的导演费穆来找我拍《锦绣江山》。由于剧本问题和经济问题，更主要是他的思想问题，想做一个既不得罪国民党，又不得罪共产党的人，所以这个戏花了两年时间，也始终没拍出来。

《锦绣江山》停拍后，昆仑影业公司的王为一、徐韬来找我拍戏。说是欧阳予倩先生为昆仑编写了他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关不住的春光》，并由王为一、徐韬来导演。他们认为我很适合扮演影片中的女主角梅春丽，而且扮演男主角的赵丹也提出愿意和我合演。这样我就参加这部影片的拍摄。

影片拍完后，上海临近解放，当时为了避免国民党对文化人士的迫害，不少人都离开了上海。我又一次去了香港。

当时在香港原上海新华公司的老板张善铨约请我参加影片《王

氏四侠》的拍摄。我情面难却，勉强同意了。后来，我才感觉到他是为了招揽观众，才找了我和王引、王丹凤、王元龙四个姓王的演员，来重拍这个二十年代的武侠片，所以我戏拍得特别不顺畅，也根本不关心影片拍摄完成后的命运！

### 回到解放后的祖国

全国快要解放了，在香港的很多文化工作者参加了司马文森、洪道主办的读书会。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读书会分成很多小组，每组大约有一、二十人。当时香港政府是禁止五人以上的集会的，于是我们就想出种种名义，今天给你庆祝生日，明天为他举行结婚纪念，经常聚在一起读《新民主主义论》，议论时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随港澳电影界观光团回到广州。我们为解放军官兵演话剧，部队文工团员教我们扭秧歌、打腰鼓、跳红绸舞等。我还清楚地记得，叶剑英市长和陈赓司令员设宴欢迎我们。叶剑英市长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从拍片情况问到起居饮食。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这样和蔼可亲，是这样平易近人。当他带头欢迎我唱一支《渔光曲》时，我又唱得泪水盈眶。不过这不再是辛酸的泪水，而是激动的热泪，幸福的热泪。

这次回国观光后，我就积极准备从香港回内地。但也有人来劝我去台湾，还有人诱骗我留在香港拍反共影片。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终于在一九五〇年初回到了上海。

（宋光明、贺毅整理）

# 我的舞台生活（连载）

袁世海

## 前 言

我八岁开始登上京剧舞台迄今将近六十年了。由于出身贫寒，亦非梨园世家，很多同志、朋友不理解我是怎样走上京剧艺术表演道路的，热



袁世海同志近影

切盼望我写写回忆录，总结一下我的艺术实践。我现在记忆还清楚，精力还充沛，我愿将自己的艺术生活、成长过程记录下来，留为自勉，以便激励自己将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的京剧事业。

## 童 年 时 代

### 一、家贫寒 寄怀儿女

北京和平门外新华街路西有一条街叫做前孙公园，路南二十四号是个小破杂院，一九一六年，旧历正月初九，我就出生在这小杂

院的破东屋里。

父亲名叫袁敬臣，母亲袁王氏，解放后起名王永沅。父亲给钱粮胡同姓钱的一位作官人家赶轿车。虽说我家生活极其清贫，但还算混得过去。

父亲初到钱家时，钱家的官事儿正蒸蒸日上，当时社会上盛行马车，他家就将轿车换了马车。后来逐渐破落，月月都不能付给工钱，就将马车折给了父亲。

父亲高兴极了，他认为虽说眼下日子困难，这回有了自己的马车，一家人的生活可算有了准着落，又谁知道父亲由于多年来为生活到处奔波，赶车中积劳成疾，马车拉回家不到几个月就一病不起了。那时，我们姊弟还小，没人能去赶车挣钱，连吃饭都难，哪儿来钱治病呢？只好向大伯和亲友们东摘西借，一病就是一年多。一九一八年，母亲过三十二岁生日那一天（旧历十月十一日），正当母亲要给父亲做些面条吃，父亲没等吃上，就吐了大口鲜血，故去了。以后，每当母亲过生日这天，她都要为悼念父亲痛哭一场。

父亲去世时，我大姐才十三岁，二姐十一岁，三姐七岁，哥哥五岁，我还不到两周岁。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的肩上。为了生活，母亲将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那辆马车，给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求得他的部分接济。然而生活仍然很难维持下去，母亲、大姐后加二姐不得不给裁缝铺繅贴边、纳鞋底（繅一件短褂二大枚，繅一件大褂的贴边是三大枚，纳一双鞋底是三大枚加一小枚）。母亲、姐姐起早贪黑地干活，一家人还是吃了上顿少了下顿，东求西借，苦熬岁月。

我们居住的两间东房，因年久失修，向北倾斜，当年父亲用来支撑北山墙的杉篙，几乎快被压断了。下雨时，屋外下大雨，屋里

下小雨，母亲只好用一个带锡子的洗衣绿瓦盆接漏雨。遇到夜雨还要不断起来将盆里滴满的雨水倒出。天晴了，就得糊顶棚，什么纸都用，顶棚上被糊得五颜六色。记得幼年时躺在炕上，非常爱看这花花绿绿的顶棚，再大点时想法就不一样了，心中总想等我长大挣了钱，一定把屋顶修好，不再让它漏雨，顶棚要糊得雪白雪白的。

四岁上，我开始代替哥哥姊姊的“工作”，去十间房（前孙公园的西口也叫十间房，是一条街两个名子。）的裁缝铺取送妈妈做的活计，当时我拿到几大枚工钱，很懂得它来之不易，唯恐弄丢，用送衣服的包布将钱紧紧地裹好，系在腰间，从不敢在路上贪玩，一直回到家里把它解下来，将钱如数交给母亲。当我看到母亲对我感到欣慰和信任的目光时，我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替妈妈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们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我那勤劳善良的母亲，依然那样地热爱生活。她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屋前房檐下种上倭瓜、南瓜、丝瓜等，碧绿的枝蔓顺架爬到房上，院子里一片葱葱郁郁，配上开红、黄、紫色的野茉莉、牵牛花、莲花、葵花点缀其间，真是好看，夏季晚间在院里乘凉还能不时地闻到阵阵幽香。使我这贫穷的家，总是充满了生机。我最满意的还是不用花钱就能吃些用新鲜丝瓜炒的菜和作的菜汤，以及瓜馅的饺子。尤其是当我向妈妈喊饿时，母亲就会说：“锅里有蒸熟的老倭瓜，去拿着吃吧！”我咬一口那黄澄澄的老倭瓜，嚼起来又甜又面，真好吃。

西屋的李大妈，经常夸我母亲能干，说我们几个孩子既听话，又懂事，还安慰我母亲说：“熬着吧！孩子们长大准有出息，你也准能享上福。”

的确，像屋前的这种生气蓬勃的花草一样，我们一家老少和睦

亲爱，母亲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几个孩子的身上，孩子们也领会了母亲的意思，全家老少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

## 二、受熏陶 随僧看戏

清末年间有个风俗，很看重大象，认为是吉祥的象征。平时将官家养的大象送到京郊宛平县(即芦沟桥)喂养，逢大典之日，便将大象披红戴花打扮起来，从芦沟桥赶进城来，牵到天安门东、西面华表前站立。以喻万象更新王朝吉祥之意。

我的爷爷就在芦沟桥喂养大象。他有五个儿子、一个小女儿。人口多，收入少，日子还是混不下去。我的二大爷、三大爷出外谋生，死在异乡。六姑嫁给北京城外一个清室后裔，开始几年生活还可以，后来就渐渐不支了。大爷带着老五(即我的父亲)到北京城赶轿车。初来时，父亲只能跟车，逐渐也学会了赶轿车，加上他手脚勤快，做活干净，很受人欢迎。后来经人介绍才到钱粮胡同钱家赶轿车。

爷爷去世后，奶奶见两个儿子(大爷和我父亲)在北京站住了脚，就带了我的四大爷来京投奔。大爷便托人求沙河门外(现建国门外)一个小关帝庙的老庙主收留四大爷当徒弟，从此四大爷剃度出家，当了和尚，我们都称他和尚四大爷。老庙主死后，他便继承了这座小庙的财产，当了庙主。

和尚四大爷由于多年“修身养性”的缘故，有点胆小怕事，但为人还是忠厚老实。他在庙内外的空地上，种些粮食和菜，有时还拿些萝卜、菠菜、玉米面等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对我们姊弟很疼爱，尤其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这位和尚四大爷。不光是他的到来能使我们吃上新鲜的蔬菜和玉米面，最主要的是和尚大爷是

个戏迷，他每次来几乎都要带我去看戏。我一见他来了，就高兴地跳起来。然后等着他带我走，这个规律，被姐姐抓住了。只要和尚大爷一来，姐姐就说：赶快把“活儿”送去，回来再去买一大枚（十个小铜钱换一小枚，二小枚为一大枚）醋，一大枚胡椒面，饶点香菜韭菜，我给你换上件干净褂子，好跟和尚四大爷看戏去。我当然是百依百顺地速去速回。

最早看戏我一点也不懂，戏看不到一半就歪在和尚四大爷怀里睡着了。散戏后，我依然还在梦中，被大爷背回家。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尚大爷带我到天桥歌舞台看崔灵芝的秦腔（河北梆子）《杀狗劝妻》。这次看戏，我还是什么也看不懂。我还记得和尚大爷跟身边邻座的观众说：完了，灵芝掉面儿了。我很不理解。现在分析可能是演员脸上的化装粉掉下来。由于当时化装不用油彩，全是水粉装，那位老前辈在旧社会生活艰难，四十多岁了，但脸上皱纹较多，水粉在脸上挂不住，面部一表情，和尚四大爷就感到他象在往下掉白粉，才夸张地说：“掉面儿”了。

一说“歌舞台”，不知道的会以为是什么样的好舞台呢，实际上都是用席搭成临时用的非常简陋的席棚子。

有一次，和尚大爷带我到天桥魁华舞台看小马五的《纺棉花》等戏。开演的功夫不大，就下起了大雨，我们买的是次票，坐在最后，正好赶上从顶棚和四围的席中间所留的一段透气的空隙中往里稍雨。于是，我们“合理合法”地换到池子中的空座位上。我感到很有趣，至今这件事还记得特别清楚。

和尚大爷有个习惯，特别爱看戏报。那时海报都贴在道路两旁的大牌子上。从我家走到天桥，沿街这样的戏报牌子不知有多少。和尚大爷是张张必看，我在旁边看不懂，等着着急。就扯着大爷僧袍



的大宽袖子，拉他走。他目不离戏报，口里喃喃地说：“别着急，别着急，大爷看看哪出戏好，明儿带你去看……”或是“马上就走、快走……”。我还记得由于爱看戏报，还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呢。

五岁那年，和尚大爷又带我到天桥燕舞台看戏，当时有的戏班是“两下锅”，就是京、梆合演。这天前面的京剧武打戏，名子记不清了，但台上翻跟斗、对枪很吸引我。最后是蔡莲卿的《锯碗钉》，我被演员的表演艺术和剧情打动了。虽然还不懂掉泪，心里很是同情受气的儿媳，痛恨恶婆婆、大姑、小姑。

看戏出来，和尚大爷照例又让我在小摊上吃些东西再回家。我有选择地要喝碗茶汤，他给我买好后，自己又津津有味地去看路边的戏报，估计我该吃完了，就回到茶汤摊。一看我不在，急忙从茶摊到豆汁摊，再到杂耍场……到处找我。凡是天桥的热闹场所都反复寻遍了，结果也没有找到我的踪影。这一下和尚大爷可吓坏了，他急得心如火燎，累得满头大汗，暗想：把孩子丢了，怎么交代呢？天已渐渐黑了，不回去吧，大人、孩子都不照面儿，我母亲岂不要急坏了！还是回家再想办法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奔回家来。

一进门，和尚大爷看见我正在指手画脚，连说带唱地和姐姐、哥哥们学刚才所看的戏，他也顾不得气喘嘘嘘，一把将我拉到跟前，气得大声嚷道：“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让你喝完茶汤别乱走，在那里等我，你怎么转眼就走了？真要把你丢了，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呀！”边说边气得跺脚，眼泪直流。

我呢！我喝完茶汤，回头只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却不见了和尚大爷，我急忙在人群中、戏报牌前，寻找有明显标记——剃光头的和尚大爷，可哪里找得着呢？就这样边走边找，回到了家中。

母亲见和尚四大爷急成这样，过意不去，赶忙过来劝解：“四哥，你别着急，丢了就丢了，谁让他不听你的话！何况他又没丢，你快别着急啦！”

“唉！五弟妹，你就这么两个心头肉，五兄弟又没得早，你拉扯他们多不容易！这要是让拍花子（指拐骗小孩的人）的给拍走，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那五兄弟呀！”

这一席话，正说到母亲的伤心处，妈妈也哭了起来。我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上前拉住和尚大爷的僧袍，后悔得流下了眼泪。

此后，看戏时，我再也不离开和尚四大爷了。

要说和尚四大爷是戏迷，只要他一有空，就会“曲不离口”哼唱一段段的戏，别看每出戏会的台词不多，可是什么戏都会几句。不论在我家里，或是带我去天桥看戏的路上，都反复地唱。而且是摇头晃脑，拍着板，有滋有味地唱。我有意无意地被她熏会了几句。在听戏时，偶然遇到自己会“唱”的戏词，兴趣倍增。就想多学几句，更想多看几出戏，终于我也变成了小戏迷。

### 三、听蹭戏 马后跟车

我对戏曲爱好日增月长，可是和尚四大爷十天半月才带我听一回戏，我感到太不解渴。于是我便提前将份内“工作”完成，然后向母亲“请假”出去玩。

我想到天桥看戏，没钱买票。即便买最后排的降价票，我也买不起。此时我想起四大爷曾带我去过的香厂路（天桥附近）“城南游艺园”，它的门票虽二角一张，但查票不那样严。当时我只有六岁多，趁入场时人多，夹在一些坐车的大人后边，再用手轻轻地牵着这些大人的长袍，把门的收票人看我人小，以为是这些大人带的

孩子，而前边这些大人穿戴整齐，把门的人不敢得罪他们，就不再查我的票，我很顺利地溜进园内。用类似的方法，我还经常去“游艺园”看戏，越看兴趣越浓，后来索性带了晚饭，从中午直看到晚上，游艺园结束才独自回家。

“城南游艺园”完全仿照上海的“大世界”，里面有洋戏法、杂耍、京剧、电影及茶座、小吃等应有尽有。

洋戏法节目是韩秉谦、张敬扶主演“大变活人”的洋戏法。

“小不点”、“大饭桶”（均为艺名）专演魔术丑角。

演电影冬季在室内，夏季在室外，当时上演的是胡蝶、郑小秋合拍的《空谷兰》。

我最喜欢的是京戏，看的也就最多。大京班（京戏班）日夜两场：有宗汪笑侬派的女老生恩晓峰。她演的戏有《张松献地图》、《完璧归赵》、《马前泼水》、《刀劈三关》、《哭祖庙》等。她大女儿恩佩贤演《马前泼水》的朱买臣妻。二女儿恩维铭演《狸猫换太子》的太子。还有女十三旦（艺名）与恩晓峰合演《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相继演出的还有女老生孟小冬，她的琴师是孙佐臣老先生。孟小冬的戏牌子一出我就没地方坐，只能在边上站着。孙老先生穿着古铜色团花长夹袍、黑皮坎肩一手拿胡琴，一手拿块蓝布（胡琴套），走上台向观众点头示意，观众便报以掌声，等定调起过门，又是一片掌声。为什么呢？我很不理解其中的奥妙。我看过孟小冬的《御碑亭》等戏，看不太懂，只听观众议论：“唱得真够味儿！”

此外还有碧云霞（即谢鸿雯之母）的《狸猫换太子》、《童女斩蛇》。女武生盖荣宣演的是《四杰村》，她有个绝招儿，在台口上面横吊着一根铁棍，很像秋千似的，表演时，先经人托就势跃到铁棍上，在上面表演很多复杂的动作，我觉得很新鲜、很爱看。

就在这一年，母亲送我上了平民学校。

这所学校是五四运动后由一些进步文人在新华街（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址）办起的，它不但免收学费，还给学生发书、发练习本和文具，但要求入学的学生必须经过调查，确属贫困应当给予照顾的才批准入学。母亲知道后很高兴，认为机会难得，指望着我们识几个字，将来能养家糊口，少受人欺。所以只留下大姐帮家里干活，把我和二姐、哥哥等，都送去上学。我们买不起书包，便用块旧布把书一裹，当书包使用。

上学后，白天没有时间看戏了，只有看夜戏才行。

这时大爷家赶马车的生意兴隆起来，开了“袁记马车行”。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大外廊营的谭家（小培）、在梁家园后身住的荀慧生（艺名白牡丹）、椿树三条的余叔岩、给恩晓峰操琴的董凤年、在麻线胡同住的姜妙香等京剧界名家去园子（戏院）演戏，都雇用大爷家的马车。这些名角住处离我家都不太远，我想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就找到大爷马车行的伙计胡九，央求他出车时带我到园子看戏。正好胡九叔是个老戏迷，我们曾“合作”配过戏，他是很喜欢我的，所以，他满口答应，并让我给他跟车，我欣然同意。

马车的后面有个倒座，上面有拉手，下面有脚蹬子，接人上车时，我提前将车门拉开让乘车老板登上车后，再将车门关好，回身握住拉手，将脚踩在车蹬上一蹬，借劲就坐上倒座。车停了，我赶忙跳下车来，开开车门，请老板下车，并随手拿起他们盖腿防寒的毯子等衣物，尾随在诸老板（对名角的尊称）的身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园子，看门的以为我是小跟包的，不加阻止。次数一多，他们对我有了印象，我就更“名正言顺”地看蹭戏了。

进了戏院，找座位是个问题。那时戏院修得很落后，观众座位

中还竖着几根直径约五十公分粗的支柱，我坐在前边池座怕挨轰，坐在后面又看不清一些名角演戏，空位子找不到，来回乱串更不行，为了看得满意，我就站在大柱子前面，这样，既不挡后边观众的视线，又落个一等的池子待遇，就是站着看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

因为我很有眼力见，干活又仔细，从没掩过坐车顾客的手，也不招惹是非，大爷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过问我的事。这一来，我就更心安理得了。有事没事几乎每天去车行里看派车牌（有人雇用马车，在红纸条上写明姓名、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派谁赶车，挂在一块木板上），以便跟车看戏。用这样的方法，我看的戏可真不少，如：杨小楼、余叔岩合演的《八大锤》——断臂说书；余叔岩、白牡丹的《坐楼杀惜》；余叔岩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杨小楼、钱金福的《铁龙山》；杨小楼、余叔岩、白牡丹合演的《战宛城》；杨小楼的《麒麟阁》、《霸王庄》、《夜奔》；余叔岩的《洪洋洞》、《失街亭》、《状元谱》；余叔岩、陈德霖合演的《审头刺汤》；陈德霖的《彩楼配》、《落花园》（陈杏元和番）、《母女会》；侯喜瑞、慈瑞泉的《普球山》、《取洛阳》、《青风寨》；白牡丹的《红鸾禧》、《打樱桃》；裘桂仙的《遇后》、《渭水河》；德俊如的《罗成叫关》等等的名角戏差不多我都看过。

我也很喜欢去后台看他们化装，最爱看钱金福、郝寿臣、侯喜瑞勾脸，我还记得钱金福老先生脸上有痣，痣上长着很多毛，勾脸时总要拿笔沾着颜色往脸上反复地按，有人说：“钱老板，您将它刮了吧！”钱老板说：“可不能刮，这是长寿毛，我有办法将它盖住。”

说到这儿，倒想起一段小插曲。

后来在科班学戏时，有位清室后裔，人称奎公爷，长着两道浓浓的眉毛，经常到广和楼看戏，还到后台聊天。他是票友，常常串戏。一天，他听戏到后台来了，大家一看眉毛都剃得光光的，就笑着问：“奎公爷，您的眉毛哪儿去了呀？”他一笑说：“前天演《法门寺》的刘瑾，我的眉毛太重，无法勾脸，我就将它刮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从钱老的勾脸和这位奎公爷剃眉毛的故事，虽然做法迥然不同，但钱老勾脸技术的精湛和奎公爷对艺术的认真态度，都使我非常钦佩。

我还看过青年时代的谭富英主演的《四进士》，他扮演宋士杰，徐碧云演杨素珍。听说徐碧云是武旦出身，后来由于嗓子很好，改唱青衣花旦。她的表演很有特长，能唱《八大锤》反串陆文龙，也能唱《黄鹤楼》反串周瑜，后面带三江口水战。我还看了他的《幽王宠褒姒》和他与姜妙香合演的《虞小翠》，戏中有一段《霸王别姬》，姜老学杨小楼的项羽，徐碧云学梅兰芳的虞姬。另一出是《绿珠坠楼》，谭富英扮演石崇，当时旦角能翻跟头是极少见的，我看徐在此剧中能在相当两张桌子高的牢门上翻“抢背”下来，受到观众的欢迎，当时称他这一招为一绝。

总之，这些老前辈的演出，阵容整齐，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为我开拓了眼界，丰富了戏曲知识，增进了我的感性认识，为我以后进科班学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 四、“鱼钻沙”几回凉热

看戏多，学的戏也就多了。家里变成了实践的舞台。恰巧我二姐也爱唱，她多做些活，手里能攒几枚零钱，就买票去听戏。我们看戏回来，家里便开了锣。二姐唱《狸猫换太子》的寇承玉，我来

演陈琳，兼赶郭槐等好几个角色。哥哥在旁打鼓，唱胡琴过门，可热闹了。二姐“重任”在肩，只能玩一阵就去干活。我是直演到底的，什么戏都扯开嗓子唱，能唱几句就唱几句，还自编动作，那股劲简直就像中了魔，往往误了吃饭。不将母亲惹急了，戏是停不住的。

“鱼钻沙”是我最爱吃的饭，所谓“鱼钻沙”就是将油倒在锅里烧热，放上切好的白菜，煽锅后添水，待开锅，将白面和成糊状拨成一条一条的下锅。再将玉米面均匀地倒在锅里。白面为鱼，玉米面为沙。过去一遇到妈妈做这种饭吃。我就围前围后地看着妈妈做，而后抢着吃第一碗。从我一入迷演戏起，这“鱼钻沙”就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妈妈姐姐都吃饭，我的戏没唱过瘾就不去吃，把给我盛的鱼钻沙搁在一边，一会儿就凉了。妈妈心痛我，把它加热，热后又凉，凉了又热，几次来回就把好端端的鱼钻沙热成一碗浆糊。妈妈真生气了，在屋里叫嚷，再不来别吃啦！这时我也觉的实在有点累，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地响，于是我左腿弓，右腿绷，半弯腰，对手抱拳，用力喊道：“得……令！”跑着园场走到门口。左脚一踢大褂，用手抓住，迈过门槛进门吃饭。母亲急不得恼不得，只好发狠地说：“你不用美，赶明儿非送你去科班学戏不可！”我一听高兴极了，连忙拉着长声说：“啊母亲！你到正说到儿的心眼里去了！”这一句话又把妈妈逗笑了，说：“快吃吧，别贫嘴啦！”我的戏演到此时，才算暂时收住。

## 五、消防队“观众”情深

我家院内南房的后山墙外是一片下洼地，属于消防队所有。有一年下大雨，因房子太老，柱子朽了，再也支撑不住，南屋后山墙终

于倒塌了半截。住在南屋的做小买卖赵大爷只好暂居别处。这三间空房，成了我的舞台。放学回来，我就在那里唱个没完。有一次我刚唱完一段，破墙外有人拍掌叫好，要求再唱，我当时又喜又惊，竟然有“观众”向我叫好，于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尽管“观众”看不清“演员”，“演员”也看不清“观众”有多少，但情绪却很饱满。以后他们空闲时，就敲墙喊戏。我索性搬把凳子爬上墙，骑在破墙头上给他们唱。最后这些消防队的“观众”，干脆把我用救火梯子接过去，到墙外空地梁家园（街名）给他们演唱，还加上了表演动作。唱毕之后，他们就带我去消防队洗热水澡，以示鼓励。于是我心满意足地蹬着梯子爬过墙头回家。这时我的心完全陶醉在自己的“艺术”之中。有一回，我胯骨上长了大疖子，唱完后，消防队长很高兴，把我举了起来，又横着身子悠，无意中碰破了疖子，流了血。我回到家中，母亲说疖子出脓就好了，去虎坊桥鹤明堂药店买了两大枚珍珠散，敷上几天就好了，到现在还留了个疤痕，作为纪念。消防队长将疖子挤出脓，还是要感谢他的。

我的演唱使附近的街坊们都认识了我这个小戏迷。十间房的西永隆米面铺（带卖杂货、青菜等），还有附近的切面铺、油盐店、肉铺甚至鞋铺的掌柜和伙计们对我都是另眼相待。只要我一去，就把我抱上柜台，让我坐在那里唱上几段。后来有时家里的手工活领不回钱，而大爷接济的钱又用完，眼看无米下锅了，我就到那些店铺里赊购，他们满口答应，但条件是我必须先给他们唱几段戏，然后什么五斤面或烧饼、豆腐，以及几个铜子的肉之类都能赊给我。我便高兴地将急需的食品送给母亲以解家中的燃眉之急。待拿到工钱后马上如数还清。

今天看来，他们是我的“第一批观众”了。他们对我如此热情



而真挚的感情，无形中鼓励了我，使我学习京剧的愿望更迫切了。

## 六、结良友 树下“演戏”

一天，我又在梁家园给消防队“观众”演唱：

“真宋江，假宋江”，头一句唱完，我换了口气，刚要张嘴往下唱“难免李逵祸遭殃”。……忽然传来一个小孩接唱的声音。我扭脸一看，哟！这不是大群子（裘盛戎的小名）吗？我连忙说：“来呀！咱俩一块唱。”

观众欢迎极了。我俩也就互不客气，他一段，我一段地唱起来。

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盛戎的父亲是前辈名净裘桂仙。他家当年就住在前孙公园十间房之间路北胡同的兴胜寺里。我们院内西屋张六叔的弟妹的娘家和我母亲的娘家是好邻居，她们没有出嫁时是好姊妹，婚后她就住在裘大爷院内，离我家很近。我母亲去她家串门结识了裘大妈，高兴时在一起玩一会儿斗梭胡（纸牌），这样，我和盛戎也就认识了。盛戎比我大一岁，准确地说只比我大几个月。那时我们只有一些短时间的聚会，互相都不知道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爱好。通过这次意外的“对唱”，我俩立即就成了犯戏迷的小伙伴，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不愿分离了。

我们一同去逛城南游艺园，两个人不如一个人好往里混，单进又不愿分开，想来想去，好容易找到一个窍门：我们绕到游艺园的后墙，互相蹬扶爬上墙头，大着胆子跳下去，人小身轻也摔不坏。贴墙有条小河，时值冬季河水结冰，既没有游船，更没有游人。我们平安无事地到了园内，一玩就是一天，我们各自都带了晚饭，相

互品尝，别有风味，比起我一人来时可就更有兴趣了。

有一次，盛戎脚蹬在一块已活动的砖上，砖被蹬掉，盛戎唉哟的一声，随之从墙上摔下来，扒在地上。我又爬回墙去把他扶起，重新越墙。

我们一同到剧场看戏，最初并没相约，是“心气”相投，在戏院里相遇。不约而同地我站在台下这边的大柱子前边，他站在那边大柱子的前边，看到满意之处，两目相对，微笑点头示意，戏看得越发津津有味。戏散后，同路回家，我俩边走边评论谁演得好，哪些地方演得最精采，哪些地方演得不好。就是到了我的家门前也舍不得终止评论，各自回家，还得站在那里谈“够”，约好明天看戏见面时间、地点等等。

值得回忆的是八岁左右，我们在一起“演戏”玩的趣事。

兴胜寺这条胡同路窄、车也少，靠北口新建的一个西医医院（此医院是西单太仆寺街医院的前身），大门旁边有棵大槐树，它周围有一片略宽的空地，我们选中了这块既有树阴又比较宽敞的空地做为我们得天独厚的舞台。盛戎拿来他父亲的旧髯口胡子，我拿来父亲当年赶车的破鞭子，做为道具，嘴里一念锣鼓点，戏就算开演了，呛……呛……我们跑着园场，或是迈着四方步上场了。东一段，西一句，将看过的戏中印象最深，最感兴趣的情节逐一地表演一番。京剧中有十八扯，我俩一百八十扯也止不住了。四周的大人、孩子都来围观，人越来越多，非常热闹，我们并不觉得不好意思，情绪反而更高涨。

记得有一次，我们演《收关胜》带水擒。我演关胜，他演阮小七。水擒时，阮小七摘关胜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拉着关胜一条腿走矮子。关胜这时要一边甩髯口，还要一腿往前蹦，我俩既无功夫

又不会配合，没蹦两下我就站不住了，手猛一扶地，正好碰到地上的破碗碴，手被划个大口子，鲜血直流，盛戎一看不知所措，“观众”们七嘴八舌地让我去旁边医院上点药，我听说西医医院全是刀子剪子，有恐惧心理，马上从地上爬起来，忙说，不要紧，我不去医院，抓把沙土就按住了伤口，我手上的血刚止住了，他帮我把手上的土掸下去。马上又从水擒演起。

春、夏、秋三个季节，我们除了看戏，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棵槐树下度过的。

过年了，我们将积攒的压岁钱，分别买了单刀、长枪、大刀、宝剑等等，戏路就宽了。

记得《枪毙阎瑞生》一剧，正在上海轰动一时，那是一出时装戏（现代戏），写的是上海几个流氓，为首的叫阎瑞生，图财害命，杀死妓女莲英，最后被正法。白玉昆、赵君玉、赵洪林等人，从上海到北京来演，真汽车、真马上台，在北京大演特演，我和盛戎看后，很喜欢“麦田”一折，莲英鬼魂吓坏阎瑞生，在舞台上翻有打有唱很热闹。我们轮换扮演这两个角色，反复演“麦田”一场，招得“观众”达三五十人，等我们的戏演完，天已快黑了，这时我俩定神一看，又想笑，又有点害怕了！我俩的脸上蒙上一层泥土不说，满头大汗顺腮帮子流下来成一道道黑印，衣服扣子丢了，口袋扯破了，鞋头也被磨坏了，混身像个泥猴儿，回家去准要挨骂。

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果然吓了母亲一跳，以为我在哪里跟人打架了，问明情由后，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唉！你这个孩子，唱戏都唱成疯魔了，看来真得送你去学戏了。”

## 七、初拜师 决心学戏

从我家去观音寺、大栅栏可以走樱桃斜街，也可以走李铁拐斜街。这两条街并行直通观音寺。梨园公会（后改国剧公会）设在樱桃斜街，在这个阶段，我无论是去大栅栏一带听蹭戏，还是到观音寺买东西，都要走樱桃斜街，站在梨园公会门口张望张望，看着出出进进的演员，辨认他们是谁，演什么的，我看过他们什么戏，以至他们在台上、台下有什么不同。

八岁那年的一天早晨，母亲让我去观音寺买纳鞋底用的麻绳，我路过梨园公会门口时，听见里面乒乒乓乓藤根相击的声音，“这一定是他们在练功，”我立时判断出来，好奇心驱使我不由自主地迈进梨园公会的大门。院子里三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正在那里打把子，我马上被吸引住了。这是演武二花脸的徐德义和演武旦的朱桂芳二位先生正在一边练功，一边教唱文武老生的吴彦衡先生还有三个孩子。吴先生原名叫吴少霞，其父吴彩霞老先生和陈德林老夫子是同时代的青衣，吴老先生和余叔岩同班合作，有些同班感情，吴彦衡先生便做了余叔岩的寄名徒弟。谭鑫培、余叔岩先生都是武生的根基，这样一来吴先生不仅要能唱老生，必须还要有很好的武生基础，所以每天和许先生学习练武功。那三个孩子，一个是张小三（入富连成科班后叫张盛亭，是北京京剧院演员张三全、四全之父），一个叫马三元（现名马俊华，成都京剧团团长），还有一个是吴彦衡的堂弟——吴秃子（其父叫吴堃芳），演文武老生，后给徐碧云管事。

我站在院里的台阶旁边，仔细地看他们练功、打把子，用手小范围地随着比画，“么”，“二”、“三”……心里默默地记着，

生怕漏掉每一个小动作。……不知不觉将近中午，他们练功结束，收拾东西走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尾随在他们身后出了梨园公会。一路上，我嘴里不住地反复念着“么”、“二”、“三”兜转身……，回到家中，母亲问我麻绳买来没有，我望着母亲发楞，半天才反应过来。

“你怎么啦！丢了魂似的，问你买的麻绳呢，快拿来我还等着用哪！”

我这才想起早上让我去买麻绳的事，赶快将今天路过梨园公会贪看许老师练功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有点生气了，她皱着眉说：“可怎么好……”母亲要责备我的话，我没顾上听，早已转身跑出院子，给母亲买麻绳去了。

以后，每天早上这段时间，我是必到梨园公会“旁听”。几天过去了，我渐渐地看会了些门道，胆子也大了，就约束不住自己，免不了在旁边给马三元、张盛亭几个孩子出主意，提个醒。“你么、二、三时膀子要这样，你没记住师傅说，胳膊抬高点不能夹膀子，‘兜’的时候迈右腿。”一边说还一边比画。

一个小孩站在一旁看练功，并不稀奇，也并不引人注目，但我每天必到，甚至提前站在院子里等他们，还总爱管“闲事”。说得又有点在理，这就引起了许老师的注意，许先生走过来说：“你会吗？你来两下我看看”。说着从他们手中拿了一根把子藤子棍交给我，他和我从头打起，打到刚学的地方，我停了下来。

“你是哪的？”

“我是袁记马车行的，”我怕他看不起，不愿教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袁瑞林，您就叫我三儿吧！”

“你这是跟谁学会的？”

“我就是这些天跟您学的。”

“你还愿意学吗？”

“我愿意。”

“你以后就跟着他们一起学吧！”

“是，师傅！”我高兴得喜出望外，连忙给师傅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许老师高兴地点着头笑着说：“可倒好，他叫张三（指盛亭小名），他叫马三（指三元小名），你叫袁三，我收了三个三，这叫三三见九，真有意思！”几句话把我们说得都笑了。

从此，我干脆正式退出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平民学校。每天很早就来到这里，扫院子，刷洗干净许老师用的茶壶、茶碗，打好洗脸水。盛亭兄他们几个来后，“我们就开始做游戏”。实际上就是追着玩，在梨园公会的三层院里前跑后窜。闹个不休。看门的程大爷管也管不住，很恼火。最后索性说，师傅不来，不许我们进梨园公会大门，事情很不妙。第二天我想出个主意，我家附近，有一家小人书铺，我们借了一本《呼延庆打擂》，来个照图排戏玩，先把小人书看一遍，记住大意，然后按故事情节，自己编台词、编动作，三元演呼延明，盛亭演雷公嘴——呼延平，我演呼延庆，兼导演，戏就排演起来。程大爷在一旁当观众，这回他可高兴了，夸奖道：“这不比你们满院乱跑强多了。”

许师傅每天一早先去溜鸟，九点钟左右才来，到他回来的时候，我赶快给他沏上茶，许师傅和朱先生练功后，边喝茶休息，边教我们。就这样，我跟许师傅练了腿功，毯子功，虎跳键子，小翻，抢背，开了虎跳前蹿，学了起霸，还学了一些身段，亮相，把

子功，学了“小五套”、“快枪”、“单刀枪”等。

午饭后，到华乐园（大众剧场前身）看许师傅演出。

许德义当时搭朱琴心班，二排老生马连良、三排老生王凤卿、四排尚和玉、五排郝寿臣、六排荣蝶仙（程砚秋是这位老先生的手把徒弟）等几位老前辈。许师傅功架稳，练武功基础扎实，把子功手里溜，脚步清楚，内外行一致称赞，他在前边加演《金沙滩》、《嘉兴府》、《收关胜》、《芦林坡》、《采石矶》。有时和武旦合演《青石山》，他扮演关平、扎靠，抡大刀片，大刀花过河又顺又好看。

现在看戏，不再叫听蹭戏，而是冠冕堂皇地跟师傅去看戏。我从服装到言谈吐语，行动坐卧完全是以内行自居。我头上戴着一顶演员们风行的鸭舌帽，身上穿着唯一的一件“行头”——半新的大褂。大褂里面要套一件雪白小褂。我无钱做白小褂，就让母亲给大褂袖口缝上白布翻过来露出白袖口，因为这是当时戏班的习惯性打扮。母亲把它洗得很干净，趁在潮干时舒开褶子压起来，甚至我自己还坐在衣服上压。这样穿时平平整整，跟着老师进园子，绝不会给他带来不光彩的感觉。

就这样，我反复观看他的舞台实践，平日练功许师傅就给我讲动作要领，如：大刀一磕时的手、眼在哪，脚如何撤步，大刀花往哪个方向砍才不致碰靠旗。听他进一步讲解，使我受益非浅，有时我一次学不会，当时练不出眉目，有些着急，许师傅就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下苦功夫练，就能练出来。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要吃这碗饭，就得下苦功夫。”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演《青石山》时，在剧中他武二花的应工是周仓，因为他大刀、靠功为一绝，有他在班里，武生不敢接关平，所以逢此戏他总是演俊

扮的关平，不演周仓。在他和九尾狐对刀的最后是“垛头”过来“垛泥”亮相，必定获得满堂掌声。有一次“垛泥”没站稳，掌声不似以往那样热烈，许师傅回到后台抄起刀坯子，啪，啪地往腿上狠狠地抽了几下，借以自责功夫没有练到家，许师傅常跟我讲：一些名角就是下了苦功，才赢得观众承认的。许师傅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从小到如今，看了不下几百出戏，大小名角不计其数，这里就不一一介绍，总之他们每人都有一绝，不知吃了多少苦才获得的，我又能练出些什么绝招呢？不管怎样，我要吃得苦中苦，学出好本事，一定要练得像他们那样受到观众的欢迎。许师傅的教诲，引导我一步步走上刻苦学艺的道路。

## 八、演丁山 初登舞台

前边曾提起过的，住在前孙公园东口，给名昆老生恩晓峰操琴的董凤年琴师，是梨园公会发起人之一。戏班里都称呼他董二爷。他有时坐我大爷家的马车，逐渐认识了我母亲，母亲也常去他家串门和董二奶奶聊天。董老先生天天下午去给吴彦衡先生调嗓子，从吴先生那里得知我跟许师傅练功的情况，母亲去串门时他对母亲夸奖我肯用功，聪明好学，说赶明儿可以跟许师傅去班里打打下手、早点挣钱。董二奶奶当即阻止说：“打下手虽是眼下能挣点钱，将来可有什么出息？龙套上下手，狮子、老虎、狗（这是形容旧戏班基本武打演员只能演狮子形、虎形、狗形等等，此处借以对基本武打演员的贬意），他既然肯学，还是让他学点文戏吧，说不定还能成角呢！”当天董二爷便和吴彦衡先生商定，让我下午去吴先生家跟他学老生。

吴先生家住香炉营四条，一个很严谨的四合院。客厅里供着祖



师爷，全套的铜香炉、铜腊签，我上午去跟许师傅在梨园公会练功，回家急急忙忙吃口饭，又早早赶到吴先生家中帮助他们扫扫院子，收拾收拾。吴先生知道我练功不错，有了点武功基础，就选择了有刀枪架的靠背老生戏《南阳关》中的伍云昭教我。他在教会唱段之后准备说身段前让我讲解讲解唱段的词意，这一讲我就闹出了个大笑话，在伍云昭哀求要捉拿他的主帅韩擒虎时唱词中有这样一段：

……

你若是将我释放了，  
早烧香，晚点灯，供奉年高。  
老伯父饶是不饶？

我给讲解成你若将我饶了，我早上给你烧香，晚上给你点灯，过年时还给你供上年糕……”

吴先生顿时哈哈大笑，将刚喝在口里的水全喷了出来，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就是我一直不重视学文化的害处。看来只盲目地一头钻进戏里，不重视学文化，就不能正确而深刻地理解词意，又如何能唱得有感情呢？

一天，董二爷给吴先生吊过嗓子后，也让我试唱，他给我定了三个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跟胡琴，可是就很有耳音，张嘴就入调，不慌腔，不走板。董二爷、吴先生父子都称赞我是块唱戏的坯子，这也是我几年来看了无数次戏，“演”了无数次“戏”的结果吧！吴彩霞老先生特别高兴地对吴彦衡先生说：“你可以给他说说薛丁山，绮霞（尚小云的号，人们对成名的角都不称名，称老板，大爷或称号）他们演《汾河湾》缺少娃娃生，经常去富连成借小孩演，

你教会他，以后有机会我可以给推荐推荐。

不久尚小云、王又宸要在中和园合演《汾河湾》，吴老先生征求尚小云同意，就带我去见他。尚小云先生一看我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挺机灵，就让我将戏排了一遍。看过之后他点头同意，此事就定了。

离演出还有三天时间，我无数次反复背戏，“来了！”“台，台，台令台……”在家中唱个没完。姐姐们可忙了，只用了两天时间就为我赶做了一双台上穿的新彩鞋（后台行头没有这样小的娃娃鞋），她们做好鞋底，还要在刚做的鞋帮的四周拉上花线穗。为了使花线配的鲜艳，我跑了不下四、五趟观音寺花线店，不厌其烦地去反复比较，挑选颜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最后将鞋送到鞋铺去请他们帮我纳好，他们一听我上台演出用，便放下手中的活计，一人纳一只为我赶制起来。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吴老先生带我到后台先给祖师爷磕了三个头，请化妆师傅给我化好妆，穿好服装到上场门候场。吴老先生给我把场子，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沉住气，别慌！”当时我的心情很冷静，自从我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拜了许师傅练功学戏以来，始终是有地方学戏，却没地方演出，就是在梦中也在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啊！可是机会难得，常自叹无用武之地。几天来可说是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如今我这梦寐以求的美好希望变成了即刻实现的事实，哪里还感到什么紧张，再者可能就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原因吧，所以我反而倒像有些舞台经验似的，心情很平静。

上场后，我神气十足，还记得在表演奉母命出外打雁时唱的西皮散板“辞别母亲出窑门”一句。我缓足了一口气，铆上劲唱最后

“门”字的拖腔，获得了观众的掌声。戏演到“弹打南来张口雁”时，我一边唱，一边抬起左腿将枪别在这腿上，摘弓、掏弹、搭弓、射雁显得稳当、漂亮、节奏感强，动作都踩在锣鼓“大大大大衣大大台”上，台下响起了喝彩之声……。

散戏后，吴老先生一看见我就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头，说：“好小子，真有你的，头回上台不仅不慌，该耍的还给耍下来了（指掌声、效果）。”随后他发给我一块钱的点心钱，我的心简直乐开了花，我拿着钱几乎是跑着回家的。

妈妈、姐姐都还没睡，我笑着跳着进屋里把钱交给了妈妈，妈妈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过了好一会，才说：“你饿了吧？给你留着饭呢！”我兴奋得不觉得饿，我问妈妈：“您愿意让我学唱戏了吗？”妈妈说：“不是不让你学，就是学戏太苦了！”我说：“苦怕什么？赶明儿我学会唱戏挣钱都给您……”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们相依为命，我们几个孩子就是她生活的目的和希望。她平日舍不得说我一句，什么都是由着我们的性子干。我从小爱看戏、爱唱戏、想学戏，母亲都清楚，但心里总不太愿意让我学戏，怕的是学戏太苦，还要挨打，再者外行吃戏饭很不容易，顾虑重重。但是不学戏又能学什么呢？又很茫然。我从平民学校退学，妈妈原不同意，但又拗不过我，怕我不高兴，因此，又没有制止我。这样，她一直处在左右为难的矛盾之中，通过这次演出，母亲似乎想开了点。

我也想了很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舞台，我尝到了在舞台上演戏的滋味——其乐无穷。听到了观众给予鼓励的掌声，使我在要学戏的一片茫茫无边的前景中看见了光明和希望。尤其是第二天我到吴先生家去，吴老先生指着我对吴先生说：“昨天绮霞说这孩

子挺有起色，以后你多给他下点功夫”听了这话，使我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自信和决心。

## 九、紧逼债 自立誓言

我那善良的大姐，性情温和、沉默寡言。多少年来，她尽全力与母亲分担家务，怜惜弟妹，什么都紧让出来给我们。有时饭不够吃，她总是同母亲你推我让，不肯再吃。家里的活计，她默默地忙个不停。随着年岁的增长，考虑的问题就多了，她省吃俭用，由于体质很差，加上忧思愁虑过度劳累，终于得了肺癆。最初，她怕母亲着急，忍耐着不愿明说。等母亲发现了，她已是病入膏肓。请医生、吃药没有钱，可是怎能看着大姐一天天病情加重呢！母亲急坏了。听说有个看相的巫婆会请神治病，就借了些钱把她请来。这个巫婆乡间妇女打扮，满脸擦着怪粉。她进屋坐在炕沿上，拿出一件已褪色的旧杏黄长袍穿上，将我和哥哥轰出门外。这样的新鲜事，我们没见过，顺着门缝往里偷看，只见母亲、姐姐跪在地下，大姐仍旧在床上躺着，她已病得坐不起来了，巫婆坐在炕前的破凳子上，又是打哈欠，又是伸懒腰，挤眉弄眼，故弄玄虚，折腾了一阵，突然半睁眼，怪声怪气地喊着：“吕祖爷，（吕洞宾），来了！要吃西瓜！”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哪里去找西瓜呀？母亲连连磕头不迭地哀求巫婆能请神大发慈悲，改样别的水果，等大姐病好后，有了西瓜多多供上。最后巫婆转达神的旨意，有苹果也将就。母亲把家中仅有的二十枚钱交给我，让我去买苹果。

那年冬季苹果很少，价钱贵。为了救活大姐，我跑遍虎坊桥好多水果铺子，不是没苹果，就是嫌钱少不卖，最后才在大栅栏观音寺把口的一个大水果铺买了两个烂苹果。我想起四大爷说咳嗽吃梨

好，我又哀求掌柜饶给我一个小鸭梨，给大姐拿回家去。

巫婆三口两口吃了苹果，就去掐大姐的嘴唇上边（人中穴），说病魔在这儿，跑不了了，临走时还叨唠着说是病魔已被神捉走了。这当然救不了大姐的性命，可怜的大姐只活了十八个春秋，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眼睁睁地就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大姐的死，对母亲打击太大了。母亲总觉得对不住大姐，一天不知哭多少次，掉了多少眼泪！大姐是母亲的得力帮手，针线活做得又细又快。少了大姐就显得不太出活，又遇上裁缝铺的生意不太景气，活不多。社会上开始时兴皮底鞋，有钱的人家愿穿皮底鞋的人越来越多，纳千层底的活也大大减少。大爷家的马车行生意倒满兴隆，因照顾我们家的时间太长了，认为我们一家六口是填不满的坑，想让我母亲改嫁了事。母亲执意不肯，经常与和尚四大爷说：“我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有点出息，我们就饿不死，我是有指望的。”大爷给我家的钱是有限的。家里的收入一天天减少，我和哥哥一年比一年大了，吃得越来越多，家中开销日益增大，所借的旧债没还清又负新债。为大姐借的一笔钱还没有还，每月还要付利息。……窟窿越掏越大，真可说是债台高筑。每逢年关，母亲是愁上加愁。和尚大爷、六姑的接济是杯水车薪。有时送来点钱略解燃眉之急，却难挽残局。俗话说：送信的腊八粥，要了命的祭灶神。一过祭灶的腊月二十三之后，讨债的就会踢破门槛。母亲强忍悲愤，听着他们说的难听的话，低声下气苦苦哀求着，劝走了王掌柜、又迎进接踵而来的帐房李先生……

熬过这几天后，母亲再也忍耐不住，放声痛哭，不住地埋怨父亲不该去世太早；又哭大姐不该“走”，往后的日子无法过下去，感叹自己的命太苦。……

的确，母亲一直都在受苦。我的姥爷一家是轮子行。姥爷赶大车，舅舅在南柳巷赶马车，家中生活极困难。母亲三、四岁开始拣煤渣，为了帮家中干活，都没有给她裹脚，出天花没钱治落了满脸的麻子。十七岁和父亲结婚时屋里就一个炕和一床半旧的被褥，二人感情虽好，可是三十二岁便守了寡，孤儿寡母苦熬岁月。

我站在门槛上，手扶着门框，看到母亲顿足痛哭的情景，我的心都感到疼了。这一切在我天真幼稚的心灵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至今仍记忆犹新。

渐渐地母亲冷静了下来，看着围在她身旁哭泣的我们姊弟四个，说：“我就盼着你们了，你们长大后只要有一个有出息的，咱们全家就不会再受这些窝囊气！”我泪流满面，紧咬嘴唇，不住地向母亲点头，心里暗暗发誓说：这个家靠我了，我得学本事挣钱！只要能学到本事，多苦我也不怕。我长大了，决不让母亲再受穷。我们家一定得过上好日子，给他们看看。

## 十、写契约 入科学艺

我生活上一天比一天穷困。学戏的条件也越加困难了。

许德义师付搭上杨小楼先生的班子，白天戏改为夜戏，早晨起得晚便不再去梨园公会练功。朱桂芳先生搭上梅兰芳先生的班，经常出外。吴先生准备要搭马连良的班。此时马先生已和朱琴心分手自己挑班，郝（寿臣）老师的地位已升到二牌，过去花脸均应在旦、武生的后边，这样一来旦角和武生只能找年青的演员配，所以旦角请了王幼卿（王瑶卿的侄子），武生约了吴先生。于是这几位先生都无暇顾我，我学戏没了着落。

一九二七年春季，我的戏迷伙伴裘盛戎进了富连成科班。我更

加焦灼不安，无止无休地蘑菇母亲去找董二爷想办法，找地方正式学戏，母亲在生活难以维持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咬着牙同意了我的要求，曾几次去董二爷家请他帮忙，恰好这年冬月，董二爷的侄子从山东烟台的戏班来京置办刀、枪把子。住在董二爷家。他看见了我，觉得不错，同意带我到山东和女武生懿万春一起给他当徒弟。若是愿意，立个字据就跟他走。我高兴得跳啊！蹦啊！回家去说服母亲。第二天，母亲带我到董老先生家里去立字据，谁知他却变卦了，他对母亲说：“不是我不愿意管，细想起来此事欠妥。你带着孩子不容易，他此去千里之遥，一立了字据，七、八年不能回来，在外边若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你交代呀！我没给你帮忙，反而害了你们了。”我一听学戏的事吹了，顿时急得眼泪直流，说：“您不答应，我自己去，走也走到烟台把老师找着，不怕她不要我。”董老先生见我决心如此之大，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了。最后，他的老伴——董二奶奶出面解了围。她对我说：“这样吧，今天你先跟你母亲回去，我给你担个保。明儿让你二姥爷去富连成科班打听打听，若能要你，不省得去烟台了吗？这样你戏也学成了，还不用离开你妈，有多好哇！”董二爷说：“能去富连成倒是好，不过科班苦哇！”

董二奶奶看见母亲一听说科班苦，脸上就露出难色，又接着说：哪儿学戏不苦哇！人家名角的孩子不也照样送去吗？谭家的富英不就是吗？人家受得了，他就受不了，再说，真有点事，你妈妈也能去看看你。这几句话可真管事，我立即破涕为笑，说：“那行，二老爷（我称呼董二爷）什么时候能去？”

“你别着急，一半天就让他去科班给你说说去，你回家听讯儿吧。”董二奶奶说。

提起董二奶奶来，她在梨园界确实称得上是个“人物”。她性

格爽朗，热心，爱管“闲事”。很能帮助人，办事干净爽快，因此大家很欢迎这位董二奶奶。董老先生又是梨园公会的组织者之一，所以董二奶奶上至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下至基层底包演员，无人不认识她、不尊敬她。董二奶奶给我家也帮了不少的忙。她很同情母亲的遭遇，在我们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几次出面担保我们才借使利息钱。如今为我学戏又费了不少苦心，我是非常感谢这二老的。董老先生死后，董二奶奶一直活到九十多岁。他们无儿无女，每逢年节我都请她到家里作客每月还要送钱给她。一九六五年左右我和爱人、女儿，还去看她一次，这就是见她最后一面了。

到富连成科班学习，梨园子弟入学很容易，外行子弟要家贫的，能吃苦的，还要有个好保人，再者是愿要有些基础的入科就能演点戏，不用从头教起，吃闲饭。董老先生找到富连成科班的叶春善老先生，把我两岁丧父，家中贫寒和拜许德义为师练功，给尚小云配演了山的事夸奖一番。叶老先生同意看看，但因已近腊月，科班很忙，要过年后再说。董老一再要求提前，最后订了腊月初二这一天带我去考试。

初二这天，我信心十足地跟着董老去科班参加考试。

我一进富连成科班的大门，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院里罩棚下面是学生练功的地方，静得鸦雀无声。我被带到正厅，叶老先生坐在中间，旁边还有几位先生，都不说话。董老和叶老互相作揖寒暄了一番。叶老先生对我说：“你都会什么呀？”我将身子站得笔直，挺挺胸脯一口气背道：文戏会《南阳关》的伍云昭，《汾河湾》的薛丁山；武功会拿顶、下腰、踢腿、飞脚、虎跳、键子、虎跳前跳开了过时还得抄一下；把子功会小五套，快枪、大刀下场，另外还会‘起霸’。”叶老点点头说：“说话倒挺冲，你溜几个虎跳，



过几个键子我看看”。我迅速地脱掉腿上的棉套裤（戏班人因要练功，棉裤穿脱不便、只穿夹裤，做两个棉裤腿，齐大腿根套好，有带和腰带系上，跑了几个虎跳、键子，这都是许师傅给开的范。他的范正，我又真练、虎跳等看着很直，也很地道。叶老连连点头。又让我念了《南阳关》伍云昭上场时的引子——“威风飘荡，统雄师，镇守南阳”，嗓音高且亮。叶老说：“得了，甭唱了，董二爷说行啦那还有错？过了年就来吧！”我站在董老先生的身后直拿手拖他的衣服，向他示意，等不及了，董老先生明白我的意思。向叶老作了个揖说：“您收下这个孩子，可真是行好事了，他家里现在过不下去了！这孩子心又太急，让他年前进来，我也就踏实了。”叶老说：“把皇历拿来看看吧！”查看后又说，“那就腊月初五吧，这天是除危定日黄正是个好日子。”听到这话，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家后，我兴高采烈地将这个大喜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想到我总算找到了所喜欢的地方、有了饭碗，脸上也微微露出了笑容。母亲马上给我张罗拆洗被褥，又借了点钱给我把被子絮上些新棉花，忙得够呛。到初四下午全部准备停当了。

这三天对我来讲，可太难熬了！我从天亮盼天黑，时间过得仿佛比往常慢多了，这三天简直像过了三个月。

初四下午，我入富连成科班的保人——董二爷拿来入富连成科班的契约。它是个大红纸摺，封面用墨笔写着“关书大发”四个字，摺内写的是：

立关书人×××，今将×××，年××岁，志愿投于×××名下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几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在科期间，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负担，无故禁止回家，不准中途退学，否则由中

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疾病，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  
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关书人×××画押

中保人×××画押

年 月 日吉利。

母亲一听七年在科期间不许回家，不许退学，天灾疾病各由天命之说，顿时就泪如泉涌，迟迟不忍在上面画押。事情到了这一步，母亲哪能阻拦我去实现渴望多年的愿望，那能改变我早已下定的决心呢，我满心欢喜，无所畏惧地伸手沾红印油替母亲按下了手印。

晚饭，母亲一口也没吃。深夜，我很快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偶然醒来，朦胧间看见母亲还坐在炕沿看着我用衣襟擦着她那双早已哭得红肿了的眼睛。

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腊月初五（阴历）天还黑黑的，我猛然醒来，睁开眼立刻起来穿衣服。刚刚入睡的母亲被我吵醒了，哥哥、姐姐们也都起来准备给我送行。

“到了科班要听师傅的话，少挨些打。”

“过几天我就去看你，给你送点‘鱼钻沙’吃。”

“别打架，有事儿多问问大群子（盛戎），他比你先去几个月，懂得些规矩。”

一路上，母亲一边哭一边反复地叮咛，好像我此去是九死一生似的。我虽然都一一点头答应，心却早飞到了日思夜想，对我来说还带有些神秘色彩的富连成科班去了。几天来我的心一直在沸腾。腊月前后是北京最冷的日子，嗖嗖的西北风刮在脸上，但我心里却感到暖烘烘的。

母亲将我送到富连成科班门口，我自己拿着行李、契约，走进

了院子。院子尽头是大影壁，我要转过影壁墙时，回头看见母亲依旧站在大门旁向我张望着，还不断地用手擦眼睛。我绕过影壁又走过穿堂，一位师傅带我到了学生们住的地方，里面是大炕，炕的外沿又用铺板搭出一截，加住一排人。带我来的那个师傅让张盛利几个人挤了挤，给我匀出一点地方，我便挨着张盛利，将行李打开，从此开始了新的学艺生活。（未完待续）

（袁菁整理）

## 赵丹在新疆监狱中

方 未 艾

我认识赵丹同志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军阀监狱里，我们是患难中的难友。他那时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四年，我比他还多二年。在这之前，我们是分别关在不同的监狱里。我在没到新疆之前，曾看过他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他的艺术形象和表演天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从听说他也被关进监狱后，我常希望在狱中能碰到他。可是我住过了几个监狱都没有遇到。

新疆军阀盛世才在垮台后被调走的前一天，想杀人灭口，就命令他的党羽准备在夜深时烧毁第二监狱，并把所有要杀的被关在其它监狱的人都送进这个监狱。那时我是关在盛世才亲自管理的特别监狱。那一天午前，天空里烟尘弥漫，到了午后忽然间刮起混着黄色泥土的大风，把全城刮得天昏地暗，我这时在一个单身监号里，坐在木板床边，正在看散步场捡到的一页用血写的绝命诗篇，看字迹很象和我同时被捕的阿山教育局局长周东郊的手笔。我有些心神不安。牢门上的铁锁当啷一声，我忙将这页诗篇藏了起来。门开了，进来两个武装卫士，用手枪逼着我收拾行李，准备转号。在我背着行李走出狱门登上一辆绿色囚车时，看见车厢里已经有了一个人，他上身佝偻着脸色惨白，他一仰起头我才认出来了，

原来是新疆日报社的社长傅希若。他的两支炯炯发光的眼睛望了望我，又低下头去一声没吭。我放下行李挨他坐下，他紧紧地握住了我一只手。车厢的后门关上以后，囚车开动了我们才开始交谈起来。我们都不知道要被押送到哪里去。估计着可能真是转号，不会大白天拉到野外枪杀。囚车在大街上迅速地飞驰，转了两个街角就在一处停下了。打开车厢的后门，我们才知道被送进了第二监狱。停车处正站着几个面目狰狞的看守。在我们下车以后，他们就把我和傅希若送进了监狱东南院一个监号里。

这个监号的铁门一开，就有一股潮湿的臭气扑面而来。号内的光线比特别监狱还昏暗。在大板床上坐着和卧着的一共有六个人，两个汉族，四个少数民族，都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我们进来后，他们有的坐了起来，有的站了起来。这六个人我都不认识。傅希若却握着一个人的手惊叹地说：“哎呀！阿丹，你原来在这里！”他们两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注意看了看阿丹这个人，原来正是我常希望见到的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他的脸面比我在银幕上看到的消瘦，身体也不象在银幕上那样健壮。他上身穿一件灰色的西服，下身穿一条破旧的黑色裤子，光着脚穿一双布鞋。他们并肩坐在板床边上谈起来，我才听出他们原来是上海美术专科的同学。傅希若讲他被审时说：我被捕以后写过一份经历，过了五年才审讯我，地点是在号称风波亭的天主堂。审讯我的是三个鸦片鬼，盛世才最狠毒的帮凶：富宝濂、何贵廷、林楚材。他们轮流审问，要我承认参加了联共党员万献廷的阴谋集团，要我写出口供。我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谁不知道马仲英带兵围困了盛世才三个月，盛世才向苏联求救，订立了《苏新条约》，苏联才派兵解了围，他才保住了军政大权。联共党员是他请来的。他还逼着他的亲妹妹盛世同嫁给了

年老的联共党员王泰成。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听联共支配，联共党员还要搞什么阴谋集团呢？我拒绝给他们写这样的口供，他们就劝我说，盛世才要去重庆见蒋介石需要这样的材料，不然的话，押了你这么多年，让你写这样口供有什么用。他们这样说我就明白了，盛世才是我的朋友，他为了保住权力，保住地位，他不管亲人，也不管朋友，都可以出卖，都可以诬陷。几次劝说都遭我拒绝，他们就用直线电话向盛世才请示，盛世才就让他们对我用刑逼供。

傅希若越说越气愤，浑身在颤抖，气得说不下去了。赵丹看他激动得这个样子，就同情地说：

“盛世才真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禽兽。自古以来各代的奸臣，现代的军阀，他们为了权力和地位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嘴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没到新疆以前，听说盛世才在新疆执行反帝亲苏的政策，当时我也知道陕北来了一些干部，有的还负责领导工作。又看了杜重远写的一本《盛世才与新新疆》的书，以为他是很进步的，所以才来新疆，在沈雁冰同志指示下，成立了实验剧团作宣传抗日的工作。乍来时他还表示欢迎，在督办公署的西大楼举行了招待会，盛世才亲自参加，设宴招待，我和徐韬、朱今明、易烈和王为一出席，陪客有沈雁冰、杜重远和张仲实。真没想到演了几个抗日救国、揭露汉奸卖国贼罪状的话剧以后，盛世才疑心是在讽刺他，竟将我们几个主要演员逮捕起来，把剧团给解散了。这时我才明白盛世才是什么人，新疆搞的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据说他这几年已经杀了四五万人，有的是在省城杀的，有的是在外县杀的，有的是汉族，有的是少数民族。东北义勇军经过苏联来到新疆的头头，几乎全都被他杀掉了。大概你也听说过吧？”

赵丹卷了一只纸烟，烟是当地产的一种烟梗和烟叶切碎了的烟

末，新疆人管它叫马合洛烟。烟卷好了，他才想起每天监号只发三根火柴，他用铁片做的小刀破成了六根，一个上午就用完了。他只好把烟送到鼻子下闻着。傅希若对他说：“我听说过，一九三四年我初到新疆时，有些东北义勇军的将领我还见过。比较有名的是马占山部队和李杜、苏炳文的部队，其中有郑润成、刘斌、周万青、杨炳森、刘海超等。抗日的将领他也杀，共产党他也杀，还听说陕北来的中共党员两年前，都被逮捕起来了，重要的人物有的被暗杀了。他投靠了国民党，听说把国民党来到新疆的几个头头也都逮捕起来了。”

赵丹听到这里，打断了傅希若的话说：“是啊！我们这邻号就押着一个国民党分子。几次被提审回来都听他又哭、又叫、又要绝食，又要上吊。大概也是受了各种酷刑。在天主堂审讯我的，也是你说的富宝濂那三个坏蛋。我说我到新疆来演剧是为了抗日救国，我有什么罪，把我逮捕起来？他们说让我想有什么罪。我说我抗日无罪，救国无罪，谁破坏抗日救国谁才有罪。他们说参加了杜重远的阴谋集团。我说杜重远是有名的爱国人士，他为反日坐过监狱，他来新疆是盛世才请来的，他怎会搞阴谋？完全是你们搞阴谋，你们在破坏抗日救国，是你们有罪。我这一说不要紧，那几个坏蛋就火了，给我上起刑来，我越反抗，他们越换样地给我罪受，据说盛世才法庭上有一百二十多种刑罚，就给我用上了十几种。什么“坐飞机”、“开坦克”，站、跪、吊打、烧、烤、刺，都用上了，几次昏过以后我更憎恨他们，揭露他们的阴谋。经过多次审讯，他们达不到目的，也就不再审问了，把我送回了监号。新疆啊！新疆，这是什么人的新疆啊！茅盾先生乍到新疆时，在《新疆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新疆是奇迹的新疆，真是奇迹的新疆，竟出现这

样的奇事。”

他们两个人很愤恨地讲他们被审讯的情况，这种情况我已经听多少人讲过了，大同小异，可是像他们那样敢于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精神，确实是很少的。有的人不但不敢反抗，揭露和指责，一经逼问叫他承认什么他就承认什么了，有的人在逼问下最初拒不承认，可是一用刑，一次、两次、次数多了也就承认了。这时我感到赵丹这个人，不但在文艺界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在政治斗争上也是一个坚强的战士。我这样想时赵丹又压低了声音问傅希若：“你听说了没有？盛世才逮捕了一些国民党分子以后，蒋介石派了不少军队进入新疆，逼着盛世才滚开。这样我们就由军阀监狱又要落进国民党的监狱了。国民党讲抗日、讲救国、讲联共也不是真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傅希若说：“我也听说了，这事是可能的。我们要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可能离开监狱。不离开监狱，对抗日、对救国是作不出贡献的。”

在他们谈话中，我还认识了这个监号里的另一个汉人。他叫于惠亨，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他是在新疆阜康县县长任内被盛世才关进监狱的，也诬陷他参加了一个阴谋案。他对我说：“我和赵丹在这个监号里已经住有二年多了，这个人有趣极了。他不但不发愁，不唉声叹气，还给我解除了一些多余的苦恼。他讲起话来非常动人，诗情画意，有声有色，幽默诙谐。既让人心情愉快，又能提高人的思想认识。有时他讲起故事来，令人听得入神，一时能使你欢喜，一时能使你感叹，一时使你感到是在春天，一时使你感到是在秋天。他不但会讲还会唱，西皮二簧，时代歌曲，无论是小声哼，还是大声唱，都能使人聚精会神，喜心悦耳。他还会绘画，有



时他弄到一个铅笔头，或自己作支笔，画山水、画人物、速写、素描，样样都行。自己欣赏，也让别人欣赏。他每天总不把时间虚度，不是说，就是画。谈起哲学、政治、经济，他也能滔滔不绝。他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革命的乐观主义者。”

赵丹听于惠亨对我谈论他，就问傅希若我是谁。傅希若说：“他是东北著名作家萧军，萧红的老朋友，曾在东北参加过抗日，在苏联学习过。在新疆是搞金矿工作的。”他听傅希若这样介绍，就很高地走过来和我紧紧握手。他说，他在上海时见过萧军，在鲁迅先生葬礼时还见到萧军悲恸得痛哭流涕。他说，萧军和萧红在西安分离了。萧红到重庆去了。萧军同女作家丁玲到延安去了。他还说，他认为萧军是真诚地热爱鲁迅先生的，他说，他也热爱鲁迅先生，有可能时一定要演一部纪念鲁迅先生的电影，把鲁迅先生的伟大形象在银幕上反映出来，展现在亿万人民的眼前。

我们的谈话简直忘了是在狱中，也忘记了监号里还有四个少数民族的人。他们都不懂汉语，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只是有时在奇怪地望着我们，他们自己也在互相地讲些什么。

看守打开了铁门，送进了我和傅希若被检查过的行李，其中有一些书。傅希若有一部《三国演义》和几本《唐诗合解》。我有一部《鲁迅全集》和高尔基著的《母亲》俄文本和中文本。几年前还准许看的马列主义的书，后来在每月两次监号检查时被没收了。赵丹发现了这些书，他就一本一本地翻阅起来，翻阅完了，就从中拿了一本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天晚了，监号的光线更阴暗了，他就凑近铁窗，靠着窗外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线，聚精会神地继续阅读。

晚餐的时候，监号的门打开了，一个炊事员提着一竹筐馍馍，一个炊事员拎着一铁桶菜汤，放到铁门口。同号的人都拿着两个苏

联产的大瓷碗，只有赵丹拿着两个当地产的大泥碗，这是因为他家里没有人给他送过碗，这种大泥碗是监狱发的。他在人们中间很有风趣地说：“人生能有几多时，何日出牢不可知，每天拿着泥碗子，铁门里边讨饭吃！”于惠亨听惯了他编的一些顺口溜，没有什么感觉，我拿了几个馍馍，端回一碗只有几片菜叶的汤，却不禁深思起来。这监狱的生活是在怎样地消磨着人的生命啊！

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我和傅希若拿出家里送来的马肠子、咸炸鱼和酱牛肉，我们四个人便围坐在一起边吃边闲谈。赵丹说，监狱里有不少人作诗作歌，编顺口溜，我认为有人把孟浩然那首春晓诗，改得最好。“春眠不觉晓”原句未动，“处处闻啼鸟”改成了“处处闻狗咬”，第三四句改得更好，“夜来汽车声，不知抓多少。”新疆这个迪化市，几年来一到春天就制造阴谋案，不就是这样么！夜夜捕人！这不知是谁改的，真可以称为改诗的圣手了。傅希若说：“我听很多人讲过这首改过的诗，监狱的管理人员还追查过是谁改的，可是始终没有查出来，可能是集体创作吧！”

我们都吃得很高兴，还在谈诗论赋，哪知道这次晚餐却是最后一次晚餐。在晚餐后傅希若从衣包里取出十几个库尔勒县出产的香梨。我从衣包里取出一包苏联制的咖啡糖。咖啡糖的糖块形状不一，外面裹着金纸，里面空心含有几十滴白兰地酒。赵丹吃了一块咖啡糖，他感到满口酒香，不禁感慨地说：“快五年了，才尝到酒香，真难得啊！”他吃了两个香梨也说：“很久没有吃过这样香这样甜的梨了。”他问我们这种糖和梨是在监狱里买的，还是家里人送来的。傅希若说，是他的老婆高凤春送来的，她在女子学院当训导主任。我说是我的女人王采南送来的，她也在女子学院工作，担任

体育主任。这时赵丹想起他的夫人叶露茜和他的儿子苗子来，他叹息一声说：“哎！我那位夫人有四年多不见了，初入狱时送过一次东西，不知是飞了，还是死了，儿子也不知下落。”他问傅希若听说过关于叶露茜和苗子的消息没有。傅希若说，两年前他被提为工犯时曾和家属接见过，听说叶露茜也在女子学院教书，还有王为一的爱人俞佩珊。以后不准接见家属，就再也听不到什么消息。赵丹内心似乎感到沉痛，很长时间低头不语。

天完全黑了，外面的狂风呼啸的声音更大了。各监号都静悄悄的，人们都象死了一样。铁门外甬道里的电灯突然灭了，这时连一点昏黄的光也没有了。全监号的人在黑暗中有的坐在铺位上，有的躺在铺位上。我们四个人又谈论起来，谈到国内抗日战争，国外苏德战争，谈着谈着又谈到了新疆军阀盛世才，谈他怎样来到新疆先投靠金树仁，金树仁被逐后，他又怎样投靠了国民党。你谈一些情况，他谈一些情况，直谈到夜深还没有停止。

我们哪里晓得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夜晚。盛世才命令他的党羽已经用卡车运进第二监狱十几桶汽油，多少箱手榴弹和炸药。还从卫队团派来两个机关枪排，就要在夜深时烧毁这座监狱。把关在这里的一千多人，全数葬入火海。没有烧死的不用机关枪射死，就用手榴弹炸死。并准备制造谣言，说被关的人们炸了狱，举行暴动，不得不用武力镇压。这是多么狠毒的诡计呀！但是革命队伍中有不真心诚意革命的人，反动营垒中也有不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一个在第二监狱管理合作社的人知道了这个阴谋，就跑到国民党新派来的驻军营地报告了。驻军的头目知道在第二监狱里还关有国民党分子，就立即派来一营兵马制止了这个惨案的发生，并还撤换了监狱的管理人员，留下了一连兵在狱外监护。

赵丹同志这一夜里太兴奋了，他不仅谈论国内外的形势，谈论盛世才，还谈到了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说他的祖籍是山东，他生在江苏南通县。他的父亲能写能画。他在童年时期就跟父亲学习写字、绘画。在中学读书时期参加了戏剧活动。有一段时期他想学法律，曾考入了上海政法大学，因为对绘画和戏剧有兴趣，又转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美专”毕业后才开始了戏剧和电影的生活，在舞台和银幕上和观众见了面。他还谈到他和叶露茜结婚时，他们是三对夫妇同时结婚，其中还有顾而已、杜小鹏夫妇和唐纳夫妇。三对夫妇旅行的合影还在上海画报上登载过。

赵丹的嗓子都讲得有些沙哑了。直到天快要亮时，我们谈得疲乏了，也听得疲乏了，才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不再谈论了。这时外面的狂风不知什么时候早已停了，外面静悄悄的，甬道里电灯又亮了，铁窗上透进了发红的曙光。忽然听到了一架飞机的声音，好象就在监狱的上空盘旋。飞机的轰鸣声立刻把人们都惊醒了。我忙起来站到铁窗跟前，飞机已经飞远了，声音也消失了，忽然听到对面的监号有人在铁窗上呼喊：“盛世才滚蛋了！”“杀人魔王滚蛋了！”一时间各监号的铁窗上都发出了喊声和谈笑声，各监号的人们都活跃起来了。

赵丹同志起来后急忙挤到铁窗前也向外呼喊：打倒盛世才！打倒汉奸卖国贼！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救国，我们要出监狱！王为一、阿韬、朱今明，你们在那里？阿丹在这里！

监狱的看守和狱卒们都吓得慌乱起来，不知如何制止。有的看守在院中大声喊着：“别吵嚷了。”有的看守在甬道里敲打铁门。可是谁也不再听他们的吆喝了。有的人不但不听，还骂了起来，“你们的主子滚蛋了，你们别再豪横了，我们就要出去自由了，小

心你们的狗头。”

看守们早知道了盛世才已经垮台，现在又滚蛋了，他们都成了丧家之犬，没有主子了，也就不敢再象以前那样耍威风。有的看守是很狡猾的，他们看清了形势，为了缓和人们的情绪，就打开了各监号的铁门，喊着，放风了，散步了。这时人们就不在监号里呼喊了，都匆匆地走出来，有的到厕所去，有的到院内，有的到各监号去找熟人。赵丹同志来到院内，他披着一件银灰色的风衣，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堆上，在看着来往奔走的人们。他首先看到了王为一，他走下了土堆和王为一又握手，又拥抱。以后徐韬和朱今明也找到了他们，他们也又握手、又拥抱，在土堆旁畅谈起来。

第二监狱在乌鲁木齐西门北面城墙根下，原来是一所军火库，人们都叫它西库监狱。里面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五间，共有二十八个监号，两个黑号，只能关押二百多人。军阀盛世才从一九三七年起，不断地制造阴谋案，被关的人多了，由一个监狱增加到五个监狱，五个监狱以外，还有特别监狱和附属监狱。把西库监狱排为第二监狱。在第二监狱东面和东南面赶走了几十户人家和一所小学校，又修了两个大院作为监狱，我们是住在东南院这个监狱的一个监号里。

这一天东院，东南院两个大院里被关的人知道盛世才滚蛋的消息后，都沸腾起来了。可是那座西库被关的人，却不知道这个消息，还象往日一样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在那高大的狱墙上还增多了岗哨，不是穿黑衣服的警察，而是穿灰色军服的士兵。院中有人指着这座西库说，那里面被关的都是由陕北来的中共干部，他们的家属大人和小孩是关在第四监狱里。其中也有由苏联回国到延安去，经过新疆没能走的比较有名的中共干部。

我和傅希若在院中也遇到了几个熟人。我遇到了盛世才在沈阳第四小学读书时的老同学赵铁鸣，盛世才在韶关讲武堂学习时的同学董率真，还有我的朋友在独山子石油厂当过厂长的边燮清。在承化县当过县长的孙志超。他们都对我痛斥盛世才，说他是无亲无友，忘恩负义的人。我和傅希若走过赵丹的眼前时，傅希若也认识王为一、徐韬和朱今明，他们都互相握手，亲切地寒暄，还介绍我同他们认识。这时看守一边喊着开早饭，一边劝说人们回到监号去，我们也就各自回到了自己住的监号。

吃完早饭以后，有的监号的铁门仍旧关了，有的监号的铁门还继续开着，当看守来关我们监号的铁门时，赵丹同志喝斥了他。这个看守就不敢关，拎着一串钥匙走开了。过了一会儿，王为一来找赵丹，他们就到院中去了。赵丹走后一个看守来找我到接见室去接见家属。我到了第二监狱的北大门。只见北大门旁几个接见室都挤满了接见的人。这也是新的现象，从来没有过这样多的人来接见。来看我的是我的女人和我的七岁的儿子。我们自从一九四一年春接见过一次，已经又有三年没见面了。这次接见也不象以前还有监视的人在旁听，进行监视。我们畅谈了一切。当我谈到我和赵丹住在一个监号，又认识了王为一、徐韬、朱今明时。我的女人不禁惊讶地说：怎么赵丹他们还在狱里，不是说和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们一块儿送回口里了么？为什么他们的女人叶露茜、俞佩珊、大程（徐韬的妻子叫程婉芬）和小陈（朱今明的妻子叫陈英），都带着孩子们走了。她们没走以前是和我一同住在一个“叛逆家属”的大院里的，俞佩珊曾悄悄地对我说过，盛世才已经通知她们，把她们都用汽车送回口里了。王为一和赵丹他们也都释放了，在路上等着一同回去。那几天叶露茜和苗子也非常高兴。原来她们是被骗走了。可见这又是

盛世才和他的老婆邱毓芳搞的一个阴谋。

在接见后，我回到监号时，赵丹问了我接见时的情形。还问了关于叶露茜和苗子的情况。我把我女人讲的情况都对他讲了。他痛骂盛世才手段毒辣，不然这时候也能够接见他们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叶露茜、俞佩珊、大程和小陈在路上没有见到赵丹他们被释放，就以为他们是不在了，所以他们经过兰州回到重庆以后，都非常失望，使得他们妻离子散。据说后来叶露茜离新疆后先后到重庆、昆明去了。俞佩珊则在成都工作，大程和小陈不知下落。

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被撤换了，第二监狱的监狱长罗聚奎也溜走了。这两个人都是盛世才最得力的帮凶和刽子手。国民党新派来了一个监狱长。他来到监狱以后，把被关的国民党分子都提到优待号进行优待。还把一些能写文章的人也提到了优待号，要写一部《盛世才祸新记》把盛世才在新疆的罪恶都写出来。这样我和傅希若也被提到了优待号。还要编写一个《杀人魔王盛世才》的话剧，又把赵丹他们四人也提到了优待号。到了优待号，各方面都给以优待。有家的可以回家，有亲友的可以探亲访友。赵丹他们无家可回，又无亲可探，就被我邀到家里。

当时我和傅希若的家都在女子学院教师宿舍的院内，我们两家对他们热情招待。他们知道我们的家属和他们的家属曾一同住过“叛逆家属”的大院，就询问起自己家属的情况来。他们这时才确实知道在他们被捕以后剧团被解散了。叶露茜和俞佩珊被分配到女子学院幼稚园工作，大程在中学当音乐教员，小陈在小学当科任教员。以后叶露茜和俞佩珊又到女子学院担任体育教员。因为处境相同便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成了患难中的好友。赵丹他们四个人听到作为“叛逆家属”所遭受的压迫、歧视、凌辱以及她们的患难之交，都不禁

感叹起来。

赵丹同志在大家坐在一起午餐时，喝了几杯酒后万分感慨地说：“我们大家在一起，饮酒吃肉，但我们并不是酒肉朋友。我们是天涯患难人，成了天涯患难友。将来谁也不要忘了我们的患难，也不要忘了患难中的难友。现在、将来，我们在抗日救国的战线上，还要成为亲密的战友，都要成为我们祖国的坚强的好儿女。我们会不会有人忘记呢？”

大家都说：“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我也说：“当然不能忘记，因为人是有记忆的。不过，你曾讲过鲁迅先生两句诗：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我知道有的人不但忘记了患难的时候，忘记了患难中的难友，还有人一阔起来，就变了脸，还砍起患难中朋友们的头来呢！这样的人真是不少。我们将来谁要阔起来，有了权，有了地位，不想砍谁的头，也就不枉在患难中作回朋友了。”

赵丹听我讲完哈哈大笑起来，他让大家都举起酒杯说：“大家来共饮一杯，就等于发誓，我们永远不忘。”碰完酒杯后，傅希若也兴奋地接着说：“盛世才就是这样一种人，一阔起来，掌握了大权，有了地位，就忘记了患难中的朋友，还把帮助他掌握大权、巩固他地位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先后加上罪名杀掉了。古今中外，这些活阎王是爱权如命，爱地位如命，他总是怀疑人们要夺他的权，要篡他的位。我们这样搞文学、搞艺术、拿笔杆的人，一辈子也不会有权，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顶多忘了也就算了。”

这时我的小儿子多多从外边玩耍回来，赵丹把他拉到身边，扯着他的手问，是不是还记得苗子。多多说：“苗苗我记得，我们在幼稚园，还是一个班。我们常在一起玩，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是他走了，再没有消息。”



赵丹抚摸着多多的手，又抚摸着多多的肩膀，不由感叹地说：“我们这些人来到了新疆，本来是想唤起新疆各族人民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竟没想到由于一个军阀弄权，使新疆各族人民遭受浩劫，还使我们父一辈、子一辈都患难，并在患难中都成了难友。”

我们从这次集会以后，彼此更熟、更了解也更亲近了。赵丹他们四人每次外出就到我家探访。王为一是一位不爱多说话的人，但他对人却非常温和，平易近人。他拉二胡拉得很好。一次饭后赵丹唱了一段《打渔杀家》的京戏。王为一竟伴奏得珠连璧合。朱今明是著名的摄影师。有一次他用自动摄影机，把我们这一群患难中的难友摄了两张合影。洗出后分赠给大家。徐韬老成持重，在他们四人中他是最有威望的人，熟人们都说他是四人中的参谋长。

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国民党由重庆派来一个审查新疆积案的审判团。对所有监狱被关的人都进行了审查。我们这些难友经过审查后，在一九四五年春，都陆续从监狱释放出来。赵丹他们四个人被释放后，住在汉文会里。他们为向新疆人民告别，又演了那出揭露汉奸卖国贼罪恶的话剧。他们四人参加排演，还亲自描画布景。一次我去看望他们，在他们住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四友图”。他们四人的象都画得很逼真。奇怪的是还画了一条铁链，把他们四人的身子锁在一起。我问赵丹这个铁链的意义。他说：“这是表示我们四个人是被一条铁链锁在一起，我们要共同努力挣断这条铁链，为抗日救国，解放全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当时他们想得多么好，他们以后果然都这样作了，不过他们很少在一起，有的仍在上海，有的在北京、广州。

他们这次告别演出的话剧演得很成功，给新疆人民留下难忘的纪念。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为抗日救国住过五年监狱的乌鲁木齐。

## 回忆我的伯父胡也频

胡 少 璋

胡也频原名胡崇轩，初名胡培基，胡也频是他的笔名。一九〇三年阴历五月四日出生于福州市城内城边街买鸡弄，现为环城路买鸡弄三号。祖籍江西新建县，祖父原是耕田的，由于灾荒，夫妇俩跟卖麻布的商贩流落到福州，后在江西人组成的京戏班里演戏，先当青衣后改当老旦。是个著名的京剧老艺人，叫胡寿林。每到春节前后，一夜要演几场戏，一场戏演后即钻进轿子，飞也似地被抬到另一个戏院，戴上花面具又上演去了。五岁的也频经常跟着祖父从一个戏院被抬到另一个戏院。从小受到艺术的熏陶。一九一一年，清朝的统治被推翻了，许多人闭起门躲在家里不敢上街，连孩子也不让出去，怕被剪了辫子不吉利；胡也频在一个私塾里附读，却不管这些，他上街大跑一阵，剪了辫子还跑到私塾里要同学们也剪辫子。这一年底，他的祖父双目失明，不久就去世了。从此他不能再念书了，在家里每天领着一群弟妹到后门的乌石山上去游玩。他很快地就跟放牛放羊的孩子交上了朋友，他们都是乡下泥水匠、木匠和贫雇农的孩子。一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哭诉着一件事情。为了看热闹，牛撞倒了乡绅祝寿的烛台，遭一顿毒打，也频义愤填膺，就编了一首歌子：

月儿圆圆照门前，

乡绅老爷啃李咸（喻人吝啬），  
淡酒小菜把客请，  
又做生日又赚钱，  
有礼送去没酒尝，  
假装阔气闹排场。

孩子们用民间小调唱开了，不到半天工夫就把乡绅老爷气得直瞪眼。后来，也频写的《绅士的请客》就是以这件事作为蓝本写成的。其中写到一个地主要厨子把一条鱼分做三片，而又摆成三条鱼的样子，讽刺地主的刻薄与吝啬。《瓦匠之家》、《鬼与人心》（一九二八年四月开明书店初版）写了瓦匠被压迫的痛苦生活，其素材都是这些泥瓦匠子女告诉他的。

一年过去了，也频的父亲得到戏班里同乡的帮助，把一座有高台的庙宇改成戏院，料理一些事务，并在“宝发”戏班里当掌鼓，以此糊口养家。也频厌烦私塾生活，自己跑到一所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去念书。在学校演讲比赛得了第二名，并喜欢演戏，扮演过话剧《仲尼与项橐》中的项橐。此剧内容是，小英雄项橐，横路建一道小瓦城挡住孔子的坐车，于是与孔子开展了一场是车避城还是城避车的辩论，结果孔子认输悻悻而归。也频的母亲最反对学校把儿子拉去教堂做礼拜，因为她信佛教，终于又把也频拉回私塾里来，一年的学校生活就结束了。

私塾设在乌塔寺里，老师是位举人叫杨国宾。在老师的指导下，也频读了不少书，读过《史记》、《左传》、《论语》等。也频每次上街除了看报纸外，总要偷空到商务印书馆看一会儿书，翻翻杂志，一些小说拖住了他的腿，每次到书店来总舍不得走开。

好天气，戏院卖座多，能够多得一点钱，阴天，卖座少，就得

不到钱，甚至亏本，所以也频全家人对天气特别关心。可惜好景不长，不幸的事情终于来了。

北洋军阀李厚基自从占领福州后，士兵为非作歹，全是看“白戏”。不知是谁把这个消息向督军报告，不久就来了一批军棍队，把戏院、戏班子的东西全砸烂捣毁了。从此也频全家便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一八年，也频被送到一家名叫祥慎的金铺里当学徒，替掌柜干打水送茶、铺床、倒夜壶、装烟、跑腿等杂事，实际上是当奴才。他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不然就要挨打受骂，每做一件事都要看老板、掌柜的眼色，然后才做出决定。他白天忙碌了一整天，晚上还只能劳乏地睡在门板上。在铺面工作的四个学徒，他们团结得就象兄弟一般，也频感到了无限的温暖。他什么事情都跟兄弟们商量，差事干完就来拉扯评论老板、掌柜的丑事。有时在伙计的面前说些俏皮话。讽刺掌柜说：“他啊，不是好货，在我们面前板起脸孔，骂这个、叱那个，一见到老板就弯着腰，低声下气的是、是、是，巴结得象老祖宗一样，一碰到老板娘就象老鼠碰到猫，缩做一团不敢动，那狗威风我就不怕。”

一九一九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怒潮波及到福州，六月十四日，福州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也频和他的朋友也参加了游行队伍。队伍到了一家大量经销日货的名叫恒盛的布店前，一些学生冲了进去，烧掉日本产的花洋布，没有烧掉的就用盐酸水洒在布匹上，把这些洋布毁掉，也频从来没有过这么激动。奇怪的是军警抓了他的朋友，却没有抓他，后来才发现自己穿的是汉服，不是学生装，漏了网。第二天，他就冒用祥慎金铺子的名义去保释关了一夜的朋友。

学徒的生活已经过了近两年，他除了管理铺子里的柜子橱子外，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跑。一天，掌柜拿了一只三钱重的戒指给师傅做样本，过后，又在清点柜橱时发现少了一只戒指，就硬说是也频偷去，理由是钥匙在他身上，而且说他不守店规，经常外出。

“从现在起，不准你随便外出，以后再发现把传单带回店里来，我要你的命，戒指快快地拿出来，便饶了你；要不，可别责怪我了。”掌柜终于抑制不住地暴躁了。

“柜橱是我管，不错，钥匙在我身上；但你们也都有。经常外出，那是你们要我去干差事当跑腿的，没有证据说人家偷东西是诬赖，戒指丢不丢不干我的事，我没有偷。”也频辩驳着说。

他们看软的不行了，便用硬的，威胁也频说要送他去警察局坐牢。他们骂他、撞他、推他。也频一再辩白，始终无用，他不能再忍耐了，便挺着胸站出来，说：“到警察局就到警察局，我没有偷东西没有犯法，不怕坐牢。赖别人做贼，真正的贼才是你们，金子掺铜，假货骗人这不是贼，谁是贼？”听了这番话，老板、掌柜害怕极了。

“反了、反了，无法无天，还成什么体统？我不治死你，我不做人！住口，住口，再说一句我就撕破你的嘴，金戒指快拿出来。伙计，把他绑起来！”掌柜暴跳如雷。

“你们来吧！”也频握紧拳头准备搏斗，却没有一人敢动手。

“来人，来人呀！给我绑、绑！”掌柜象发狂一样地吼叫着，两手拼命擂打桌子。

打金的师傅从亲戚家里回来，知道这回事，说金戒指在他那里作为凭样，并不是也频偷去。解开绳子时，也频已经被绑了几个钟头了，两只手臂满是一条条的血痕。

也频的二弟也同几个学徒一道去吵去闹了，老板、掌柜看到这

七、八个学徒来势汹汹，又有伙计站在一道，心早慌了。他们知道这些人不是好惹的，只好放炮道歉。开除的风声已经传来，也频决定走。一九二〇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也频怀着一颗兴奋的心从马尾港搭上到上海的轮船。痛苦的学徒生活结束了，他告别了故乡，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独幕剧《资本家》（《别人的幸福》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华通书局出版）写了工人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使马牛不如的生活有所改善而起来斗争，资本家受到沉重打击。也频与金铺老板、掌柜的斗争，参加捣毁日货的游行，这些真实生活的印记都深深地打在这个剧本里。在乌石山上放风筝写进了小说；掌柜把黄豆子装在酒瓶里不让仆人夹得太多，这种吝啬鬼的形象，也投射到《绅士的请客》里去；连“恒盛布店”这个店名也写进戏剧里去。也频的丰富多彩、辛酸苦辣的童年、少年生活，给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素材。这是他成为作家和诗人的酝酿阶段，也是他参加革命的准备阶段。阶级压迫和他的生活历程，是他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社会基础。

到了上海，在“小有天”闽菜馆的楼梯下住下来了。白天陪着少东家到上海浦东中学去上学，晚上为少东家补完课，就在店里打二三个钟头的杂工，收碗、洗碗、擦桌、搬椅，每天晚上都要忙到十一、二点。吃着菜馆里的剩菜剩饭，穿着少东家丢掉的破旧衣服。一年以后，在菜馆里当厨师的康康表叔，对也频产生了怀疑，是父母叫他来的，还是自己跑出来的？终于把这个消息告诉也频的父亲。

也频走后，在另一个金铺“谦益”当学徒的比他小一岁的二弟培鉴被老板开除了。也频有个表兄叫孟琇椿，当时在海军司令部担任副长官，出于对胡家人口多生活困难的同情，想方设法弄了一个

大沽口海军学校招生的名额，给胡家子弟上学，培鉴正要准备动身去上学，也频的父亲接到康康的来信，知道了也频的行踪，于是二弟培鉴便把这个上学的名额让给哥哥也频了。也频进大沽口海军预备学校学轮机，读了三年左右，快毕业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大沽口，学校关闭了，他和同学一块赴北京，希望能考进北京大学，但因英语不及格，未被录取，后来就在北京大学当一名旁听生。钱用完了，不能回家又找不到工作，流浪生活开始了。他付不起房租，为了不让公寓老板撵走他，只好常常帮助老板娘记帐、算帐、卖东西，晚上为他的儿子补习功课。

也频为什么会跟文艺发生关系，又怎么走上文艺创作的道路上呢？这个问题正如丁玲所说：“也频开始写文章时是逼出来的，没有饭吃，总不能等着饿死，学习数理化要进学校，学校进不了，只好上社会大学，开始写不好，后来发表了一些文章，认识了一些人，能出一两本书了，这样才慢慢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的。”

他有个在大学里念书的同学，不愿意去翻字典查英语生字。也频每天为他查二、三百个生字，得到的报酬就是在温暖的房间里坐坐，吃顿饭，得一些破袜旧鞋，同住在公寓里的许多大学生都是歌德、拜伦、海涅、鲁迅的崇拜者，也频逐渐跟这些大学生有了来往。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开始了文艺创作。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与项拙合编《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创刊时曾得鲁迅先生的支持，帮助看一部分稿子。就在编《民众文艺周刊》期间，丁玲向周刊投稿，他们由于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而结识交往，培养起了感情。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圣徒》；“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震动了也频。一九二八年，他怀着对革命的希望来到上海，七月主编上海《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十月

三十一日发表《胡也频启事》，宣告结束《红与黑》副刊。他深深地觉得，必须自办一个刊物。于是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拿去一千块银元，留下二百块银元作租房搬家等费用。胡也频离开福州后回来探家，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市党部礼堂，也频给中学师生作了一次文艺讲座，也谈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同时抒发了对黑暗社会的愤恨。师生报之以热烈的掌声，那些大小国民党的党羽都投以噁人的目光。回到上海后，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自办“红黑出版处”与沈从文合编《红黑》、《人间》等月刊。这时也频开始接触革命，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

在闽侯县初级师范学校念书的四弟，经常收到也频寄给他的《红黑》等报章杂志，自己看完后转给好友，并按照也频的指示，深夜偷偷地扔进学生宿舍及图书馆，一次、二次……终于被学校当局查获了，被开除了。

《红黑》发行了八期被迫停刊，为了还债。一九三〇年春，也频与丁玲一起经陆侃如介绍，到山东济南省立高中去教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普列汗诺夫等人的文艺理论，同时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经常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普罗文学。指导学生成立文学研究会，参加学校里的斗争，深得学生的信仰和爱戴。当他正在准备找党的关系时，遭到了反动派和学校当局的迫害。五月的一天，反动当局要逮捕他，同时要逮捕的还有楚图南和学生工会主席。于是在几十个学生的保护下，他连夜转道青岛，回上海去了。

回到上海后，就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担任工农文学委员会主席。在各种政治活动的短促的间歇中，挤出



为等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府。  
 才是我们的政府。  
 胡也频



一九二八年胡也频与丁玲合影

右图背面的题词

时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他说：“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这时他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胡也频在左联全体大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准备到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午，胡也频到东方饭店去参加党的会议，会议尚未开始，因被叛徒张泽厚告密，与柔石、殷夫等同志一起被捕。被捕前两个月生一子叫小频，现名蒋祖林。也频被害后，由丁玲带回家乡湖南，后去延安。

也频在牢狱里天天听同志们讲故事，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说：“叫个理发师来，把头发理一理，就义以后让反动派拍起照来，也可以更威武一点！”二月七日晚上，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铁

门突然打开，大批武装匪徒，手提马灯，涌进牢房，胡也频和柔石、殷夫等二十四位同志被押解出来，说是要送南京受审，过了小桥，军法官坐在桥头，一张茶几上放着他们的案卷和照片，军法官叫了每个人的名字，问了年龄、籍贯、职业……拿起照片一对相貌，接着叫他们在河边站住，用机枪扫射。他们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也频身中三弹，英勇地倒下了。

一天，也频的父亲收到一封寄自上海的没有署名的信，被捕的消息象一把尖刀刺进了父母的心。也频的父亲立即赶到上海，但始终没有见到儿子一面，当证实也频确是被枪杀后他才回到福州。

另一件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一个阴沉的夜晚，时钟敲了十二下，也频的母亲还守住油灯在等待着四儿回家，突然敲门声大作，几个身着黑衣的人来找，分明是便衣侦探。也频的四弟由于散发从上海寄来的刊物杂志的事而遭到追捕。大儿子被枪杀，四儿子又失踪，宛如万箭穿心，她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两、三天后，断然拿起一根绳子自尽，离开了黑暗的人间。

年仅二十八岁的胡也频，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诗歌、戏剧，长短篇小说，已经出集子发行的有十四本，其中以小说《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为代表作。

解放后，也频的遗骨，安葬于大场公墓，最近又迁葬在龙华烈士陵园。

〔后记〕一九六〇年，我开始收集、整理伯父胡也频的资料。生平事迹大部分是祖父、父亲、叔父对我说的，整理成文后，又念给他们听，反复进行核实；有一部分是看了记述胡也频的文章里的内容加以整理的，有的是访问丁玲同志时，她对我说的。



蒋兆和同志在作画

## 我和《流民图》

蒋兆和

### 不堪回首话当年

四十年前，我在自力出版的画集自序中曾悲愤地写道：“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嗟夫，处于荒灾混乱之际，穷乡僻壤之区，兼之家无余荫，幼失教养，既无严父，又无慈母；幼而不学，长亦无能，至今百事不会，惟性喜美术，时时涂抹，渐渐成技，于今数十年来，靠此糊口，东驰西奔，遍历江湖，见闻虽寡，而吃苦可当；茫茫的前途，走不尽的沙漠，给予我漂泊的生活中，借此一枝秃笔描写心灵中一点感慨……”多年来我对自己的家世和童年闭口不谈，因为那太少欢乐的童年给我留下的只是痛苦的回忆，而离家六十余载，除却一九三六年返乡半年之外，此后再未回归过故里，童年时代的人和事在脑海里也都已经淡漠许多，所以索性就不再去提它了。人总是怀旧的，我虽老病渐衰颓，有故乡不可思之感，但是正如杜工部月是故乡明，归来寻旧蹊，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的诗句所表述的，每当回顾自己走过的漫长坎坷的生活道路时，童年生活的种种

情景就自然浮现于眼前，使我回味，令我深思。

人们都知道我的故乡是四川省泸县，却不晓得我的祖籍乃是鄂东北的麻城县。我的曾祖弟兄三位，分居为大房、二房和三房，我家是二房。传说明末，连年战乱，四川的老百姓几乎灭绝，清朝政府举移民进川以休养生息，遂将广东、湖北、湖南的人民移居四川。我曾祖一家也随之入川，定居于泸州。地处川东南的泸州，座落在金沙江、岷江和沱江下游，是云、贵、川三省的要冲和水旱码头，商业手工业极为发达，读书人家却还不少。当时的泸州有三家著名的书香门第：即高家二兄弟，是清朝的同榜进士，再就是我们蒋家。我的祖父是秀才出身，屡试不第，遂开书馆教书。我没有见过祖父，只记得家里供奉着他的泥塑像。父辈弟兄七位，我的大伯父（蒋茂壁，字达宣），于考举进士以后，久在广东居高官，告老回乡略置房地产，成为当地著名缙绅，我的本房七叔蒋季龙，曾为大伯父家代管过两年地产，在土改时曾错划成地主，后来虽已查明误划，但早已把自己的祖产家屋也赔了进去。大伯父家的子孙后代，现在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父亲蒋茂江，字淮值，排行第六，也是秀才出身，由于科举场上很不得意，只能以教私塾度过清贫的一生。三伯和四伯同我父亲的遭遇相同，均是不得志，穷极潦倒，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伯母婶娘们也学着样儿吸鸦片。祖上遗留的一点微薄的家业是经不起折腾的，坐吃山空，在我出生时，家庭就破落不堪。

我们二房的家住在泸州对岸的小市卿巷子老宅里。我的母亲苗氏年龄小于先父十多岁，她没有读过书，但为人很有正义感，很识大体，过门以后主要操持家务，终日劳碌。我生于一九〇四年三月，是一家之长子，下面有三个妹妹，在封建家庭里长子占有特殊的地

位，家庭境况好的拥有祖产继承权，家产破落的就得负担起老小的赡养责任，所以父母亲对我的教育培养是很下了一番心思的。

先父善书画工诗文，为当地所敬重，为了维持一家生计，除了教授私塾，还时常为别人书写屏联、匾额，或画些山水花鸟的窗饰。我从小为父亲扶纸磨墨，耳濡目染自然对中国传统的书画产生了兴趣。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给我安排了学习的课程表，每天必须要背一叠《四书》，六七年间要求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史记》、《资治通鉴》等全部读完；父亲和叔叔每日必要我写三百字的小楷，同时也要我陪坐一旁练字，临仿柳体的颜体的字帖。初学极苦，久而久之，由习惯而渐萌生了对书法的爱好，以至欲罢不能了。又有家藏碑帖、画谱暨书画供我观摩浏览，这种环境的潜移默化和熏陶，对我以后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我幼年时很顽皮，喜好运动，家屋濒临江岸，下河游泳成了一门必不可少的功课，因之能略识水性，洒水之后和小伙伴们光着脚在岸边沙滩上打足球，真个是其乐融融也。到了十一岁，我又拜了一位泸州著名的拳师学武术，老师的名姓已经记不清了，他开中药铺，两代祖传武艺，擅长大洪拳，很有些本事。我学武三年，练得蛮不错了，体魄也很强健。我一生中渡过许多难关而不死，幼工的根基较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记得我刚从四川家乡出来去上海谋生的路上，一行三人行经长沙，夜泊码头，我们登岸到小饭馆用饭，遇到一位身材魁梧的关东大汉，坐于桌子的上首。同伴偶一不慎把菜汤泼在此公身上，他乃勃然大怒。同伴尽管作揖赔礼也无济于事，呆立一旁无言以对。我挺身而出与之辩理，大汉反愈加蛮横，全然没把这三个黄口孺子放在眼里，最后竟欲诉诸武力，逼迫我只得出拳相峙，较量之后，他见讨不到便宜，遂尴尬而

去。当时的我确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到了上海滩，一次单身夜归，同一个剥皮流氓狭路相逢，他强行搜身，无所收获就要动手打我，略一反抗，竟欲拔刀行凶。见此情景，我忙隐蔽到电线杆背后，瞅准空子进步倒擒住他的右手，将其持刀的手臂反勒在电杆上，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他的武装。可见幼年练武对我以后只身“闯江湖”的帮助是多么大。

打我记事时候起至十二、三岁止的八、九年间，总还算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但是家境清贫，日益艰难，不能不使我感到必须自力谋生。

### 辞别故土

泸州地处交通要冲，古来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末民初，四川革命党闹起了保路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有同志军与清军交战于前，又有川、滇、黔军阀火并于后，接着便是反复辟的护法战争，而我的故乡泸州则成了各路人马纵横捭阖的主要战场。川、滇两军常常在泸县小市对岸山头上架起大炮、隔江对射，炮弹从屋顶上呼啸而过，流弹横飞，无辜的老百姓四散逃亡，然后就是烧杀抢掠。加之一九一七年全国闹大水灾，那一年，泸县连续遭了两次洪水，我家紧临江边，每次都是水漫屋脊，仅以身免。家中收藏碑帖本极多，书画亦甚伙，经此天灾人祸，早已荡然无存，这时已经衰颓的家业就完全破落了。

年仅十二、三岁的我，面临着严重的抉择，要不就投笔从戎，参加川军，在军阀混战中捞个连排长当当，要不就走艰苦创业自食其力的道路，用先父经常告诫我的话说，就是“靠一技之长吃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我的母亲管家极严，我有时贪玩，深夜不归，母亲待我回家睡熟了，就拿起鸡毛掸子没头没脸地责打我一顿。挨了打记性牢，从此再不敢违反母命。母亲屡次规劝父亲戒掉鸦片，两位常为此互口角，一次又是为戒烟吵闹起来，母亲愤然吞服生鸦片自尽，抢救无效，故时年仅三十余岁。母亲的自尽使我抱恨终身。此后全家生活更难维持下去，但终要谋个生路才是。听说为人画像能赚好钱，当时用擦笔画法给人写照很时兴，可是却没看到过怎么个画法。后来一位本家叔叔不知从那儿打听到这种绘画的方法，就告诉我说要用炭精粉和削尖的笔在橡皮纸上作画。我没办法搞到炭精粉，就把燃烧着的大腊烛对碗一薰，把碗中浓黑如墨的烟当炭精粉用，经此一试还可以，就开始动手给左邻右舍的朋友画起像来，同时也临摹一些山水花鸟画。泸县有一个春荣照像馆，知我能画，就同我联系为其修补布景，最初把锅底胭脂对胶来修补，效果还好，掌柜的很满意，又要求我给他画些照像背景，记得我画的竹石云雾，虚虚实实模模糊糊，灯光照耀下效果尚佳，他也很满意。我因此获得一些报酬来添补家用。后来又听人说，在上海画画收入很可观，有的人还煞有介事地说如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印的月份牌画美女画片，一张要值一二百元呢，当时引起我的向往，即产生了想去上海的欲望。但是，从泸州到上海的川资要八十余元现洋。我为了跳出泸县这块小天地到上海滩去闯出路，就拚命攒钱。好不容易积了三十元，又向亲友们借了五十元债，勉强凑足路费，辞别了父亲和妹妹们，就毅然同家境较好的两位同学一齐上路了。

### 在上海滩的挣扎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茫茫的人生道路，何处是

归宿，真有些不知所措。我和两位同伴租住了一个小亭子间，穷困之极，终日为寻找生路而发愁而奔忙，甚至每天能够买到一个馒头充饥已很不容易了。这样朝不保夕的生活过了有半年光景。后来得到家信，说我有个叔伯姐夫王光甫在上海，可以去找他。我见到姐夫告知他我会画擦笔人像，他就介绍我到先施公司照像馆工作。我在这里随便画些别的东西，甭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立锥之地。从此开始了我生活道路上的苦斗和探索时期。因为我先后在先施、新新和绮华公司工作了将近七年，或者也可以把它叫做“公司时期”吧。

当时上海还没有门市商品广告画，于是我就想出来画广告牌的办法，把它们陈列在公司门前，以招徕顾客，效果颇好。接着又搞起橱窗美术设计，很获得该公司经理的赞许。二十年代初，上海的三友实业社有叶浅予、季小波先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张光宇、正宇兄弟和鲁少飞先生从事美术设计装帧工作，而画广告牌我算是一个开始者了。在先施呆了三年，经济境况开始有些好转，除了个人开销外，多少还可以寄些钱供养父亲和妹妹等。新新百货公司开办，它的大股东是从先施公司去的，就把我聘请到那儿搞广告画和橱窗装帧设计，这样又在新新公司工作了两年。上海人对衣冠服饰是非常考究的，追求新颖时髦的式样，是为一代之社会风尚。我对此亦很有兴趣，就下功夫琢磨起时装设计，绮华商店是专门经营妇女服饰花边用品的公司，知悉我会服装设计，就延聘我去作设计人员，兼管橱窗，还有理发厅的布置。

七、八年间，我的处境逐年有所改善，在绮华公司时的薪金已达约五十块银洋一个月，这使我有富裕的时间和财力来进修自己所要学的业务。那时上海经常举办中外画家的美术展览会，外国书



店亦经售各种世界美术名作的画册和图片，都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观摩学习和独立研究的条件。当时我主要从事工艺装饰美术设计，所制图案画极多，人像则较少，最多通过自画肖像来练习表现技巧，同时开始作油画，完全是自学研习性质。我是没有进过美术学校的人，也没有经济条件去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所以全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这点上可以使用社会是“生活的大学”这个字眼，我上的正是这样一所大学。

还在泸州家乡的时候，我家老宅就有一部分房屋出租以添补家用。租费很低廉，大部分是穷苦的劳动人家租赁，其中有卖青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老大以及贩运药材的掮客。我家本已很穷，又遭丧母之痛，而我所感受到的同情主要的是来自这些穷苦的邻居们。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欣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那时，我虽未能用画笔描摹记录他们的悲惨生活，但是他们那一幕幕的生活场面却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及至年事稍长，离乡闯荡于外，终日为生存而挣扎，困顿之余倍觉凄凉，觉天地之大，似不容我，万物之众，独我孤零，“不知所以生其生，焉知死以死其所”，特别是目击上海滩，当时所谓“十里洋场”，即是英、美、法、日等国的租界，一切均要受外国人的管辖，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在这样的社会里，我感到那些奴颜卑膝的买办阶级，尔虞我诈的奸商富豪，一方面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干着极其卑鄙的各种丑恶的勾当。而租界之外的天地又是怎样呢？天灾人祸，苛捐杂税不堪压抑的广大人民，衣不护体，食不终日，这就是旧中国灾

难深重的真实现象。

我虽不才，但面对遍野灾黎嗷嗷待哺之大众，我要站在大众之前采取些人生现实的资料，所以就制作了些粗陋的品来抒发心底的苦痛、愤懑和感受，感于中，形于外，这是很自然的。

《黄包车夫的家庭》这幅油画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我对上海劳苦群众生活长久观察的结果。它以租界的高楼大厦作背景，描绘了住在用外国罐头洋油铁桶、破烂洋布搭成的棚户中的黄包车夫家庭的悲惨情景，以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此画曾参加当时的全国美展，获得群众的好评。展出地点在城隍庙老西门一带。上海的小报有十多种，其中有些曾报道过我这张处女作，有关的评论是听别人以后转告我的。

### 初次结识徐悲鸿先生

这是一九二八年，徐悲鸿先生从法国游学归来在上海第一次同我见面。

悲鸿先生对美术青年极端爱护，毫无私心。一九二八年，他从欧洲返国，最初寄住在上海黄震之先生家里——震之先生是作蚕丝生意的，非常喜爱美术，对生活有困难的艺术青年多方资助，与悲鸿先生为莫逆之交，徐先生出国前后均在他家借住——我是经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先生引进，在震之先生寓所与徐悲鸿先生初次认识的。悲鸿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世和经历，并介绍了他自己的身世。由于我俩的生活和学艺经历极相似，都是自幼家贫，从父读书习画，十三、四岁时，为养活一家老小即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在上海滩一边鬻画糊口，一边刻苦自学美术，所以在对生活的看法上和艺术观点上都很一致。徐先生认真地看了我的习作和创作，很惊奇

地说：“你虽未有机会受到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素描基础还是很不错的，是可造之才！”他热情地鼓励我说：“我们在艺术上应该走写实主义的道路，应在我们国家多培养这样的人才，对中国画要有所改良”，也就是说要立足于本民族优秀传统之上，汲取外来艺术之长加以贯通发展。徐先生这些论点，更坚定了我艺术创作上和后来在美术教学上的信念，成为我在多年的实践中的主导思想。

不久，徐先生应聘到北平北京大学美术系作主任，他立即给我一信，邀我去那里担任图案课教员。谁知悲鸿先生刚刚到任，就被人反对掉了，于是他又来信不让我去了，叫我空欢喜了一场。徐先生从北平回转江南之后即赴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了。

### 在中央大学的两年

说起我进入中央大学，其中还有一段故事：一九二九年，我在全国美展上挂出了两幅图案画，被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李毅士先生看见了。李先生不认识我，竟打听到我的住址，自己找上门来。经过简短寒暄，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大缺少图案画教员，问我愿不愿到学校任教。我说虽然会画图案，但是却不会教授。李先生笑笑说：

“唉，那没得关系，以你的实际水平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并当即延聘我以助教的名义去中大。我真是太高兴了。没有想到梦寐以求涉足高等艺术学府的愿望竟然成为现实，特别是我又能与敬爱的徐悲鸿先生朝夕相处，得以多受教益，怎么不叫我喜出望外呢！

徐先生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他在中央大学校园里专辟有两间房子，以存放从欧洲带回的世界美术名作的复制品和大量外国画册，同时他也在这里作画，如《田横五百士》等都是在此地完成的。徐先生安排我住在这个“画库”里，使我能够饱览世界美术名

作，开阔眼界，对于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实获益匪浅。“中大”的两年，是我在艺术上获得很大提高的两年，也是我同悲鸿先生接触最多的两年。可是好景不长，李毅士主任下来了，改由汪莱伯接任，好像我是李聘的人，也就有点站不住了。徐先生认为，根根我的技能，回上海任教是完全有办法的，就把我介绍到上海美专代理校长王远勃先生处。王是留法学生，与悲鸿先生很要好，当他知道我的素描功底不错，就表示欢迎，聘我作该校的素描课教授。这样，我由南京回到了上海。

我在上海私立美专教了两年素描，由于刘海粟先生游欧归来，继续主持学校，我只得离开了这里去另谋出路了。

### 为蔡廷楷将军造像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淞沪抗战开始了。十九路军黄某组织了抗日临时宣传队，邀我去搞宣传画。目睹日寇轰炸闸北地区所造成的惨状，亲历着侵略者炮火的洗礼，我的心绪与同仇敌忾的人民一起起伏跳跃。我热望着为抗日的英雄们画像，尤其想为蔡廷楷、蒋光鼐将军留下这一激动人心的、极为值得纪念的肖像。这个愿望在黄某的大力支持下最终实现了。记得那是在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一间小屋子里摆了一张小学生用的课桌。桌上有一具军用电话机，背景是很单纯朴素的、完全是战地的气氛。蔡廷楷将军就在这里指挥作战，我就在他的旁边，在不妨碍他的工作的情况下作了素描稿和色彩草稿，然后经过约三个上午时间迅速地完成了一幅写生的油画像。接着又在另一个办公室里为蒋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这两张抗日英雄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可惜的是，这两幅珍贵的纪念肖像的原作没能保存下

来，我手边甚至连它的印刷品也没有留存。我一直关心着它们的下落。解放初期，一次在全国政协遇见蔡廷楷将军，我向他探询该画的消息，他遗憾地回答说：“这张画早已不知道到那儿去了！”事有凑巧，前些日子美术学院一位姓梁的研究生来看望我，出示他从旧书摊上收集到的良友印制的蔡、蒋二位将军的油画像复制图片，并慷慨地把它赠送给我，说是“物归原主”，这样我手头总算有了已佚的作品。

### 依然是失业和流浪

“一二八”以后，我又过起了失业和流浪的生活。黄震之先生见我如此处境很是同情，便招呼我到 he 家里去寄宿，黄震之先生的塑像就是此时在他家里制作的。一住就是三个月。当时的南京政府正在征求制作孙中山先生铜像的作者，号召艺术家应征投标。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就决定到南京去试试运气。在南京我住在徐悲鸿先生家里有一年多，全力制作中山先生的雕塑模型。刘开渠先生也参加了这次投标竞赛。结果应征的十几位艺术家却都落选，后来才听说中选的都是事先内定的人物。

悲鸿先生对我极帮忙，多次为我赴法求学而四出奔波。福建省教育厅黄梦圭先生，是徐先生的好朋友，他告诉徐先生说福建有两名官费留学生的名额，一年官费有五百元。徐先生推荐我去，并请其夫人蒋碧薇女士教我学习法文。徐夫人待人和蔼可亲；她的父母是有很高文学修养的长者，尤其是她的母亲很慈祥，对我这个流浪汉极其关切。他们一家都十分关心我的出国进修事，从各方面给我以帮助。徐先生曾鼓励我说，官费每年五百元是很少的，只要想办法搭上专供华工出国的廉价客舱，到了国外靠半工半读还是可以完成

学业的，当然家境富裕的学生就更容易些，家庭贫寒的只要能吃苦是能够闯过来的。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力主我要出国学习。于是我每日拚命地学习法文，并想法解决自理生活费的问题。后来，福建省的两个出国名额改由王临乙、吕斯百去了，因为他们家境较好，又有些自费。尔后又多次努力，依然困难重重，最后也懒得再提出出国留学的事了，至于将来如何，仍然是感到茫茫。

###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在旧中国，失业和流浪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尽管如此，蕴藏在我心中的要把当代现实生活画下来的志愿，并没有因穷困而有丝毫动摇。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在生活中认真观察、收集素材，不断地画了很多速写和记忆各种不同人物的形象特征。

后来偶然的由我的同乡李育林画家邀约，使我来到了北平。此地生活较为便宜，环境亦较安定，适于作画，李育林先生在此开办的画室，招收了几个学生，因为李育林急于回四川，由我接替办此画室，但是这并不能维持生活。我不得已就回到家乡四川，为亲友画像，弄到一点钱又回到北平。可是到此不久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我初来北平，孤身一人，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只好等待再说。那时在沦陷区的北平，听不到抗战的消息。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了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又无金钱，但越等越不能走了，钱已花光了，正在为难之际，敌伪“艺专”成立，聘我去当兼任讲师，每周二小时。我因为有个正式的职业维持生活，只好暂时担任，但生活仍不能维持，不得不又为各种人画像才勉强度过窘困的日子。

当时的沦陷区，每个中国人都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各种被压迫的情况是难以尽言的。这里举一个最小的例子：那时的北平，各道城门都有兵站岗，老百姓进进出出必须脱帽敬礼，不这样就要遭到拳打脚踢以至惨死。又如每逢过日本兵队伍时，中国行人必须恭立一旁，以示尊敬，而醉酒的日兵横行街头，打人杀人，强奸妇女等等，是习以为常的。这种亡国奴的生活和民族仇恨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促使我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些现实的亡国情景描绘下来，要把我在沦陷区每日每时目睹身受的民族的灾难和沦陷区人民日夜盼望抗战胜利的急切心情，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创作出了《你我光明有一天》、《甘露何时降？》、《小子卖苦菜》以及《轰炸以后》等作品，以抒发沦陷区人民和我自己盼望胜利、向往光明的心情。这些作品好象是一首主题性交响乐的序曲，我时刻在思索着如何画出一幅集中表现沦陷区人民遭受日寇烧杀掳掠的历史画长卷，由之产生了创作《流民图》的强烈动机。

说来话长，我从“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事变”的六年中间，自己为生活而经常流浪街头巷尾，奔波于城内外，与那些逃难的、讨饭的、拖儿带女垂死挣扎的人们接触极多，怀着深切的同情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处境，仔细体验他们经历的内心苦痛和观察其举止动作诸形象特征，深感到祖国人民所受的耻辱及他们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涯，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激发我这个中国艺术家的良心和勇气。而沦陷区的真正亡国奴生活，更促使我下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坚定志愿，创造条件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一九四二年初，我就起草了《流民图》的小稿，在起稿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反映出我所看到的每一桩触目惊心的悲惨情景，一幕

又一幕的人间地狱，我把全部心血都贯注在这幅画的构思上了。今天回忆当时我的艺术观点也全部倾诉在《流民图》之中了，正如我在画册自序中写的：“战争、饥饿、逃亡、普遍了整个世界，我不能在艺术园地里找寻鲜美的花朵，我要站在大众之前，采取些人生现实资料。在这个时代里只有艺术方能表现出人间的情景和痛苦的现实遭遇”。

开始制作《流民图》之时，我的生活仍是非常穷困的，经常因为没有钱吃饭，只好躺在床上苦熬着。幸得朋友为我推荐为人画像，每次得到一点微薄的报酬借以糊口。但是如何筹措制作这幅长卷的经费呢，却使我踌躇良久不知怎么办。即使能创作出来这样的画，如何在沦陷区展出它也是很大的难题。甚至要担极大的政治风险。

这里需要谈谈殷同其人及其与《流民图》之间的关联，因为早在我着手制作《流民图》一画的时候，就广泛流传着许多有关殷同授意蒋某人绘制该画的舆论。事实是怎样的呢？

最早我和殷同并不认识，据闻其人颇喜好美术，在我被迫赴日本开展览之前，他肯定是见过我的画，并给我以相当的注意的，因为那时我已经有了些小小的名气了。我自日本归国，途经别府，殷同也在此休养，即邀我为他画像。这样，我才第一次结识了他。在画像过程中，殷同问我生活如何，我说在艺专兼任讲师，报酬很少，还得为人画像方勉强维持生活而已；他又问及我今后还想搞什么创作，我本早有《流民图》的构思和作画的想法，即答曰计划画大一些画，主要是描绘穷苦人，他表示“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到北京去找我解决。”到了北平，我借此机会做了个计划，把作画所需材料，外出的路费和生活费用估算出来，就去找殷同。他表现得很慷慨，拿出来一笔钱，大概相当于现在一千余元人民币。我当



即设法去上海、苏州一带城镇农村，亲自了解观察南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搜集各方面的素材，耗时两月有余，回来后钱已全部用光。

从南方返北平后即着手起画稿，也没有再去找殷同。当时我很犹豫了一阵子，到底画稿给不给他看呢，若是给他看的话，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口向他再要钱，因为继续完成这幅巨作还需要很多钱，而他以前资助我的钱早已全部花光，若是他看了画稿后表示不同意此画的主题，那就更不好办，不用说钱的问题，恐怕连继续绘下去的可能性也没有了。我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心境中度过了三个月，在这期间殷同却突然患急病死了。

殷同由别府回平时，曾请我吃了一顿饭，当时有北平“艺专”图案系主任储小石先生也在坐，殷在问及我进一步的创作计划时，我说正要画一大幅表现穷苦人的画，于是此事就在美术界传开了，以讹传讹，竟说“殷同亲自委托蒋兆和画《流民图》”。殷同在那次宴会上确实说过“你好好画，画好了可以给蒋介石先生看看”这样的话。说老实话，他说这番话的真正含义，当时我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对社会上流传的舆论也不敢公开否认，因为确实是殷同拿了一笔钱给我，我确实也用了这笔资助去准备创作《流民图》这幅画的。如果当时我要解释是我自己要画《流民图》，而不是殷同所委托，汉奸特务们必然要追究我画《流民图》的目的何在。所以当时即使在我周围的学生中，我也不能透露画《流民图》的含义，这种难言之隐，直到解放后我才敢于把全部真象披露出本。

在制作《流民图》的过程中，我的经济状况极其困难，曾从多方面筹款（其中也有汉奸之流，至于该画的含义他们是并不知道

的)；当然对这种种的赞助，我是有自己的分析的，有的友人给我介绍画像是为了收些报酬，也有的是想借花献佛，走走门路，我本人则是以画像来赚些钱，把《流民图》的创作较顺利地画下去，否则没有钱，不要说画画，甚至还要饿肚皮，这样拖拖拉拉有一年多时间。

那时我还没有成家，单身住在东城竹竿巷三十四号一个没有南屋的三合院里，这儿也是我的画室。社会上许多人都晓得我会画像，所以什么样的人都要来看看，特别是我画《流民图》的消息一经传出，便经常有些陌生人三天两头闯到这里来，其中当然有不少敌伪便衣、探子和宪兵队的人。他们问我画什么？我回答说素来就喜欢画穷苦人，因而亦未加追问。在制作的过程中，我把全部构图分成一节节地画，画完一部分就收好一部分，以免让别人看出真实的内容来。直至全部画完，准备公开展出之前才一下子拼成一幅，经过托裱成为一长卷完整的大画。这样经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一九四三年秋完成了《流民图》。

展出此图，以个人的能力和名义是绝对不行的。在旧社会干艺术这一行都必须要找后台，甭管它是真后台还是假后台，是实质上的还是挂名的，反正你都得想方设法通过官方检查机关，中外艺术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我当时通过一个朋友去求管翼贤帮忙（小《实报》社长），并把一份《流民图》的照片转交给他审查。主管《实报》的管翼贤我并不认识，管那时有个日本顾问，他看了照片以后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考虑展出，第一此画不要叫《流民图》，改为《群像图》，以免刺激舆论；第二是以什么理由展出，他提出既然殷同赞助过，殷病故已届一年，展出此画正是他国葬之际，用以表示对他的感谢；同时还有一个“文化生活委员会”也出面支持。他

们还要求我写一篇称之为《启事》的短文，公诸报刊以示谢意。我亲自起草的这篇短文，他们在发表时给修改了，尽管我不同意，但也毫无办法，日伪当局是以展览为手段宣传他们那一套货色，我的目的则是为了展出《流民图》，只要艰难地透过严密的官方检查机构，使该画与社会人士见面，就算实现了我的初衷。《启事》前段有几句话很重要，虽经日伪删改却还能反映出我展出《流民图》的意图。记得头一段的意思是，希望大家看了我的画以后，不要夸奖我的技巧，也不要赞扬我的艺术成就，希望诸君在仔细看过之后沉思一下！这才是我展出《流民图》的真正目的和真正涵意所在。十年浩劫当中，有些人把“汉奸文人”的帽子强加在我的头上，把这篇《启事》当作“罪证”，在所谓定案时却有意把《启事》前段的这段话删掉了，其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更有甚者，把完全与我无关的日伪反共雕塑《斩蛇像》的起草亦加诸于我，虽经当事人一再证明与蒋某无关，却依然强词夺理，非要用这重得怕人的“罪名”将我打入“汉奸反共”之列，“四人帮”之流颠倒黑白已到何种地步啊！

经过各种曲折的努力和友人的帮助，这幅高七尺长九丈的《流民图》终于在北平的“太庙”展出了。展出之前，我已清醒地意识到，这幅包含着一百多个人物的巨构，由于它反映出画外千百万被压抑着的各阶层人民的仇恨和愤怒及它所描绘的无声的呐喊和控诉，必将遭到不幸的后果，它的展出很可能是短命的。因此我作了事先的应变准备，把从原作拍下的照片赶印了五十份。这些照片在展出当日的上午就卖光了。果然不出所料，《流民图》展出还不到一整天，就立即被日寇勒令停展。虽然如此，看到此画的人还是不少。最使我难忘的一桩事是，展览当天的傍晚，《流民图》已经收了起来，有一个中国警察走到我面前，恭敬地向我敬了一个礼，但什么

话也没有说。他当时那种沉重的心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见《流民图》只要与广大人民见面，就会激发起爱国的共鸣之感，我至今一回忆到此事，就使我含着满腔热泪，不知道是悲哀还是安慰啊！我们中华民族的灾难是何等之沉重啊，而发自人民心底深处的愤怒和抗议又是何等强烈呀！我相信正是在这种无声的控诉之中，将会造就出伟大民族光明的未来的。这种心情在我于抗战胜利初所撰《流民图》序言中得到体现，序言结语云：“抗战八载，天地重光，正义之神，终于突破了帝国主义者之武力侵略，炎黄世胄，得庆昭苏，万甸河山，依然如故，国人欢欣鼓舞之情，是殆不可言喻也。……”

### 与徐悲鸿先生的重逢

抗战时期，我与徐先生的信息完全断绝。那时我在沦陷区画了些画，已有些小名气，消息辗转传到大后方，便有人说蒋某人可能是亲日的……。悲鸿先生于抗战胜利后从重庆来到北平，一度误信了这些传信，对我很冷淡。黄警顽先生知道了此事，颇为我抱不平，我也没有贸然去拜访徐先生，听之任之，认为终有一天真相将大白于世的，何必多加解释呢？过了一段时间，警顽先生来看我，非拉我去见徐先生不可。我才偕我爱人同去徐家，见面时，我如实地将几年来的经历面陈，并呈上自己的画集及《流民图》。悲鸿先生一看画册，颇为惊讶，似乎又很激动，当时什么也未说。徐先生随即走进屋里将当年在南京给我画的素描肖像送给了我的夫人肖琼，以示对我们之间有深厚情谊的纪念。这时我深感悲鸿先生对我有所理解。几天以后，徐先生就写了一份正式聘书给我，聘请我到 he 主持的北平艺专任兼任教授。

解放初期文艺整风时，围绕着《流民图》是“汉奸美术”之类的舆论又复重来，查来查去，不可开交。不久后，徐先生把我找来当面问道：“你的《流民图》是在赴日本展览之前，还是赴日之后画的？”我答道：“是在去日本之后，回国之后画的呀！”徐先生会意地点点头，以示首肯。

谁知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又反复地调查这个问题，另又给我冠上反共《斩蛇图》作者的莫须有罪名。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才逐步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了过来，使历史真象大白于人间。

我那描绘多灾多难祖国人民命运的《流民图》一画的命运，也正象画中的主人公们一样，是何其多灾多难啊！而作为此一画幅作者的我之命运亦然。历史的经验证明，你若执意追求真理，就要作好下地狱的准备，只要你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抚育你的人民，为了“以素褚百幅，秃管一枝，为我难胞描其境象”于万一，即使经受炼狱也是值得的，因为我并没有违背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而在千难万苦之中竭尽了一个艺术家的天职。



《流民图》局部

## 商务印书馆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朱 蔚 伯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一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正月初十日），正当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马关条约（一八九五年）签订后的第二年，戊戌（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的前一年，其时中国门户洞开，以英美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堂奥，全国人民痛定思痛，封建社会的开明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有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他们政治上要改专制为立宪，文化上要吸收西方学术思潮和科学技术，包括废科举、办学校等等。

所谓学习西方，事实上就是学习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中，修内政，立宪法，革新教育，振兴武备，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之一，成为古老中国学习的榜样。因此，变法维新成为朝野一致的主张，提倡新学成为时务的要图，宪政时务书籍的需要如旱望雨，出版界的现状已远非当时官书局、旧书坊和外国教会办的几家印书房所能满足。商务印书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诞生，可谓适逢其会，具备了经营发展上十分有利的条件。不过创办人的动机，据商务印书馆发起人之一高翰卿在他所讲《创业史》一篇谈话中所说，是“微不足道的”，并不是一开头就抱着什么雄心壮志和远大意图，他说“商务之成功是半由于人事，半由于机会”，正是一句实话。

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在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启蒙时期，对我国文化教育和科学艺术的推动和传播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在企业经营管理和职工福利事业等方面有它自己的一套办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成长树立了鲜明的范例。它从创业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前的三十五年间，以一家手工业作坊的小印刷厂，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从三千七百五十元原始资本，一再增资升值，发展到五百万元股本；职工人数从寥寥十几人增加到六、七千人（包括总分馆厂）；机器从十来架增加近二千部，其中米利机就有八十多套；厂房面积从三间两厢展拓到一百多亩，内部分工精细，出版图书和经营项目千头万绪，举不胜举，非一篇短文所能尽述。这里只想谈谈商务创业初期的大概情况，如创办人、原始资本、吸收外资、利用日本技术、中日文化交流、从印刷走上出版，以及人事和经营管理上的一些花絮。这里只能作为一个楔子，切望熟悉商务历史的前辈先生、老作家和旧同事们，各就其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撰写专题，留下鸿爪，以饷读者。

## 一、创办人的思想背景

商务的创办人是鲍咸恩、夏瑞芳、鲍咸昌、高翰卿、郁厚坤、张蟾芬等，而最初的和真正的发起人是夏瑞芳、鲍咸恩二人。

夏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人，破产农民家庭出身。父母以家贫鬻其田宅，在上海南市董家渡设一小肆，母亲一度在外国传教士家当保姆。他们把孩子寄养在乡下亲戚家里。夏瑞芳十一岁时，只身潜行来沪，父母无可奈何，把他送到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清心堂半工半读，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十八岁丧父，为了糊口，由清心

堂监院介绍入同仁医院习医，留院一年，学无所得，改入英商《文汇报》馆学西文排字，后又入捷报馆，与鲍咸恩二人同为排字房工人。《捷报》是英国人在上海经营的文化侵略工具，当时在华东、华北地区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经理兼编辑奥夏傲慢无礼，脾气极坏，对待中国工人的粗暴轻蔑态度，使夏、鲍二人内心异常痛苦。因此常想要脱离报馆，自谋出路。这一“微不足道”的动机，由于他们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本着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精神，终于形成一个胚芽，以至生长发育而成为一个十分庞大的民族文化企业。

高翰卿名凤池，上海人，当时他在外国教会办的美华书馆，由学徒升为经理，与夏、鲍二人都是清心堂同学，又是同业和教友，少年知己，无话不谈。他们常在教堂里见面，诉说心情，谈到在外国人鞭策下受到的痛苦，觉得可以办一个印书房，做点印刷生意，只要每月有六、七百元营业，就已足敷开支。他们选定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三（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五日）上巳佳节，在三洋泾桥一家小茶馆楼上集会，订立议约，着手筹集资金。

## 二、开办时的股本

最初的资本额一般说是四千元，实在的数目是三千七百五十元，股份的分配如下：

沈伯芬	两股一千元	徐桂生	一股五百元
鲍咸恩	一股五百元	高翰卿	半股二百五十元
夏瑞芳	一股五百元	张蟾芬	半股二百五十元
鲍咸昌	一股五百元	郁厚坤	半股二百五十元

股本数目虽少，但筹集这笔资金是很不容易的，曾经花了很大的力



气。大股是一位在电报总局工作的天主教徒沈伯芬，沈与张蟾芬为同事，经张介绍入股。夏瑞芳的一股五百元是夏太太向同学女友借来的，鲍咸昌的一股五百元，其中半数是由高翰卿借给他的。据说原定资本四千元，每股五百元，有一股东凑不出钱，少交了半股，所以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

### 三、初创时的人事和业务概况

创办人中最先参加馆内工作的是夏瑞芳、鲍咸恩、郁厚坤三人。最初馆址在江西路北京路首德昌里末街三号，是租用三幢两厢后连披屋的民房，中西文排字就设在披屋，机器设备只有一些手摇架，脚踏架，自来墨手扳架等，总共不过十来部，全部职工不过十几人。次年六月，由德昌里迁至北京路庆顺里口美华书馆西首，有屋十二间，已稍具规模。鲍咸恩的弟弟咸昌、咸亨兄弟原为美华书馆工人，馆里的人称他们为大鲍、二鲍、三鲍，迁址以后，二鲍、三鲍亦进馆办事，分别主持排字房和印刷房。夏瑞芳任总经理，他的职务上自经理，下至店习，以及校对、收帐，采办等等都由一身兼任，工作要做到每晚八、九点钟为止。月薪二十四元不够家庭开支，他在出外承揽印刷业务时，给熟悉的保险公司兜揽生意，以此收入来贴补家用。夏、鲍两家家眷都住在庆顺里，关于馆里装订摺书等事，便是她们的义务工作了。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高翰卿在美华书馆尚未来到商务时，有这样一个传说。他在美华门市部承接印件，根据外国人标准，把价钱估高高的，顾客嫌其昂贵，他就顺口说出，要便宜请到西边新开的小印刷店试试，无形中给商务拉上生意，促成了商务的业务进展。这是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战斗技术，他在经济上给外国殖民资本以理

所当然的有力反击，从而减轻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商务创办人对于这些事情讳莫如深，知道的人也不多，现在看来，他正是做了一件好事情，而决不是什么坏事。此外，他还经常帮助商务添办纸张材料，在银钱往来上作担保。等到商务站稳脚跟，业务蒸蒸日上，他才离开美华，主持馆里的进货和财务工作。

夏瑞芳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为了寻求友谊和知识，他在创业的当年，就坐着三等舱位，到日本考察印刷，以日为师。的确，日本的制版印刷技术，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第一流的。一九〇〇年，有日商在上海经营的修文印书局，因营业不振，难于维持，经印锡璋介绍，由商务接盘全部机器铜模、铅字、印版和印刷材料，自用之外，还售去了一部分，并于此时开始使用纸型。设备上有了扩充，基础也更加稳固了。据了解，在接盘修文的印刷器材中，有日本技师雕刻的同文版《康熙字典》铜版，印出的字典清丽悦目，颇受社会重视。

创业最初几年完全为合伙经营，虽然获利丰厚，所有盈余尽作营业资本，发起人概不支取官红利，职工也拿不到分文红利。直到一九〇一年，张菊生、印锡璋等投资商务为股东时，始重行估值升股，议定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七倍，连新股合成股本五万元。张、印二人投资多少没有材料可查，印为上海著名棉布商人，经常为商务调度经济，可能投资一、二万元。张是一个书生，投资不会太多，听说为了凑集现款，曾兑去许氏夫人的金饰，充作股本。次年（一九〇二年）张菊生参加商务工作，开始在长康里筹设编译所，介绍其同年老友蔡元培（子民）任总编译，一九〇三年六月，因《苏报》案发，蔡离职去青岛。张菊生系于一九〇三年二月（光绪二十九年正月），结束了译书院职务，正式到馆任编译所长。由

于印、张二人的入股，以至后来相继参加商务的工作，大大加强了商务经济上和人事上的力量，为日后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里可以提一下，夏瑞芳是怎样认识张菊生的，张菊生名元济，号筱斋，浙江海盐人，光绪壬辰科（一八九二年）进士，戊戌政变时，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章京，政变失败，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是光绪帝平日对他有好感，有意成全他，所以建议西太后给以革职处分，免遭杀身之祸。张在晚年刻一个“戊戌政变子遗”的印章，用于书件，就为纪念这一事件。他匆匆离京回沪，李鸿章念其清寒，已先驰书盛宣怀（杏荪），请其设法安插。张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后，排印书稿大多交商务经办，夏瑞芳谨慎对待，叮嘱馆里同事，凡是张来电话以及一切业务联系，必须由他亲自应付，办事认真，不出差错，张也赏识夏氏才干，由于频繁的接触，彼此产生深厚感情和友谊。后来商务由印刷转向出版，夏想邀张主持编译，张菊生对他坦白地说，大学堂薪俸很高，商务能请得起吗？这话原是戏言，不料夏瑞芳毫不犹豫地，大学堂给多少，商务也给多少，张大吃一惊，反而无言以对。日后张因反对南洋监院帝国主义分子福开森（后任新闻报馆监事），同衙门式的译书院工作亦格格不入，夏遂以每月三百五十元的高薪，聘为编译所长，就当年的物价和生活水平而论，夏氏这一壮举，他的胆识和气度是十分惊人的，值得我们回忆和称道。

#### 四、从印刷到出版走过的曲折道路

书籍是思想性产物，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生产。商务以经营印刷发迹，在创业第二年的一八九八年，适应当时学习外国首先要学习外语的需要，出版一本《华英初阶》，后又续出《华英进阶》等

书，竟然风行一时，销路很广。同年三月至六月，印行一种可能是我国最早出版的科学画报《格致新报》，前后出了六期，插图丰富，印刷工艺达到相当水平，一九〇一年又创刊《外交报》，前后共出十卷三百零一期。出版这些书刊的成功，大大激发了几位创办人对出版事业的兴趣。夏瑞芳曾广约社会人士给商务编译书稿，出版后销不出去，夏把一些存稿请张菊生代为审阅，结果尽是质量低劣、粗制滥造的废品，完全不合出版要求。夏氏至此始知受骗，大量稿费掷于虚牝。由于这一痛苦的经验教训，他意识到组织书稿，出版图书不是门外汉所能胜任，必须要由真才实学之士担任，必须有自己的编译所和总编辑，他的第一个对象和理想的人选便是张菊生。

一九〇二年七月，北京路馆屋失火焚毁，乃自建印刷所于北福建路海宁路，以鲍咸恩为所长，另设编译所于唐家街，设发行所于河南路棋盘街，内部职务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经济基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自张菊生正式进馆主持编译所后，从各方面网罗人才，出版界不少知名的老前辈如蒋维乔（一九〇三年六月进馆）、庄百俞（一九〇三年十月进馆）、高梦旦（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进馆）、寿孝天（一九〇四年七月进馆）、杜亚泉（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进馆）、黄元吉（一九〇五年十月进馆）、骆师曾（一九〇六年十一月进馆）、陆尔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进馆）、沈颐（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进馆）、戴克敦（一九〇六年一月进馆）等都是在这三、四年参加商务的编译工作，编印了不少学校课本，教科书籍和辞典工具书等，在此以前，菊老在编译方面已给商务做了不少工作，直到他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在上海逝世，其时他已届九十三岁高龄，在这整整五十八年中坚持不懈地为中国的文化出版和教育事业，为影印善本和流通古籍，贡献出宝贵的精力。虽然晚年病榻缠绵，他还是热

爱商务，关心商务，没有一时一刻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 五、吸收日资进用日本技师和顾问

一九〇二年七月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各省开办学校，教科书的需要突增，商务印书馆就在这空白地带和紧急关头，着手编印教科书。一九〇三年一月编译所从唐家街迁往蓬路，人员大加扩充。据商务保存下来的《编译所职员录》（一九〇三年—一九三〇年）所载，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五年期间，共进用编译人员九十七人，迅速壮大了编辑队伍。一九〇三年的营业总额已达三十万元，五万元资金在运用上显然感到不足。

日本金港堂主人原亮三郎适于此时到上海筹办印刷公司。金港堂是日本一家资力雄厚，有历史有声望的出版商，夏瑞芳闻讯，惟恐与日商对立竞争，于业务不利，权宜重轻，决定利用合作方式，与金港堂合股经营，华股日股各出十万元，合成股本二十万元。商务对这件事情不宣扬，外面知道底细的也不多。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阴历十月初一日）改组为有限公司。与日方所订协议书有两个主要条件：一是经理及董事都是中国人，只举日方一人为监察人；二是聘用的日本人可以随时退职。

商务最早出版的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是在张菊生、高梦旦、蒋维乔、庄百俞、杜亚泉等主持下编写的，参加设计编纂的还有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兼视学官小谷重、日本高等师范教授长尾植太郎，又聘请日本教育家文部省编辑局局长伊泽修二为编译教科书籍顾问（见《东方杂志》一卷一期及十一期）。每一课文字斟酌，一丝不苟，几位编辑人互相商讨，经月不息，有时为了小节而争论得面红耳赤。一九〇四年二月《初小国文》首册出版，深

文用半寸见方大字书写，附图九十余幅，这在当时社会尚属创见，大受学校欢迎。十二月续出第一册。一九〇六年又编出《高小国文》第一册。这是早期中日合作编写教科书的大致情况。

中日合股充实资金以后，即在宝山路筹建新厂，一九〇七年印刷所、编译所新屋落成，占地三十余亩，后又扩建至七十多亩。先后进用日籍技师前田乙吉、大野茂雄指导照相铜锌版技术，进用柴田等传授雕刻黄杨木版、画石、落石等技术。一九〇五年又聘木本胜太郎、和田瑞太郎、细川玄三、冈野等八人教授彩色石印制版及雕刻铜版等工艺方法。其时发行所有位日本人小平原当会计员。一九〇八年又聘用木村今朝男，指导铅皮版印刷术。

一九〇九年三月设立董事局，这是商务有董事会之始，在此之前，业务上重大问题常以编译所会议决定之。日本股东加藤驹二（号靖溪）、长尾植太郎（号雨山）列席董事局，研究并协助图书的编译工作。长尾曾任日本文部省图书审查官、高师教授、帝大讲师，对编辑教科书有丰富经验。同时在编译所工作的还有中岛端（号复堂）、太田政德（号母山，爱知县师范校长），他们都是精通汉文的教育家和汉学家。日本专家顾问生活比较俭约，宾主之间相处得比较好，他们认为商务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功劳，能够认真教导青工学到技术。技师的工资一般为八十元至一百八十元（木本为技师长，月薪一百八十元），加藤、长尾的薪水都是二百元。

上文提到的另一创办人张蟾芬，原在电报总局学堂担任电报兼英文教习，也在设立董事局的这一年进馆。他在电报学堂待遇很优厚，由于爱护他自己创办的事业，愿意降低薪水，来到馆里工作，直到一九三六年他六十八岁病故，没有离开过商务。

## 六、出版工作上的文化交流

商务创立于戊戌政变前一年，已如上述，当时酝酿着变法维新的革命运动，朝野竞谈时务，提倡新学。看到日本施行宪政有效，急于把日本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所以译书以从日文翻译为主。一九〇二年出版日本浮田和民著，出洋留学生编译所译《帝国主义》一书。在距今六十三年前，提出“帝国主义”的概念，出版一本以《帝国主义》题名的小册子，事情并不简单，这里要有很大的勇气。其后陆续出版菊池学而著《宪政论》，辰巳小二郎著，戢翼翠译《万国宪法比较》、矢津昌永著、陶谿译《日本政治地理》，森山守次著《欧洲最近政治史》，松本平善《新闻学》和进步作家幸德秋水著的《广长舌》，等等。

日俄战争爆发于一九〇四年，当时在编译所工作的中岛端首先翻译法人波留著《俄罗斯》第一、二、三编，同时编印《日俄战纪》（画集），前后共出三十册。在这一年的前后，还编印《战争丛书》、《历史丛书》、《政学丛书》、《传记丛书》、《财政丛书》等比较有系统的成套丛书，每套五、六册至十余册不等，大多也是从日本文献译出的。这些日本图书的介绍，实早于我国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大量译印。

次年日俄战争告终，新兴的资本主义日本战胜了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不能不引起震惊，遂又纷纷学习日语。商务就在此时出版《东文法程》及《和文汉译读本》八册，由长尾植太郎校订，两书风行一时，为各地学校广泛采用。至一九〇七年，一部较具规模、原由南洋译书院翻译的《汉译日本法规大全》（全八十册）在商务校印出版。其后，又译印《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十六国

议院典例》及田边庆弥的《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等。商务出版过不少科技书籍和动、植、矿物学辞典，主要亦系译自或取材于日本图书，给我国学术界提供有用的技术资料。

严复（几道）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哲学名著，商务是在一九〇三年以后开始出版的。例如亚当斯密《原富》先于一九〇一年由南洋译书院出版，后由商务重印，接着续出甄克思《社会通论》、穆勒《名学》、孟德斯鸠《法意》、赫胥黎《天演论》等。有不少事情，商务总是走在人家前面，如严译《社会通论》，作者与出版家签订一项版税合同，税率高达定价的百分之四十，为我国有版税制度之始。一九〇四年出版严氏自著《英文汉诂》，采用横行排版和新式标点符号，开我国中文书横排，同时使用新式标点的先河。这本书里粘贴严氏的“版权证”印花，是商务率先引用日本试行“著作权印花”的创举。

张菊生一生致力于校印古笈，我国有不少罕见的善本古书流传日本，菊老几次亲自东渡，或通过其他学者和学术团体如中华学艺社等，向日本公私藏家借制照片胶卷，运回国内影印（例如《四部丛刊》即收有日本藏书）。这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商务作出的一些贡献。

## 七、收回日股经过

商务早期的资本增值，在合资后的一九〇四年调整为五十万元，一九〇五年增加到股本总额一百万元，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实收资金为七十九万六千五百元。

与中华民国同年同日生的中华书局，一开始就出版一套共和制的《中华教科书》，打出完全华商的旗帜，大登广告，目的是揭商



务的底。商务措手不及，业务竞争陷于十分不利地位。原来，中华几位创办人如陆费逵（伯鸿）、戴克敦（懋哉）、沈颐（朵山）、沈知方等都是商务的人，戴、沈是国文部编辑，陆费逵曾任《教育杂志》主编，后为出版部主任，沈知方是商务发行所重要职员之一。他们深知内幕，看出商务当局对辛亥革命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在编辑出版方面没有及时作出充分准备。陆费逵（伯鸿）暗中联络几位老编辑和知心的教育界人士，内外合作，在他家里编好一套教科书。他还拉拢文明书局及其印刷所的负责人，组成一个包括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各方面人物的相当完整的班底，民国成立，中华书局的筹备工作亦同时告成，不久就以一套适合共和体制的教科书应市，使《最新教科书》的黄龙旗黯然失色。商务招架不住，只得四出奔走，请政府准予沿用旧教科书，一面赶编《共和国教科书》，以资对付。陆费逵（伯鸿）在这一回合战斗中完全占了上风，迫使商务对日股问题不得不作认真的考虑，以至最后摊牌。至于足智多谋的沈知方后来怎样师袭陆费逵拆墙脚的妙法，自己办起世界书局来，以教科书跌价倾销作招揽，把书店搞成一个拍卖行的形象，出现于上海的文化街上，给商、中两家负责人树立一个伤透脑筋、穷于应付的劲敌，这是题外文章，表过不提。

外受客观形势的压迫，内由于爱国主义的驱策，商务当局再四筹谋，决心收回日股。夏瑞芳几次亲赴日本，与金港堂附股人磋商，经过一年多的往返交涉，至一九一四年一月六日，始与日股代表福间甲松签订收回日股合同十二条。一九一三年底，商务股本总额已调整为一百五十万元，合同议定退还日股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一十六元五角，分两期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六日及六月三十日各交半数。商务负担相应的利息四千三百七十元，汇水差额一万四千四百七十

七元五角及办费二千七百六十九元五角八分，共计二万一千八百一十七元零八分，又付款衍期利息约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元。自一九〇三年中日合资到一九一四年一月收回日股的十一年中，商务除支付日方股东官红利不计外，因收回日股实际付给日方的股本、利息等共达五十八万八千二百元左右。商务虽然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但是从政治上考虑，这是完全必要的，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商务登报公告，同年三月呈报备案，声明“股东特别会议决收回外股，现已为完全华商自行集股办理之公司。”五月三十一日经农商部发给第四一二号批文，准予备案。

一场收回日股的公案方告结束，孰料总经理夏瑞芳突然于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傍晚在发行所门口被人暗杀，送至仁济医院，因伤重逝世，年仅四十三岁，这是对商务的严重打击，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损失。刺客王庆瑞当场被捕，受到法律制裁。因为收回日股的公告与夏氏被刺凑巧碰到同一天，外界颇有误传。据我们所知道，此事与收回日股毫无瓜葛，而是与军阀的罪恶活动有关，这里不多谈了。

## 八、赴日参观、访问、学习

上文已经说过，在商务创立那一年，夏瑞芳曾亲赴日本考察，后又不断派人赴日参观、访问、学习，并进用在日本学习印刷工艺的留学生为技师。一九〇三年高梦旦进馆之前，原任浙江大学堂日本留学生监督，他在应聘回国时，搜集了大批教科书、辞典等图书资料，带回国内，给商务作编译上参考取材之用。

收回日股后，日籍人员陆续退出，一支新的技术队伍已逐渐壮大起来，在各个部门独立工作。一九〇七年，正当商务业务大扩展阶段，印刷技术从手工业式的黄杨木刻过渡到照相制版的时候，商务已开始变换方式，依靠自己力量，委派郁厚培、卜光裕二人赴日学习铜锌版、珂罗版技术，回国后大力扩展照相制版业务和珂罗版印刷，大量印制名人字画碑帖，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采的高级艺术复制品。

一九一〇年三月，张菊生出国考察教育，调查欧美各国印刷业状况，历时十个月，游历了许多主要国家，至次年年初回国，著有《寰游谈荟》一书，介绍考察概况。菊老的出洋考察，对后来商务积极扩充印刷业务，采用最新式技术装备，提高出版物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此以后，印刷所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续派唐崇李、孙含英、顾德润三人赴日，在三间印刷所、凸版印刷会社等学习铁皮印刷（即印铁工艺）、雕刻凹版（直刻钢版）以及彩色石印制版技术等。回国后，馆内成立印铁部，扩展马口铁印刷制罐业务（现唐已退休、孙已去世、顾在景德镇办理磁器印刷）。约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进用从日本高等工艺学校毕业回国的丁乃刚主持彩印管理工作，成立彩印管理处，推广彩印技术。

董事鲍庆甲是鲍感恩的儿子，曾在一九三〇年应日本打字机公司川畑先邀请，前往日本考察印刷，糜文溶以董事秘书名义随同前往，在日本高等工艺学校当研究生，从日本印刷业权威伊东亮次（现仍健在，年高八十左右）学习照相凹版及照相平版的制版工艺，复因川畑先生的介绍，得有机会参观东京，大阪各大印刷所，以及大藏省印刷局等著名印刷厂，在每个厂里观摩学习一、二星

期，学到了不少先进技术。糜文潞还访问了日本印刷界耆宿矢野道也老先生，面领教益。后因日本军阀发动“一二八”淞沪侵略战争，不便久留。当糜回国时，商务宝山路总厂已被毁，即时另建平版厂，大力扩展照相凹版及照相平版业务。照相凹版又叫做影写版，在我国也是商务第一家使用，用以印制《东方杂志》的插图。在此以前，商务负责人曾多次赴欧美各国考察印刷出版及造纸工业等，进用美籍、德籍技师多人。

商务早期的活动远远不止于此，它的影响也超越了西太平洋，主要表现在供应南洋课本和华侨用书等方面。本文范围只想限于上述几个方面，作为一项专题来看待。由于商务在它初生的年代里，得到日籍技师、专家、编辑、顾问的协力工作，随后馆里负责人几次东渡参观访问，技术人员更番赴日取经，学到了新技术、新工艺，培养出许多技术人才，壮大了中国早期的印刷技术队伍，使商务的印刷和出版物在质量、数量上得到不断提高和发展，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直到现在，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出版事业，继续贡献一份力量，这是同商务全体职工的辛勤劳动和中日两国工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真诚的文化交流和技术协作分不开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八日

## 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

黄警顽

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一九〇七至一九四七年），实际也就是我的社会服务的四十年，其间除了参加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和跨海北伐、进军胶东的一年多时间，离开了商务印书馆的店堂以外，可以说，三十八年如一日，每天做着既是紧张、繁杂又是平凡、简单的工作。

我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出生于上海城内也是园地方的一个寒士之家。父亲名叫康侯，是出身于龙门书院的穷秀才，在外国教会主办的圣约翰学院（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和圣玛利亚女校教授文学、史地课程。但是他本人虽然做了大半生的教育工作，自己的儿子却只读了三年私塾和四年半小学。

一九〇七年，我十四岁，便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第一届学徒考试。投考的有一百多人，由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张元济（菊生）主考，并亲自口试。因为做店员工作必须讲求应对进退。这一届连我在内，一共录取了三十多名。这家新兴的书店仍沿用旧制度来培训后备人员。我拖着小辫行了拜师礼，尊称柜长作师傅。

从这一届起，馆方每隔五、六年便按业务的发展，招考一批学徒，录取人数一批比一批多，要求的文化水平也一批比一批高，最初只要求小学程度，后来要求中学、大学毕业资格，最后提高到学有专长的留学生。前后一共招考过六、七批，其中造就了不少人材，后来有的被提升做各部门负责人，有的外放到各省去当分店经理。而最突出的一个，是与我同时考进商务印书馆的同学、文具仪

器柜长张子宏所带领的一位名叫廖陈云的学徒。他是江苏松江、青浦两县交界处的章练塘人，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和店员，参加过当时的工会组织“职工会”运动和罢工斗争。他十四岁进馆，二十二岁自动脱离，隐姓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这就是四十年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同志。

录取以后，先进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两年。这所学校设在福建路、海宁路附近的商务书栈里，名义上由蒋维乔任校长，由编辑员任教员。主要学习《书目内容》、《图书提要》等书店店员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同时另办艺徒学校，专门训练高级印刷技术人材。我属于文化学徒，现任杭州“艺专”院长的颜文梁，则属于艺术学徒。

学徒一般是两年毕业，馆方除供应食宿外，每月发给零用钱二元，年终与高级职工享受同等比例的花红（每年按营业赢利多寡分配，一般相当于两三个月的工资）。在这段期间，我在新书店里过着旧生活，做些下排门、上排门、扫店堂、擦柜台、倒痰盂、洗水烟袋等较轻微的工作和打包、装箱等较重的工作。直到满师以后的前后四年中，我没有迟到早退，也没有请过一天假，总经理夏瑞芳为此送了我一面“勤慎有恒”的奖状。后来调我到编辑所去搞涵芬楼<sup>①</sup>的卡片，给杂志发行部发行《东方杂志》、《教育》、《少年》、《外交报》（线装）等各种杂志。

宣统年间，我以店员身份志愿参加了上海书业商团，各书店都

---

<sup>①</sup>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收藏珍本、孤本抄本的所在。这批珍贵的书籍，在解放后卖给了北京图书馆，共十七、八箱。

有一两个人参加，全队共六、七十人，经常在城内九亩地操练。辛亥革命上海起义时，参加了攻打制造局的战役。战后，投效学生军，归沪军都督陈其美指挥。营长是杨导（湖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不久沪军跨海北伐，进军胶东，奉命随北伐先锋队在烟台登陆，到达登州、青州、黄县之线。先锋队队长是日本留学生刘基炎，下级军官都是保定军校出身。在作战中我没有负伤，只因为跌蹶损折了一颗门牙。南北议和后，学生军凯旋回沪解散。商务印书馆要我回店，我觉得壮志未酬，不愿离开军队，被分发到南京陆军部所属宪兵司令部充宪兵。那时各省民兵集结南京的为数不少，临时政府财政支绌、发饷困难，曾酿成兵变，陆军部就派宪兵分头镇压。我奉命守卫总统府。政府北迁后改为留守府，留守府撤销后，宪兵司令部改组为宪兵学校，我被编进了入伍生队。这时我才决心结束军旅生活，商务印书馆又表示欢迎我回店，在一九一三年下半年回到上海。馆方把我提升为店员，出售中、小学教科书，开始享受月薪八元的待遇，尔后每年加薪四元不等。

也许由于我服务称职和业务上的需要，上级把我从柜台里解放出来，利用我对待顾客的专心诚恳，专门做服务工作，招待读者和本外部同业。不论他们要什么样的书，问什么书的价格，了解什么书在哪个柜台出售，有什么样的问题不能解决，甚至要知道与商务印书馆无关的事务，我都一一为他们解决，就这样，我在店堂里从一九一三年一直奔走到一九四六年前后三十三年，变成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台，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字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当然，我的业务水平也在与年俱增地有所提高，而经常接触的人也愈来愈多。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有些人经过两三次交谈，我就能记住这个人的姓名、职业和通常需要的书类。最后发展到有许多顾客认

识我，甚至知道我的姓名。我一天到晚在店堂里弄得应接不暇，而“交际博士”这个头衔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戴上了，而且被社会所公认。实际上，除了我在这段时期里接待过大约三百万人次的顾客以外，没有一点能和当时社会上的那些交际家、交际花相比。我哪有一点儿交际家的气派呢？我这个“交际博士”的外表既不是西装革履的洋场少年，又不是花言巧语的投机商人，而只是个长年布袍一袭、布鞋一双、其貌不扬的人，说我有几分像个乡村教师倒差不多。我在馆中的职位则叫做“交际干事”，获得过馆方“敬业乐群”的奖状。

在商务印书馆的最初二十年间，我坚持自学，馆方也随时给我进修的机会，例如派我到西洋体育传习所学习，连续四年到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选习教育系各科，上明诚学院选修图书版本，目录学等等。

资本主义经营的唯一目的是招徕顾客。馆方认清了“交际干事”对发展业务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店堂里开辟了两间图书陈列室来作交际干事的发展基地。我以这个陈列室为家，主持一切，把每日新书陈列进橱窗，把作家、读者、本外埠同业、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延为入幕之宾，欣赏新书。这时，我不仅要店里做向导，有问必答，还经常代表馆方出外招待全国各地文人学士、外埠同业。领导有关当局或各地参观团参观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图书馆和上海其他文化机关，务必使这些“顾客的代表们”酒醉饭饱，或者满意而去。有时还出去调查发行情况，到各级学校里张贴新书广告，联络教师，推广新书。在这期间，我认识了许多学者和作家，为馆方拉了不少稿子，还同南京政府与教育和出版有关的高级行政人员，拉好有利于商务印书



馆的关系。

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主持人看到读者服务工作获得了很好的成果，就提升我为高级专员，还有意派我上汉口去当分店经理，但上海方面不放。一九二八年，正式成立交际科，派我担任科长，又调了五、六位同事来同我一起工作。这时我真的成了交际大家，一天到晚忙于送往迎来，批复外埠同业和各地读者的来信等等。我为社会服务的宿愿，从这时期起，开始逐步实现了。

一九三七年，正是我参加商务印书馆的三十周年，全面抗战开始了。我从第二天起就投身到前线抢救伤兵，在后方做救济难民的工作，出生入死，倒也遇难呈祥。不久，上海成为孤岛，商务印书馆业务直线下降，工作清淡，我把大部分时间，转用在社会、救济和抗日工作上。

一九四一年，申报经理马荫良决定成立一个“社会服务处”，请我去兼任处长，一连工作了四年，在助学、济贫、救难、处理读者来信等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一般是随着社会的变动和需要，不断进行新的活动，捐募和分配现金和实物；同银行界、工商界和爱国资产阶级挂好钩，常能做到及时解决问题。上海各慈善团体又公推我连续主持三年、每年两个月的冬赈，做大规模庇寒、施衣、施粥、施药等工作。

在这段期间，助学金工作做得比较好。我掌握住三个原则：（1）家庭真正穷苦；（2）身体真正健康；（3）功课真正优良。在申报社会服务处的掩护下，我私自秘密分三批送进步青年前往延安，每批十多人；但最后到达延安的只有十多人，其余的，不是中途被阻拦，就是被逮捕了。

一九四四年初，一些日军逮捕的人的口供牵涉到我曾接济过游

击队。日本宪兵队就在春节前夜到申报馆三楼把我抓去，在北四川路宪兵队里关押了一个多月，严刑拷打五、六次，我仍矢口否认，最后被刺刀挑伤了右太阳穴。后来经过各界营救，才得到保释。鲁迅夫人许广平也为我尽了不少力。（她比我早些时候被捕，我被捕时，她刚释放，就被关在她住过的牢房里。）日本海军司令部不准我再回到申报社会服务处工作，申报就给我另外安排了一个主管办理移民垦殖太湖、洞庭两山的工作。

但是释放后不到半个月，又因为游击队员寄给我一张贺年片再度被捕，关押了三天，被痛打了两次，我只说：“不知道”、“不认识”，第四天，日寇释放了我，但有三个条件：（1）参加维持会；（2）要我在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开几个房间，给南京汪记伪组织做交际工作；（3）每月拿钱，但不必做其他工作。我未加可否。释放后，日本军部还派人给我送米、送煤，顺便向我问长问短，实际是进行监视。

身体虽然恢复了自由，被日本军刺伤的创口却发作起来。我进医院的消息一经在申报刊登，立刻有许多读者来支援我进行治疗，一天之间集款几千元，使我非常感动。我提出五百元接济其他贫民。最后还有三、四个开明资本家抢着给我偿付住院费。直到日本投降时，我还没有出院。

我从学徒到经理级，一业做了四十年，一生省吃俭用，而银行里没有一元的存款。青年时为了收入少，交游多，无以为家，到三十五岁才结婚；在五十五岁到北京才由老友徐悲鸿的照顾第一次穿上皮袄。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编著了三十多种关于交际和服务的书，除了几本关于华侨的书以外，用现在的思想水平来评价，可以说是一无

是处。

对于商务印书馆，尽管有着劳资立场的不同，感情却是深厚的，而且还有我自己的看法。现在拉杂地说一下：

(1)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昌、高凤池等，都是清心中学的苦学生出身，受基督教影响较深，办事切实，作风正派，取之有道。他们提倡并实行星期休业，在当时上海中国工商企业中是没有这样先例的。但他们劝职工上南市基督教清心堂去做礼拜，有些职工竟因此信奉了基督教。

(2) 编辑所掌握很紧，从第一任所长张元济起，经王云五<sup>①</sup>何炳松、高凤谦、韦恣以至周昌寿，都各有所长，既要求数量，更要求质量，保持着传统的实事求是作风。张元济早到迟退，办事精练，以身作则。常亲自给作家写复信。

(3) 王云五办事大刀阔斧，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提倡所谓科学管理，推广四角号码。从“一·二八事件”以后的规复工作中，显得他很有些手腕。他主张印行大部头书籍，利用政治力量和营业方法推销。《万有文库》销几千部，在当时也是很突出的。晚年参加国民党政府时，曾在商务印书馆带走一批人。他的计划无法完成，使商务印书馆受到很大损失。

(4) 商务印书馆在开始推销教科书时，费过不少心机。例如，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曾出资举办私塾改良工作，一方面争取和改造塾师，同时推行教科书。我在一九一八年还组织私塾改良

---

<sup>①</sup>商务印书馆本来想请胡适来担任编辑所所长的，胡适也同意了，但又舍不得北京大学校长的职位，就推荐了王云五。王是胡任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学生，跟胡学过英文，又是商务的小股东，所以股东会比较容易地通过了。

会，创办沪东塾师讲习所，协助推广。

(5) 在出版界树立了很好的信用，发售预约的书籍，都能如期交货，即使偶而误期，相差也有限。所以能经常同时预约几种大书，吸收巨额现金来周转运用，使出版书籍更具计划性。

(6) 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宗营业。这不仅需要雄厚的资金，庞大的排印、装订能力，而且要求质量高、发行快；要求同教育主管当局的联系与协调。在这方面，商务印书馆经常显得准备充足，游刃有余。

(7) 商务印书馆始终不松懈对同业的竞争。中华书局创立后，出书内容比较新，印刷比较快，被目为商务印书馆最大劲敌。于是它在发行方面就放宽尺度，在售价上公开用折扣来争取客户，实行薄利主义；但虽有交际拉拢，并不送礼行贿。我在进行推广工作时，就被授权可以酌情处理，例如：顾客原定购买一部《万有文库》的，由于我的推广，多买几部，我就可以通知柜台上给予同业优待折扣。

(8) 民国初年的畅销书是林（纾）译小说；此后《辞源》、《四部丛刊》、《万有文库》、《儿童文库》、《王云五大字典》也都是赚钱书。

(9) 内部团结，除了王云五以外，领导人办事公正，工作人员无须勾心斗角。王云五有私心，预支大量版税，重点推广自己的书。

(10) 编辑所把关紧，不出版国民党书籍，后来才间有代售。

(11) 办东方图书馆，后来又办流动汽车图书馆，水上巡回书船。后者每年在冬季把精神食粮直接送到江浙农村地区。

(12) 在发行方面用功夫：送书上门，在大、中学校举办图书

展览会，同时零售图书，参加各种类型的博览会。

(13) 能培养干部，利用相应机会，鼓励干部进修。学徒一般在工余补习书法、算术、珠算、图书馆学等等。

(14)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关系，一般可以说是相安数十年，一九二六年前后才开始稍有磨擦。后来因为社会经济常有变动，职工生活受到威胁，劳资双方才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对峙局面，发生过几次罢工事件；但资方的应付方法是向职工摆家底、算清帐，有可能，就接受协商解决。

(15) 商务印书馆人才辈出，四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思想进步的事业家和作家。解放后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高级领导工作的就有二、三十人。如：陈云、黄炎培、陈叔通、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韦恂、马叙伦、郭沫若、竺可桢、周建人、叶圣陶、陶孟和等，都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或关系密切的人物；在省、市一级的人就更多了。

以上只是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四十年的浮光掠影，只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职工的回忆片断而已。

一九六四年口述

(张功良整理)

## 回忆解放前的天津《益世报》

### 《益世报》专题小组

天津《益世报》是旧天津四大报之一，遍销于华北及东北各省市（四大报为《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时代，由于它的销路较广，言论影响面较宽，在知识分子与工商界方面，留下深刻的印象。创办人雷鸣远，是比利时籍传教士，是殖民主义者的先锋人员，经理人刘浚卿、刘豁轩、李渡三、生宝堂、刘易之等都是天主教徒，与北洋政府以至国民党反动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该报创刊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日，停刊于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前夕。在这三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它始终是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工具和为反动政权与中国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机器。

为了征集该报的史料，我们邀集曾在该报担任编辑采访工作多年的史振华、俞志厚、聂国屏，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朱道孔、苏明文、和熟悉报业情形的常小川、齐协民、夏琴西、刘霁岚、李树芬、涂培元、李志新、周振东等，结成专题小组，从个人亲身经历和座谈回忆中进行挖掘核证。现就所得资料，依照天津《益世报》发刊程序，分别加以概述。惟其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这一阶

段，《益世报》虽在抗日后方之昆明、重庆出版，但内部人事与企业关系均与天津《益世报》截然两事，故不在本文记述之列。

## 一、《益世报》创办人雷鸣远

雷鸣远比利时籍人，原为巴黎修道院修士，在准备圣神父时，因患眼病未愈，故未办理。一九〇〇年来中国，在北京西什库教堂治眼，病愈后即由在北京主教范国梁(法国人)主持下，圣雷为神父，并派在京东双树一带传教。嗣调浙江绍兴，辛亥革命前一年(一九一〇年)调来天津。一九一五年创办天津《益世报》，直至一九三七年，他均以《益世报》董事长的名义，控制着该报的人事、行政大权。

雷的传教手段与一般法国神父有所不同，他最能利用伪善面目深入各阶层，从宗教、生活、报纸、学校等各方面进行攻心战略，使人们从思想上陷入迷途。公教徒中固多被蒙蔽，即一般教外人士，由于盲目崇信雷的伪善而长期受惑者亦大有人在。雷于一九一〇年到津之初，即被派至河北望海楼天主堂传教，他于传教之外另于教堂内创办诚正小学、贞淑女学，招收教内外子弟入校读书。因学生逐年升级，该校遂由初小、高小而至师范。望海楼附近及河北金家窑、盐店街等地青年，几尽为该校毕业生。辛亥革命后，共和政体初告成立，雷便乘机于民国元年在望海楼内创办共和法政研究所，所长一职虽由刘浚卿担任，实际内部大权统由雷亲自掌握，教职员每月领取薪金，亦必经雷直接付给，当时有些青年人对于共和政体正感兴趣，故报名入学者极为踊跃。每晚七至十时为授课时间，经常到所听讲者恒逾三四百人。其中在职人员甚多，也有希望凭此谋业之青年。讲师均由雷手约聘，除由雷自己担任讲授社会学

外，驻津法国领事迈德讲授法国革命史，警察厅司法科长白振镛讲刑法，唐肯讲经济学，天津地方审判厅法官徐家驹讲共和政治，修业期限一年。雷在研究所内培训出几批学员，均分布于天津政法各机关内，本文专题小组中之夏琴西即系该所毕业学员之一。共和法政研究所停办后，雷又与上海的马相伯，北京的英敏之创办宣讲所，《广益录》周刊，《益世主日报》等，专门宣传天主教。英敏之创办初期《大公报》时，雷亦参与其事。

雷在天津教区，虽隶于法国主教管辖之下，但他与法国主教及神父之关系极坏，彼此经常发生矛盾。如一九一六年法帝国主义扩充租界强占我老西开一带，雷事先预悉此讯，曾向警察厅长杨以德告密，嘱杨早派警察驻守，防止法国越占，杨未按雷意办理，詎竟发生法兵武装强占及掳走中国警察事件。雷对法人此举坚持反对，于全市商民纷起响应法租界中国工人反法罢工运动声中，他特授意《益世报》大力声援，从新闻报道与社论两方面给以支持。雷与法国人之关系，自此益趋恶劣，终于一九一八年，被法国人将其驱返比利时。雷离华前，美帝国主义意欲染指《益世报》，并曾与雷洽谈收买，因北洋政府从中梗阻，故未实现。雷去后，《益世报》董事长一职，仍保留雷之名义，实际权力则完全落于刘浚卿之手。

雷回国九年，一九二七年再度来华。据教徒周振东等谈：雷在欧州曾向梵蒂冈罗马教皇控告天津法国传教士，并建议教皇应提高中国传教士职权，辟给中国传教士主持之教区。嗣后未久，果然见诸实现，河北省即划出保定，安国、宣化、献县等教区，并改由中国主教或中国神父主管其事。雷鸣远一九二七年之来华，就是在安国孙主教的迎护下所促成的。雷到中国即在安国教区传教，不再直接受法国主教的管辖。雷在安国真福院组织耀汉兄弟会，以全、真、



常三字为纲领，全是全牺牲，真是真爱人，常是常快乐。以安国为基地，训练基本会员，另在北京清河，山西汾阳，关外玫瑰营子设立分会。会员共有二百余人，以苦修为主，长年吃素，睡独木板，枕砖头，以表示能吃苦。雷平日常出门，向以自行车代步，偶遇来津办事，亦必携其枕砖，夜间枕之入睡。雷的伪装，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尤其一九二八年他申请入中国籍，自称中国人。到处以伪装面目出现，口口声声爱中国，也干了一些好像爱中国的事，使他钻入到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浸透作用，模糊了国人对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应有的监视。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他以过去曾在喜峰口救护宋哲元二十九军伤员的经验，又率领耀汉兄弟会组织救护队，到华北及西北各战区救护伤员，创办军人残废院及教养院。在救护工作中开展宗教宣传，并暗为蒋帮特务头子戴笠作秘密的反共情报。雷与戴笠早有密切关系，曾多次亲去重庆见戴，面报反动工作情况，受到戴之款待，戴亦代达蒋帮对雷的褒奖。一九四四年雷因病去重庆治疗，旋即死于该地，时雷年六十九岁。《益世报》董事长一职，即转落蒋帮掮客的原南京总主教于斌手里。

## 二、《益世报》的诞生和成长

雷于一九一〇年到津后，曾在望海楼天主堂创办各种学校及《益世主日报》等，从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两方面散播天主教义。后因周刊每隔七天出版一次，中间空隙时间较长，不能满足宗教宣传的需要，遂动议改出每日发刊的报纸，利用综合性的新闻报道来陪衬宗教宣传更为有力。因即纠约在望海楼与他合作较久的公教徒刘浚卿、杜竹宣计议此事。在雷、刘、杜三人的多次研商下，决定了创办日报的计划，并决定将原来的《益世主日报》，改为《益世报》，

逐日出版。开办费三万元由雷在外国募来的传教经费中拨付。雷以独资关系自任董事长，刘、杜二人受命为正副经理，负责筹办一切。一九一五年十月十日正式出版，报社内工作人员大多由公教徒中选用。报社地址初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后移河北小洋货街。关于《益世报》地址问题，雷与刘浚卿均主张不入外国租界，不受外国人保护，并以此对外大吹大擂。谁知一九二五年直奉战争吃紧，由于刘浚卿平日拥护直系，《益世报》上经常捧曹、吴，骂奉张，刘本人又已成为直系分子，料到奉系入关，《益世报》必遭报复，竟亦自动的摘下不托庇外国人的幌子而搬入信奉天主教的意国租界。从此，《益世报》就涂上既受帝国主义宗教势力支持又受殖民主义租界保护的双层保护色。

天津《益世报》创办二年后，雷又筹拨两万元专款交由杜竹宣去创办北京《益世报》，刘浚卿与杜竹宣二人分占津、京两地，各自经营一摊。两报虽同为雷鸣远出资所办，但业务与人事均各自为政，殊少牵连。张翰如接替杜竹宣为北京《益世报》社长时，曾一度由天津调约解幼圃前往襄助，终亦未能打开业务，旋即退回。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该两报董事长又同为于斌，天津刘易之与北平之马在天仍是各据一方，根本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

第一任天津《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名守荣，浚卿是他的号。刘为河北省藁县人，幼读私塾，辛亥革命起，在家乡初等学校教书，后移居天津望海楼天主堂附近，因有一套说道本领，又善于迎奉拉拢，为当时天主教徒中之出色人物，雷鸣远看出这是一个可供利用的助手，便把刘引成知己，合作进行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刘本人也乐得凭靠外人势力，发展个人的社会关系，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雷、刘之间，确实建立了巩固的合作基础，并都能按照个人

预期的目的实现所愿。雷办的诚正小学，贞淑女学都是由刘任校长（贞淑女学另有管理事务的院长一人，名刘镜蓉，系天主教修女），共和法政研究所也是由刘任所长。刘在雷办的救国宣传会、公教进行会，以及各种宣传刊册上都出过大力。北洋政府搞天坛宪法草案时，有人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并正式订入宪法之内。雷鸣远遂怂恿刘出头联络上海的马相伯、北京的英敛之等组织团体，公开宣言反对，并到北京进行宗教信仰自由的请愿。雷为刘能忠心耿耿地帮助其散播宗教侵略种子的功绩，极为满意，因之将天津《益世报》委其全权负责，直至刘死。刘有宗教之后援，又有《益世报》为工具，在当时社会中极为活跃。经边守靖之引线，亦列入为直隶省议会之一员。在议会上曾滔滔不绝地发言二三小时，为直隶省长曹锐的各项施政吹嘘。偶在议会中发现反曹意见，刘亦能用其三寸不烂之舌说倒对方。故与边守靖、高凌蔚等同成为曹锟之幕中密友。曹锟贿选总统成功，直系论功行赏，刘又当了一任天津电报局长。

一九一五年十月十日天津《益世报》创刊之初，由于报馆内部的设备较为完整，印刷编排等各方面表现的差强人意，再加上雷鸣远、刘浚卿诸人的社会关系面较宽，天主教徒更热烈的拥护，故出版后便能风行一时，销报数字与广告业务均能日渐开展，这就给它奠定了一个有利的物质基础。一九一六年，天津法帝国主义者越界侵占我老西开问题发生，天主教的《益世报》居然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严词攻击法帝的侵略行为，并从新闻报道与社论两方面声援反法罢工运动，这又予人以好的印象。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益世报》又迎聘徐谦（季龙）以笔名“佐治”在报上大写支援北京学生罢课游行和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社论，刘浚卿本人亦以报界代表的

身份参加天津各界联合会，直接以大会委员的姿态参与反对“二十一条约”和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所有这些表现，都使人对《益世报》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而雷鸣远与《益世报》也就隐藏在这伪装掩护下，得以放手开展它的宗教侵略活动。

《益世报》的中心任务，本是为帝国主义宗教侵略而服务，但它的经营手法却着重于开展业务争取读者为主，另于暗中勾结军阀恶势力，求得保护与援助。开展业务可以维持生存，壮大力量，依靠恶势力，可以为所欲为，取得一时的安全。这就是刘浚卿仰承雷鸣远意图的办报方针，也是《益世报》几十年来奉行不移的一条路线。由于《益世报》靠拢北洋派的直系，报纸上经常辱骂奉系张作霖，反对安福系，刘浚卿又系直系骨干分子，第一次奉军入关时，直隶督办李景林便奉命首先逮捕《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张学良并派翟战一带领人马将《益世报》予以接收。一个长期作直系喉舌的《益世报》，至此又一度改变为大元帅府的传声筒，但天主教的宣传工作，却未因此而中断。嗣奉系失败，刘浚卿又重行回任天津《益世报》总经理。刘自雷鸣远被驱离华之日起，即总揽了《益世报》的大权，成为一人独掌全局。经此风险后，他更巩固了既得的地位，俨然就是一人的家天下。《益世报》在宣传方面是为天主教服务，在经济方面便全为刘家服务了。因此，《益世报》亦有“刘家报”之称。

一九二八年夏，刘浚卿由奉系手中收回了《益世报》。该报在奉系接管的三年里，已经摧残成百孔千疮，奄奄一息之势，报纸销量由万余份降到三千余份，报费广告费减少，营业亏累，入不敷出。报社命运陷入极度危险之境。适当时正是国民党的北伐成功，天津各报争相发展，《大公报》在胡政之、张季鸾等人经营下已操

津地报业牛耳，《庸报》在蒋光堂、张琴南之整顿下亦以后来居上的崭新姿态出现。其它王镛冰、叶庸方的《商报》，周拂尘的《华北新闻》，熊少豪的《泰晤士报》，以及刘霁公、薛月楼的《新天津报》，均在招兵买马，充实人力物力，改进经营方式，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开辟各报的业务，竞争情况相当炽烈。《益世报》逢到这个双料问题，身为总经理的刘浚卿，自然要开动脑筋，急谋对策。这就产生扩大雷鸣远独资经营为《益世报》股份有限公司及调来以南开大学毕业生刘豁轩为主的新人事阵容。刘的这两个措施，确实挽救了《益世报》濒于摇摇欲坠的危险局势。

关于成立天津《益世报》股份有限公司的办法是：首先打破原来雷鸣远独资经营的圈限，在天主教徒中发行股票，招募投资，正式设立属于公司的董监事会，由投资人分任董监事，但仍以雷鸣远为董事长，实际控制最后的发言权。股票认购人一定限于天主教徒，转让股票亦必通过董事会的许可。主要的目的就是绝不能把股权落到教外人手里，以保持天主教的控制。当时共募到股金现款八万元，全部投入到《益世报》的重整工作，在人事阵容方面，委由刘豁轩为总编辑，担当报社的中兴全责。豁轩为刘浚卿之族弟，中学、大学读书阶段均受其资助，毕业后又能有此重任，当然是喜出望外。故在他到社时，便由南开约来同学汪佛生、唐际清、赵漠野、吴云心、丁继昶等重新组织编辑部，配合原有人员解幼圃、李砥中、刘麟阁、王廷绅、王醉生等健全了编辑、采访两重要部门的人事阵容。另设电务室，收听中央社及各报社从无线电中发出的电讯。北平、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亦安置了得力的特派记者，河北省各市县安排了地方新闻通讯员，人力上较前大为增强了。在经济和人事两大先决问题解决后，《益世报》才又正式踏上坦途，具备

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同业竞争条件，与《大公报》、《庸报》等展开勾心斗角的业务竞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益世报》销路激增，原有的平版印刷机已不敷应用。为应付《大公报》与《庸报》的业务竞争（时《大公报》及《庸报》均用由上海《新闻报》和《申报》调来的轮转印报机），为适应当时的印报需要，迫使《益世报》不能不购置轮转印刷机。遂以美金一万三千元在德商礼和洋行订购德制高速度辊筒轮转机一部，但该报当时仅能付出现款三万元，折合美金七千余元，其余不足之数，便由刘豁轩代表刘浚卿求助于开滦矿务局经理赵君迈。适开滦正与北宁路局因车皮问题暗斗甚烈，北宁方面有《大公报》为后盾，开滦方面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报纸作援手，《益世报》此来，恰符需要，因即慨然借给两万元，帮助《益世报》解决了购置轮转机的困难。《益世报》与开滦矿务局也就由此发生了相互利用的关系。

报纸的社论，在当时起着一定的号召作用，《益世报》在这方面也曾下过很大的力量。创办初期是由何逸圃、董郁青等主持笔政，并由金凤楼用懒云的笔名代何写了很多社论。其内容除反对洪宪帝制、反对张勋复辟等人所共愤、各报一致抨击的问题外，其余便是围绕刘浚卿的意图为直系军阀吹嘘，攻击安福系，反对张作霖。在五四运动中，虽有徐谦写过一段支持示威游行，反对亲日外交的社论，但因为时极短，并没有发生较大作用。后来又约聘过颜旨微、于复苓、傅立渔、景耀月、茹春浦、顾君实、毛壮侯等人执笔，也没有起到显著效力。在刺激业务上，还不如董荫狐以袁世凯窃国为内容的长篇连载小说《新新外外》有魔力。而《益世报》劲敌的《大公报》社论，正在张季鸾、胡政之、吴前溪等人的主持

下，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量。这又使《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在竞争业务工作中产生了难题。本来“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关心国事的心情极端殷切，《益世报》在新闻报道方面虽较前有进步，但社论不能适应当时读者的要求，确是极大缺陷。刘豁轩在迫切需要和苦无适当人选的情势下，适罗隆基因在上海《新月》杂志发表反蒋言论为陈布雷以教育部令免了大学教授职务。刘对罗早有印象，二人素昧平生，又同是英美资产阶级教育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对当时国内与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也不谋而合。因此，刘便把罗看成是为《益世报》写社论的最适当人选。经他反复地说服了刘浚卿，并通过南开大学教务长黄子坚的斡旋，终于达成合作目的。罗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北来，由上海《新月》杂志总编辑，一变而为天津《益世报》的社论主撰。

《益世报》在解决以上几大问题的同时，又重新开展了北平的业务。在北平前内西皮市大街成立驻平办事处，由天津抽调记者王廷绅、张万里，编辑李砥中，营业人员刘博辉、刘鸿志等配合原驻北平的记者徐致颖，组成坚强的采访部和发行部，把北平的一切消息用火车快件及长途电话，传送天津。《益世报》每晨出版后，亦赶由第一趟快车运抵北平，与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等同时和读者见面。本来，当时的北平正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新闻发生地，黄郛、何应钦等正在执行着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国人一致痛恨他们的辱国丧权勾当，但基于爱国情殷和了解中日交涉内幕的心情的驱使，每日都在争相购阅报纸，尤其关心北平的新闻。这就是天津《益世报》要在北平开展业务的主要目的；另一个企图，还是要和《大公报》作竞争。此外，《益世报》为了增强全国各地的新闻报道，又先后派出驻南京记者赵漠野、驻汉口记者刘治平，驻保定

记者俞志厚（时河北省政府正由津迁保定），原驻郑州记者宋鸿猷，驻济南记者何冰如，驻绥远记者杨令德等结成新闻通讯网，每日以电报、电话等各种传信工具向天津拍发电讯。天津本市方面也加强了采访部，由原任哈尔滨《国际协报》总编辑的王研石出任采访主任。王于“九一八”事变后进关，时正以上海申、新各报驻津记者身份活动于军政机关单位，采访线索甚宽，成为对付《大公报》新闻竞争的主力，由于以下各项措施的实现，使《益世报》的成长才臻健全，这也就是巩固了《益世报》为帝国主义宗教侵略作宣传工具的有利条件。

### 三、《益世报》休刊三月的一场风波

刘浚卿于一九三四年病逝，《益世报》总经理一职，即由雷鸣远通过董事会的认可，派由刘豁轩兼任。实际在刘浚卿患病后，《益世报》的重要问题已以刘豁轩的意见为转移。尤其社论主撰罗隆基的聘约，是全由他的力主而促成，所以遭到因社论而引出的问题，董事会是不肯出头的，就是身为董事长的雷鸣远，也持袖手态度。一九三二年一月，罗隆基到社后的第一篇社论，就以“一国三公的僵政局”为题，开始抨击国民党内蒋、胡、汪三人的派系之争，讽刺国民党所吹嘘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政策。以后又写出“可以战矣”，写出了人民要求武力抗战的主张，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注意。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年中，罗之社论有许多是反对独裁，批评不抵抗政策的。因此，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刘不同、卜哲民等便两次向《益世报》提出停止续聘罗隆基的意图，但均未为刘豁轩所接受。一九三三年，罗又与《益世报》延长聘约一年，当年秋天便发生罗去南开大学讲课途中被枪击的事件。罗本人幸免于



难，《益世报》却吃惊不小。同年十一月“福建事变”爆发，罗又在社论中主张停止内战，接受李济等人的主张，致又引起一九三三年底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再向《益世报》提出最后警告，严厉制止续聘罗为社论主撰。刘豁轩惧于当时的压力太大，保护《益世报》的安全较器重罗隆基有更重要的意义，又因看到华北局势已渐恶化，坚持用罗恐更不利，遂决定接受警告，与罗协商了解除聘约。一九三四年后，《益世报》销路下降，刘豁轩知道是受社论的影响，遂又请出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续主笔政。在刘、钱的研商下写了一些攻击日寇制造伪满洲国，反对关内外通车通邮，反对冀东特殊化等社论，特别是攻击黄郛部下的殷同、殷汝耕、陶尚铭等汉奸最为尖锐。谁知以此为导火线，就由蒋介石以行营总司令名义，于一九三四年的七月，突然通令全国停止《益世报》邮政和电讯的使用，以断绝新闻来源及堵塞报纸销路，对《益世报》加以制裁。但刘豁轩仍图利用意租界的保护继续出版，并曾一度借手转运公司包运出境。半月后，蒋又下了第二道禁令，全国各地如再发现《益世报》，则唯当地负责长官是问，此时，《益世报》馆内已经堆报如山，实在不能继续出版，只好自动休刊。总经理兼总编辑的刘豁轩，对于这些问题当然要负主要责任，更何况聘用罗隆基与钱端升又都是他的主意。其他董事不但不出头过问，反而在背后闲言碎语。雷鸣远在安国也听到很多对刘不满的反映，蹲在安国观望不前。刘只得挺身而出，硬着头皮到南京，约同驻京记者赵漠野同去庐山想办法。时蒋介石、黄郛以及南京的权要大多都在庐山，刘到该处见到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与陈布雷，都叫他去找黄郛。见到黄郛，黄亦避谈此事，最后还是推托回到北平再谈。刘无结果回来，便采取暂时继续休刊措施，对各部人员亦适当地安置一番。钱端升则仍回清华

大学任教。《益世报》休刊凡三月之久，刘又婉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刘浚卿生前好友）代向黄郛疏通，经黄提出必须由其推荐社论主撰方能解决。《益世报》只得俯首接受，这才有条件地解除禁令，黄郛私人秘书朱枕薪便是被推荐到该报的社论主撰。朱接聘后，《益世报》社论栏内便出现了连续不断的反共、反苏，与认贼作父的朱撰谬论。在《益世报》方面，但能求得出版，不要影响了它宣扬天主教就已称幸，至于原来那些武力收复东北和抨击蒋记国民党独裁的严峻态度，只是成为一时迎合读者心理的业务手段而已。刘豁轩每月支付朱枕薪工资三百元，但朱从未亲身到社，只是经常派人把稿子送来。半年后，刘又商得张廷谔的同意，一次付朱一千八百元作为半年的工资，解除了对朱的聘约，《益世报》的社论便改由一些大学教授写写关于学术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填补篇幅，暂时不再提起国家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 四、罗隆基与天津《益世报》

罗隆基与天津《益世报》，正如戏剧名角与剧院的关系一样。一个是搭班唱戏，用个人艺术之显扬寻求自己的前途，一个是到处挖名角、只要能叫座，多赚钱，完成了业务竞赛的目的即可。由罗与《益世报》的合作条件，便能很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如条件中第一点就明确写着：在不危及报馆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的前提下，社论主撰有完全的言论自由。这就表现着在《益世报》社论这块园地，允许合作对方任意贩卖啥样货色，只要有叫座力，不惹大祸就行。所谓社论，并不是《益世报》社本身的言论主张，而是执笔者个人的意见。实际罗在《益世报》的作法也是如此。罗写社论向以个人意图为准，从不与他人预商，报社内亦无社论委员会之组织。

罗写就后只是由刘豁轩加以过目，偶有笔误错字可以校正，其它概不能加以删改。有时，刘无暇阅及，也就由罗直接发给排字房，次日报出版，始与读者同时看到。罗在报社亦很少与其它人员接近，经常独坐一室看报写稿，写毕即走。报社内部人员对罗之态度亦不相同，有些教徒，对因罗之社论而销路增长现象是非常欢迎的，但有时对报社的安危，就不免有所顾虑。另有一些人看了罗的社论，心情上很痛快，如同在市间看了一张令人称快的传单，并不认为这是代表本人隶属报社的统一言论，很自然的表现出罗隆基与《益世报》是两码事。至于对罗的待遇问题，《益世报》也是破格以求，百方依从的。每月除付予高额薪金五百元外，另供给汽车坐，听其在外兼课兼薪。这完全是剧院老板拢络有叫座力演员的那一套办法。

罗为一九二一年的清华毕业生，留学英美，研究政治学和近代史。一九二八年回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及中国公学任教授，并曾任上海《新月》杂志总编辑，因在《新月》发表文章批评当时蒋记国民党的“一党训政”政策，和蒋的法西斯统治，被蒋政权教育部长陈布雷以部令免了他的大学教授职务。“九一八”事变后，罗在沪公开讲演，主张武装抗日。一九三二年一月来到天津《益世报》，一九三四年停止聘约。翌年，经《益世报》征得冀察政权首领宋哲元的谅解，又将罗邀回，直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时始行离去。总观罗几年来两度在《益世报》所写的社论，在武装抗日，武力收复东北，反对蒋介石独裁，抨击不抵抗政策等方面，都曾提出一些爱国的主张和尖锐的意见，这也正是当时举国关心同声愤慨的问题。罗能以犀利生动的手笔，写出人们所要说的话，这是罗的出人智慧，是符合当时群众意愿的。人们争看《益世报》，亦正在此。但罗在社论

中又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及二十四日的社论中，分析国际形势时讲到“左方是人民阵线，右方是国民阵线”，“我们的东邻是国民阵线的主要分子，我们的北邻是人民阵线的领导国家”。“国内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冲突又是左右之争，那么我们怎样逃避西班牙目前内战的劫运呢？”他的答案是“世界依然还有几个强大的国家，他们还没有卷入两个阵线，这就是欧洲的英国，北美洲的美国。他们有他们的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民主主义。英美的民主主义是不至消灭的，说不定英美的合作，可以另成一阵线，即成一个民主阵线”。又说“我们的意见，民主阵线或者是中国目前比较平稳的出路。英美的民主政治，是各党并存，平等参政，并且用和平方式转换政权的政治。为此，则国内左右阵线的冲突或可平息。”又说“能避免国内阵线的冲突，就能避免卷入国外阵线的旋涡，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中国目前政治上安全平稳的出路。”罗的这些主张，充分反映了他的英美多党政治的主张，反对武装斗争。在一些社论中，他也常以联共抗日为号召，并反对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但他的真思想还是“梦人失之，梦人得之”，认为纵使共产党得了政权，还比给日本当亡国奴强。根本没有把共产党领导中国看成是中国确切不移的唯一出路。

## 五、《益世报》的公教势力与宗教宣传

天津《益世报》自创办至停刊，报社内的人事、财政、业务、工务等各部门主要事权，统操之于公教徒手中，而刘家系统，又是长期把持的核心。自董事长雷鸣远起，总经理刘浚卿，经理杨少卿、张凤秋；营业广告负责人陶鹤亭、丁懋昌以及发行、印刷、会计、文书、总务等各部人员，无一不是公教徒，其中又以藁县刘浚卿的

家族亲友占多数。外人一进入到《益世报》营业部，就能听到异口同声的蓟县味的乡音。在编辑、采访、电务等比较具有技术性的工作方面，曾经采用少量的非教徒人员，但这也限于公教徒中实在无从物色而不得不用。这些人凭工作拿薪水，很少与本位工作以外的问题发生关系，甚至根本不问社务。自刘豁轩肩负中兴《益世报》的重任来任总编辑，由他邀来一些非教徒人员担任编辑部的重要工作，从外表看，报社对于非教徒人员似乎比较尊重，实际以刘豁轩为主，再辅以教徒中的解幼颀、史振华、李砥中、刘麟阁、王醉生等仍控制着编辑、采访两部的实权，刘浚轩离社后的继任人选，李渡三、生宝堂亦均系经雷鸣远派来的公教徒。一九四五年《益世报》在津复刊，也是遵循旧辙而行，刘家势力更显得突出。如社长刘豁轩，总经理刘易之，营业部主任刘博辉（后升副理），秘书刘让之，由刘浚卿的一个兄弟，三个儿子包办了《益世报》的整个大权。刘易之另在各部门安置了可靠的公教徒吴克斋、陈牧子、聂国屏、周虎臣、张烈武、刘鸿栋等分别控制着经理、编辑两大部，直接操纵报社的命脉。

宗教宣传是《益世报》的唯一中心任务。为了发挥它这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本质作用，在天津《益世报》版面上，一贯地保留一个固定地位，从正面宣传天主教，以有神论反对无神论，以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劝人安于贫，不要革命。如一九二九年三月六日《益世报》宗教丛刊上登有雷鸣远的一篇稿中说：“圣经对富人有施舍哀矜之严命，对穷人有神贫乃真福之圣训。”又说“贫穷为升天之捷径。”这就是雷鸣远的哲学，这就是雷鸣远叫富人以施舍哀矜的手段拢络穷人，永保他们侵夺剥削的地位之妙计，叫穷人安于贫，不要革命的诡谋。又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益世报》宗

教与文化周刊上有一篇马相伯攻击赫胥黎《天演论》的文章说：“有人批评天演论，对心地光明者，达尔文主义死矣。”他并引用李问渔的话说：“《天演论》大不合形上之理，大不合实验之迹，大不合万民之论，要皆信口胡言，绝无根据。”雷鸣远在驳现代非宗教论中引培根的话说：“浅陋之学问往往引人入于无神派，更深的学问则使人倾向于宗教。”雷鸣远、马相伯、英敛之，这都是天主教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忠心于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公教徒。他们的言论，正代表了《益世报》的面目。雷更欺骗中国人民说：“天主教不是洋教，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是为第二祖国谋福利。”在抗日时期，国人爱国热情极高，他在这里也不放松宣传他们天主，说“承认正义的民族，间接也就是承认天主。”把爱国主义和他的宗教宣传扯在一起。其他类似之论，在《益世报》上也时常出现。仅就以上几点，当可看出《益世报》宗教专栏中宣传的是什么东西。

## 六、《益世报》的副刊与社会服务版

《益世报》的副刊，在刘豁轩负责时期确较前有所改进。从副刊版“语林”的质量看，较之过去的“益智粽”和新新外史一类的文字有显著的差别。主编人马彦祥、吴云心等都能以嘻笑怒骂的轻松短文针对当时的腐朽现状加以讥讽。游艺版“别墅”，在刘毅行的联络下，也从洪深、唐槐秋、田汉、费穆、叶浅予等电影、戏剧、美术各团体中开采了很多新鲜材料或艺术论评，一扫过去专为京剧演员作起居注的陈腐老调，吸收了大量爱好艺术的读者与投稿人。“九一八”事变后，《益世报》在新闻报道外，还不断辟出专页揭露日寇侵华阴谋诡计与残暴罪行。如连续刊载的《满汉忧患史》、《万鲜惨案实录》、《田中奏章全文》、《满蒙权益拥护秘密会议

记录》，并系统地报导沦陷后的东北情况。如《盗治下的沈阳》，《铁蹄下的长春》等。另在报面上特辟抗日舆论栏，逐日刊登读者言论。有此种符合读者需要的措施，使报纸销路激增，供不应求。嗣后，该报为在知识阶层开拓市场，又增加了哲学、文学、经济、国际、妇女专刊，每日一版，主编人多为平、津教育界人士，尤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文学副刊的主编为梁实秋。梁乃新月派一分子，因此也就继承了新月派反鲁迅的传统。此外，《益世报》还出版了一小张晚刊，以当日上午的本地新闻及游戏小品为主要内容，并登些日报所挤下来的电讯。销路虽仅限于天津本市，但每晚也能卖到近万份，抓着不少固定读者。

《益世报》为了补救一九三四年社论一时无无人执笔的业务影响，除临时找些大学教授写写有关学术的问题外，又别出心裁地创办了一个“社会服务部”，在报面上辟出一整版的社会服务版，登载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企图另取途径扩大业务关系。主办人为吴秋尘。吴是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流氓文人王小隐的徒弟，曾在《东方时报》、《天津商报》、《北洋画报》等处作过编辑，也在当时几个中学教书，向以潇洒无拘不沾尘俗而自夸。其实正是有尘必染，无往而不利的庸俗之辈。他利用做社会服务版主编的机会在报上显扬自己，夸大功绩，为他后来当汉奸打下有利基础。社会服务版的内容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既有职业介绍，又有代人征聘，经常募集捐款或四季衣物，举办各种施舍赈济，该报原有的抗日捐款和读者言论栏也都并入其内。另外还办了一个小学，也补贴了几个经济困难的学校。报面上每天表现得相当火炽，确曾迷惑过一部分人，认为《益世报》真“益世”。孰不知这正是《益世报》在执行雷鸣远的“施舍哀矜”主张，为那些沽名钓誉的伪善人作帮

凶，借以壮大他们剥削骗人伎俩。《益世报》既能借此多销报纸，又能体现雷鸣远的真精神，这正是一举双得的巧妙手法。天津沦陷时，社会服务部尚存有很多未处理的款物，究竟怎样办理，我们不得而知。据估计可能也便宜了盗卖《益世报》财产的李渡三了。

## 七、刘豁轩之走、李渡三之来

刘豁轩自任《益世报》总编辑之日起，就担当着整顿、发展和谋划同业竞争的几大任务。刘浚卿死去后，他又兼充了总经理，成为《益世报》中兴阶段的顶梁柱。从《益世报》本身的角度来说，他确曾为该报作了不少事情，但也因此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尤其一九三二年后，《益世报》连续发生风波，有些争权的董事和离职的旧人，对刘颇多物议。刘本人在生活细节上也有失于检点和不符合天主教徒生活制度的地方，远在安国的雷鸣远，当然时有耳闻，对刘的信赖也就大不如前。刘知难而退，借病为由辞卸了《益世报》总经理兼总编辑的职务，投向另一个帝国主义派遣分子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刘在《益世报》的遗职，则由雷鸣远另派董事会中的李渡三来继补。李为山西人，公教徒，与阎锡山有关系。李本人有一部分《益世报》股票，后来又用阎家的钱吸收其他董事的股票很多。他以股权持有人的立场来接任总经理，从气焰和排场上是较刘豁轩为盛的。在业务工作上还有肖规曹随，并无翻新之处。李到任后的天津《益世报》，在报面上表现最刺目的就是为晋阎效力吹嘘的地方太多，使人一见就知《益世报》又换了阎家的舵手在掌握着报社的方向。纵然为此《益世报》宗教版的宣传攻势，仍保持着既有的首要地位。

李对天津《益世报》是抱有独占野心的。他在人事方面先排斥



原来刘家系统的几个重要分子入社，对在社较久而与刘家关系较远的人员，便采取拉拢收买的手段，从生活上、待遇上予以提高，企图用物质条件收买力量，以巩固他个人的地位。如外勤记者程寒华结婚，他竟一次送给六个月的薪金，另给婚假一个月。像这样的作法，《益世报》在过去是没有的，雷鸣远也绝对不能允许。经他这样一做，却博得一些人的欢迎。李在外表排场上也能不惜巨资，加以粉饰做作，如把经理办公室和编辑部等都由原址意租界小马路搬到临街大马路的大楼里，内中桌几什物以及电话窗帘等完全换置一新，院内矗立高耸的霓虹灯架，夜晚一入意租界就远远看到《天津益世报》几个大红字。职员的伙食也改由报社供给，每饭八菜一汤，相当精致。编辑、采访、校对、电务夜间工作人员，每晚都在办公桌上，根据职别，备有成听的炮台、前门、红锡包三种不同等级的香烟。李个人更终日汽车出入，挟其秘书李东序等在外饮宴招摇，发展个人社会关系。凡此种种，都给《益世报》造成极大的浪费。雷鸣远屡次向李制止无效。最后竟令其交出总经理职务。李对雷之命令不但不予接受，反而公开登报声明，开除雷鸣远的董事长，另以晋阁代表人阎子奉取而代之。雷见李之篡夺企图完全揭露，遂利用帝国主义间之勾结关系，买通意租界工部局，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深夜进入《益世报》，实行武力接收，驱走李渡三。李即在外成立办事处，从各方面进行反雷活动。除在《大公报》刊登启事，宣布雷鸣远侵占股权，霸占《益世报》外，并通知各驻外埠记者及分销处，叫他们不要接受雷的管辖，听候解决。李更向天津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闹得乌烟瘴气。终以雷鸣远在《益世报》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关系，天津教友亦多对其抱有好感，李的活动无人响应。不久，芦沟桥事变发生，天津继之沦陷，雷、李之事也就不

了而了。

## 八 生宝堂被捕 《益世报》停刊

雷鸣远武力收回《益世报》后，便又选派生宝堂为总经理（生是武力接收时随雷而来的）。生为留法学生，公教徒，原在北平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工作，宋哲元长冀察平津政权时任北平《晨报》经理，他到社正是雷、李纠纷之时，报馆内部情况尚在混乱，经其一个多月之努力，一切工作方始正常。芦沟桥之炮声恰于此时爆响，《益世报》之新闻报道工作因而极度紧张。未几，天津亦入于战云笼罩中，各报社根据情况分别采取停刊或迁移措施，独生宝堂坚持《益世报》照常出版。当时外地电讯来源已多断绝，该报仅就电话中可能得到的一些消息及天津本市战事情况，加以披露。报纸篇幅缩为一小张，生本人亦进入编辑部参加工作。嗣日寇已经完全窜据天津，《益世报》依然坚持出版，销报范围则仅局限于英、法、意三租界。该报原在法租界惠中饭店楼下设有办事处，指派专人常川驻守值勤，英、法租界读者早与值勤人员取得联系，报纸一到立时分散净尽。有时报少人多，一份《益世报》要转让给多人看。在日寇窜据全市的险恶环境中，国人能在租界里看到一份中国报，这自然是要争相购阅的，因而给一些投机小贩以高价居奇的机会。关心国事的读者，有时破费五、六毛或一元买到一份《益世报》也是高兴的。但《益世报》和生宝堂则已为日寇暗派之特务所包围，因《益世报》所在地之意租界，日寇特务当时尚不能进入捕人。一日，生乘报馆汽车出意租界拟往法租界，在行经万国桥途中，被盯梢的特务和把守桥口的日本宪兵所截捕，立时扭往花园旁的日本宪兵队。本来《益世报》与驻津日本领事馆早就有着一段老帐：一九三二年日

本天皇被刺时，《益世报》于新闻版刊一介绍日本政治制度的文章，说日本是虚君之国，天皇是政治偶像。日寇竟以有意侮辱天皇向《益世报》大兴问罪，用外务省与陆军省名义提出抗议，在抗议中坚持三个条件：1.《益世报》停刊一日，2.登报道歉，3.报社负责人亲到日本总领事馆道歉。《益世报》对此无理条件拒绝接受，最后日寇又通过意国领事向《益世报》施以压力，迫使它声明取消天皇为政治偶像一句中的偶像二字，一场交涉才算暂息。由此便留下天津日领与驻军对《益世报》的仇恶。此番又加上《益世报》在租界发行售卖的问题，就更激起日寇必欲捕害该报负责人的毒计。生被捕后，《益世报》编辑部负责人解幼圃等见情势险恶，无法再行出版，遂即宣布停刊。仅留解等数人看守报馆产业，其余人员均分别散去。被关在日本宪兵队的生宝堂，经其法籍妻子多方设法营救，亦未能逃脱日寇的杀害，终于惨死狱中。生接任《益世报》总经理未及两月，即为日寇所害，其妻及子女三人经天津法国领事馆协助仍回法国原籍。

前被雷鸣远武力驱逐的李渡三，于山西沦陷期间竟当了太原日伪新民会的宣传部长，李以汉奸关系得到日寇的撑腰，于一九三九年来津，以清理《益世报》债务为名，将全部财产俱予拍卖，其中最主要的新式高速度滚筒轮转机，因一时出手不易，竟被拆成零件按照碎铁价格卖掉。在津的《益世报》其他董事，惧于日寇淫威，只是徒表惋惜，无人敢于出头制止。李盗卖后携款而走，《益世报》二十余年所积累的财富，便从此荡然无存。

## 九、一九四五年后的《益世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降服，全国人民正在欢欣鼓舞热烈庆贺祖

国胜利声中，国民党各处派人抢劫胜利果实。新任《益世报》总经理刘易之即于此时搭乘国民党接收人员之飞机，由重庆来到天津，筹办《益世报》复刊工作。刘是已故《益世报》总经理刘浚卿的儿子，又是安国耀汉兄弟会经雷鸣远一手培植起来的得意学生，由他重整雷、刘旧业，在于斌思想上认为是最恰当的人选。而刘易之此番北来，在真政客假主教的于斌支持下，竟抱着较雷鸣远还大的野心，他们的计划不仅是恢复天津《益世报》，而是想以天津为根据地，要在全国各大城市和海外都要设立《益世报》，形成《益世报》托拉斯，为于斌创造更有利的政治资本，为帝国主义侵略阴谋起到更大的宣传作用，刘易之到津后就对有关《益世报》的人员发表了这个计划，笔者本人更听之一再了。

刘在重庆出发之前，对于《益世报》复刊工作，抱有极大的乐观情绪，因为他掌握着几个有利情况：1.天津有原来的轮转机和各种印刷设备；2.天津有原来的读者和原班的职工；3.天津市长张廷谔是他父亲在直隶省议会时的同僚密友；4.他叔父刘豁轩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在该系毕业生中可以挑选干员。刘有以上四项依仗，料到复刊《益世报》必能一帆风顺，马到成功。他在重庆领到于斌批准的经费虽仅美金两千元，但并未削减他的锐气。谁知到津后，首先出其意料的就是《益世报》全部生产工具，早被李渡三盗卖净光，即一桌一椅亦不复存在，原社址之楼房，随同被卖器物亦转归公庆成货栈占用，刘之第一个希望，首先落空，因之使其不能不另作第二步打算，求助于天津市长张廷谔，张在离重庆时，曾受到于斌的拜托，刘易之又以侄辈身份屡次要求，张为了讨好于斌和顾念与易之之父的旧谊，遂慨然以天津市党政接收委员会主委的立场，将敌产东亚印刷厂全部机器铅字等印报器材，批由《益世报》接收

使用。这就给刘易之的复刊工作解决了困难。而于斌所批给的两千元美金，也就仅能支付当时复刊的各项事务费。至于报馆的原址既被别人占用，只好仍赖张廷谔在旧日租界旭街的冲要地点批给楼房三幢。一九四五年九月，天津《益世报》的新址和工厂，便在旭街改称的罗斯福路上正式出现（即现在和平路之糖业烟酒公司批发商店，文苑阁文物店，化工原料批发商店三单位所用地点）。刘易之把机器与房址两大先决问题解决后，便忙于罗致人材，积极着手内部组织，但此时蒋介石北来视察的消息又已传出，天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均决定于蒋过津前出版，独《益世报》因印刷工厂机器尚未安装就绪，不能使用，刘易之为了不放过这个拍捧机会，便临时在东马路马棚胡同找到一家印字馆，决定先由该处代印出版，争取在蒋介石过津时也能看到《益世报》。一九四五年十月，天津《益世报》便以半张的篇幅，在急不可待的仓促编印中复刊出版。出报的号码是衔接一九三七年停刊时最后一号而起算的，报头《益世报》三字也是仍用旧体所刻制，处处都表现出这是原天津《益世报》的恢复。

复刊后的《益世报》是以刘豁轩为社长，刘易之为总经理，这是于斌早在重庆所决定的。刘豁轩于一九四六年始正式到社问事，一九四五年复刊期间的事权则完全操于刘易之手中。他叔侄二人对于《益世报》的方针，是仍以保护天主教的宗教宣传为最中心目标。为实现此一方针，在业务上要力图发展读者，从各方面网罗人手增强力量，满足读者要求，吸收更多的订阅户。在政治方面，竭诚靠拢国民党，多得经济的补贴，多受其势力的庇护。关于报社新的人事阵容，除以刘家班为基础，继续掌管经理部以次的营业、广告、会计、总务等各项工作外，其编辑部则完全以刘豁轩的燕京新闻系为

核心，自编辑主任至各版编辑以及翻译、资料、采访诸系统，无一不有燕大毕业生。如李寿朋、陈继明、王恺增、李念培、徐仲华、张兴伯、高庆琛、姚世光、丁力、杨思慎等均是经刘豁轩所安置的，而且都负着重要责任，控制着报纸的发稿权，至于非燕大系的人员，只有史振华、薛不器、俞志厚、吴云心、王鹤亭、左小蘧几人，其中吴、王、左三人又已先行离去，后来虽请回旧人王研石为总编辑，而王对燕大系也是抱着妥为敷衍的态度。这些向以老校长而称奉司徒雷登的学生，给《益世报》编辑部带来了极浓厚的亲美气息。美帝国主义蓄意染指《益世报》的企图，终于经刘豁轩之手得获实现。刘于一九四六年到社视事时，报社的机器房、排字房、铸字房、打版房等印刷部门均已安装就绪，编辑、采访、电务、资料、校对等部分亦迁入新址楼上工作，楼下为经理、会计、发行、广告、总务等对外部分。由于《益世报》本身业务的逐渐开展和倒卖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批给的外汇纸，使《益世报》很快地又壮大起来。刘豁轩与刘易之又都坐上了专用汽车，与《民国日报》的卜青茂、天津《大公报》的严仁颖，中央通讯社的张家彦等同列为天津新闻界的权威分子。刘豁轩并在南开大学和工商大学兼任教授，刘易之以后以青年政客的姿态当了天津市参议员。他们经常忙于社会活动，每周还要到卜青茂家中会餐聚赌，报纸的经常业务则由燕大系与刘家班分掌着编辑和经理两部。刘易之曾一度在报社内安置了一个军统分子周伯麟为襄理。周既不熟悉报社业务，又不能燕大系与刘家班两大阵容里施展特务活动，到社不久便又悄然离去。

从《益世报》报面上所表现的现象来看，是相当不协调的，既有极端反动的一面，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进步的色彩。这正说明了该报内部人员的思想情况相当复杂。首先是代表报社主张的社论，仍

然和抗战前的情况一样，迄未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最初是由黄公伟执笔，黄为燕大毕业生，在日寇盘据华北期间，曾为北京《新民报》写过认贼作父的长篇文章，署名黄道明，刊载于《新民报》的第一版，得过日军报道部的奖金。胜利后隐蔽了黄道明三字，另以黄公伟之名出现于《益世报》，后来才知道他是所谓曲线救国类的蒋帮特务，刘易之使用这样的人写社论，自有其一定的用心，嗣以外间物议极多，刘亦不敢再请其执笔，黄在社内竟成了无事可做的闲员，最后只得另谋他去。在停止黄公伟写社论时，便改由编辑主任李寿朋执笔。李年富力强，聪明有余，能写出简短乾净的文章，但对国事前途，政治主张以及某些重大问题，不能一针见血地道出具体而远大的见地，只能应付一时。后来刘豁轩又找到张锐等大学教授写些社论，也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三年多的社论栏，迄未表现出一个具体而完整的言论方向。在新闻报导方面，则采取有闻必录，宁滥勿缺的原则，要闻版是以中央社和本报专电为主要来源，间亦利用无线电偷收一些国内外的电讯。本市版完全仰赖自己的记者采访新闻，欢迎有趣味的长篇特写，尤其不能放过天津本埠所发生的社会问题，因为这是最受人欢迎的东西。为了要多销报，什么海淫海盗的社会新闻都要从详记述，以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副刊版《语林》由吴云心主编。吴以“甲乙木”笔名经常写些短小精悍的幽默小品，有时虽三言两语，但能尖锐而犀利地抨击某些黑暗现象。在当时成为人所爱看的一页。此外，宗教版始终居于《益世报》的最主要地位，它不仅为天主教作宣传，它更坚持不移地反对人民革命事业，经常披露各地天主教堂的“情况”，内容不是某地教堂被烧毁，就是某地“好人”被杀害，公然反对各地的土改运动，为地主豪绅作辩护。除了公教徒或有人阅看，一般人对于这版是毫无

兴趣的。但这是《益世报》的本戏，是雷鸣远、于斌主办《益世报》的唯一目的。

刘豁轩对于报社人员的控制相当严格，对编访人员的活动尤为注意，严厉限制受贿敲诈等行为。过去管翼贤任《益世报》驻北京记者时，因东陵盗墓案受过孙殿英的贿赂而被辞退，嗣后再没有发生过类似问题。刘向以“廉洁报人”四字要求从业人员，该报经理解幼圃逝世时，刘特以“廉洁报人”四字题挽，并亲送至墓地。因此予人印象极深。编访人员在个人操行上还都能遵守这条纪律。俗语所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正是《益世报》的写照。《益世报》过去根本没有工会组织，因为工人中很多是天主教徒，他们受到很深的宗教影响，长期被蒙蔽于天主万能的麻醉剂中。抗战胜利后虽然有了工会形体，也没有具体的活动，尤其工务长柴某，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刘家的亲信，根本不予工人以参与各种活动的机会，有一次，《大公报》、《民国日报》、《益世报》三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并商定以罢工方式进行斗争，独《益世报》工人因受宗教的约束，尾随其后，并未起到较大的作用。这也是天津《益世报》控制职工的独具手法。

## 十、人民的产业仍回到人民手里

雷鸣远于一九四四年死于重庆后，《益世报》董事长改由于斌继任，另以四川财阀国民党粮食部副部长刘航琛副之。一九四六年刘航琛北来，就视察天津小站稻田和军粮城碾米厂之便，在津逗留数日，亲到《益世报》与编辑、经理各部负责人见面，畅谈《益世报》发展计划。继之，于斌以视察北方宗教情况为名亦到天津。在市长张廷谔的招待下曾作了两次公开讲演。一次是在老西开天主教堂；



一次是励志社礼堂（即现在和平路胜利花园、原房已焚毁），其内容不外是宣扬他在国外活动的情况，由抗战到胜利，由捧蒋介石而反对共产党，最后引用了很多中国经书上的话，牵强附会地端出一套反共反苏反人民的老调。《益世报》特派专人跟随记录，全文刊之报面第一版显著地位。于曾亲到《益世报》视察，召集编辑、经理两部人员讲话，对报社工作有所指示，个别的接见刘豁轩多次。刘易之则日夜跟随在于的身边，一时不离。于离津去北平，刘易之还派记者跟往，把在辅仁大学的演讲记录带回来，当日在津发表，以扩大宣传面。于、刘二人对《益世报》这个政治工具，是抱有极大幻想的，他们希望在全国和海外都要设立，可惜于、刘的希望终被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所挫灭，刘易之于一九四七年起就开始作放弃天津的第二步打算，他曾亲偕李寿朋到南方走了一趟，认为上海有《大公报》和申、新各报的劲敌，台湾没有业务前途，都不合预期的理想条件，结果选定了海外华侨较多的新加坡，把一部费尽周折从美国买来的新式高速度轮转印刷机，在上海并未开箱，便直接运到新加坡去了。具体地实现了刘易之放弃天津，改到新加坡开辟根据地的计划，把他由洋和尚还俗后所搞的对象也一并偕往（按刘易之本已献身为修士，在安国耀汉兄弟会苦修，根据天主教制度，修士可能圣神父，终身即不能结婚。刘任《益世报》总经理后，终日沉溺于交际生活中，便不肯墨守此项成规，适因病在天和医院疗治，遂与该院一护士相慕成婚）。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东北四平、长春等地的连战皆捷，到处显示着人民解放战争最后胜利之到来。《益世报》虽仍伪装镇静地为国民党作宣传，在报纸上吹嘘蒋介石垂死前的挣扎计划，但刘易之和刘豁轩早已惊慌失措，不能再安于位了。刘易之于一九四七年

后即不常在津，一九四八年起从未北来。刘豁轩于一九四八年秋亦溜之去沪，把《益世报》全盘事务都委由王研石、吴克斋、李寿朋、史振华、聂国屏五人小组来负责，遇事由小组共同商酌解决。直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刘氏叔侄二人均逗留南方并未回社。刘易之的胞兄刘让之、刘博辉二人于天津被包围前亦相继携眷南去。刘家班的主要成员这才正式撤离了天津《益世报》。

前面曾谈及刘易之北来复刊《益世报》，只由重庆带来美金两千元，刘航琛的川盐银行纵有接应，也只限于一时的周转垫借，根本不能长时拖欠。那么《益世报》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怎么就能拥有购置新式轮转机、购置汽车、添置各项器材等投资经费和支付庞大人事、电讯等开支的办法呢？主要的来源，就是倒卖外汇与进口报纸。国民政府为了收买各地报纸为其宣传，每月都由“资源委员会”批给各报一些进口纸，在“中央银行”领到外汇后即可直接向国外订货。当时外汇的黑市比官价高，市上的纸价又比进口纸价高。这种外汇纸的分配，无异就是变形的津贴，各报大多赖此维持，《益世报》由于于斌的关系，曾经得到蒋介石的特许，在外汇分配额上要多给一些，这就给它从中大取其利的机会。在报社本身卖白纸比卖印好的报有利，卖外汇比卖纸更方便。《益世报》每月要以四分之三的外汇额去倒卖。当时市间价值较外汇原值要高达八九倍，在倒卖过程中并不需要现货，只要由中央银行开出三吨或五吨一张的外汇单交给商人便能付款。一九四七年后，刘易之、聂国屏等人即驻守上海，就近由“资源委员会”及上海“中央银行”办领，并即就地卖出，后来《商务日报》李东序也常川留沪搞此勾当，与刘、聂等形成一个倒卖集团，刘易之买轮转机是用此款，筹办新加坡《益世报》也是用此款，刘家班成员出走的开销更是用此

款。由于他们盗卖依分的行为逐渐露骨，天津职工于沪社工作也就愈益加强，使天津既有的产业并未遭到损失。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光荣解放，长期为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工具和反动政权与中国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的天津《益世报》，至此结束，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陈迹。《益世报》的职工接收了《益世报》，人民的产业仍回到人民手里。

### 有关天津《益世报》的一些资料

上文写就后，我们又收到一些有关该报的资料，一并列述于此，俾供参考。

一、曹锟贿选时，梁启超致曹长函，痛陈利害，促其反省。内有启超敢预言：阁下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曹见之甚感不安，恐影响办事人之情绪。梁此函稿两次到天津《益世报》，刘浚卿坚主不登，并持稿到曹处献功，曹甚嘉许。一天，该稿突然刊出，摆在第一版社论栏，标“代社论”三字。刘见而大惊，追主持人，知是编辑罗寄厂承奉雷鸣远意旨全责办理。刘无可如何，走向曹自首，并加解释。曹大不怿，责刘背叛，并追内幕。刘深感狼狈。据罗寄厂云，刘对曹贿选大卖力气，且是劝进之一员，曹曾许刘登极后与边守靖同入阁，刘颇期待。有此波折，恐不保矣。罗又云，雷鸣远于梁函无积极主张，刊否两可，我积极主张发稿，半是泄愤。盖以刘办报起家，长电报局后得意忘形，几乎六亲不认，不能不予以打击。罗此言为另一刘姓编辑听去，转告刘，刘怒问雷，雷不作他表示，责罗矫诏，罗不安于位，因而辞职南去。（朱道孔）

二、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六日国光通讯社有一篇题为“天津益世报停刊收归华人自办”的通讯稿，内容说：刘浚卿专捧直系，曹锟贿选后，吴毓麟给刘直隶省电政监督兼天津电报局长，另给《益世报》八万元津贴，帐上没有，被刘私吞了。稿中所提之归华人自办，即指李景林逮捕刘浚卿及奉系接管《益世报》一事。（李志新）

三、天津《益世报》一贯是反共反人民的，尤其恶毒的是破坏天津的工运和学运。兹举以下几点具体事实：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该报本埠新闻有一稿，题为“共产党急宜驱逐”，内容特指出于某（宁河县人）……云云。这是显著的攻击中共天津建党负责同志于方舟。同年三月一日登有共产党之在津活动，九月十六日登有“在津民党已无活动矣”，都是恶毒地向反动政府告密。十一月二十五日登有共产党将来津宣传，对革命地下活动者领导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运动泼凉水，并提示官方注意。另外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尚登有“共产党在津被逮和共产党果来津耶”等新闻，对中共党员在纱厂附近被捕一事，故意大加渲染，表现出幸灾乐祸的仇视态度。北伐成功后，天津工学群运活跃一时，工人罢工斗争的行动时有发现，《益世报》不但不予支持，反持仇视态度，把这些消息放在极次要位置发表，甚至并入琐闻一起。（李志新）

（俞志厚执笔）